

甘肃史志

GANSU SHIZHI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主办

GANSU DIFANGZHI

2017·1

甘肃史志

《甘肃史志》编委会

主任：张军利

副主任：郝宗维 车安宁 李振宇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牛述林 毛存显 石为怀 米琳 孙占鳌

李宽余 杨生宝 张伦 张正龙 张占社

张全生 何成才 罗卫东 郑天水 贺红梅

高中 彭晓峰 谭得胜

主编：李振宇

副主编：张占社

编辑：汪举红 孔令奇 李佳潞

甘肃史志

2010年3月创刊 季刊 总第29期

2017·1

· 工作动态 ·

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暨《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志》

首发式在兰州举行

·5·

在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暨《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志》

首发式上的讲话

夏红民 ·7·

强化依法治志 加快修志步伐 力促全省地方史志事业迈上新台阶

——在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暨《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志》

首发式上的工作报告

张军利 ·11·

在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暨《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志》

首发式上的发言

石占良 ·17·

· 史海钩沉 ·

光绪元年陕甘分闹研究

陈尚敏 ·19·

唐代中期吐蕃侵占陇右及其后收复经过

潘守正 ·26·

· 史地考证 ·

古陇西与今陇西之考辨

张 慧 ·35·

唐诗地名“临洮”辨正

刘 满 ·39·

西汉酒泉郡若干县城的调查与考证

李并成 ·44·

GANSU SHIZHI

· 理论研讨 ·

- “一带一路”视野下甘肃方志编纂与文化传播构想 陈邦云 ·50·
- 谈年鉴体例和编纂思路 唐建平 ·55·
- 编好二轮市县志书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的几点认识和体会 陈谦 ·59·

· 文史探究 ·

- 早期秦文化源流研究略述 崔珍康 袁兴荣 ·66·

· 旧志整理 ·

- 校注本《光绪肃州新志》的方献价值和校注成就 吴浩军 ·72·

· 史志快讯 ·

- 甘肃省地方史志系统七项史志成果获甘肃省第十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6·
- 《甘肃省志·农业志》《甘肃省志·国土资源志》《甘肃省志·人物志》通过复审 ·10·
- 《甘肃史志》征稿启示 ·71·
- 《甘肃省志·财政志(1986-2010)》《甘肃省志·商务志(1986-2010)》《甘肃省志·地震志(1990-2010)》《甘肃省志·农垦志(1989-2010)》通过终审 ·80·

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暨《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志》首发式在兰州举行

2017年2月21日下午，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暨《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志》首发式在兰州举行。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省政府副秘书长张正锋主持会议。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副省长夏红民出席会议并讲话。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张军利作工作报告。甘南州副州长石占良在会议上发言。

夏红民副省长在讲话中强调，地方史志工作是我省文化大省建设和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志书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的重要载体，做好地方史志工作意义重大，既可以为我省文化大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也可以为我们做大做强文化产业提供坚实的基础。做好今后全省地方史志工作，各部门、各单位必须提高认识，坚定信念，明确任务，履职尽责，保质保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夏红民副省长在讲话中指出，《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志》通过全面客观地记述灾害灾情、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的全过程，证明只要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华民族优良品质，有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职，我们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通过系统的总结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积累的宝贵经验，对于加强灾害的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提高防灾减灾工作水平，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张军利主任的工作报告回顾总结了两年来的全省地方史志工作，安排部署了2017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任务，对编纂完成《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志》的工作进行总结。工作报告强调，地方史志工作是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光荣事业。当前地方史志工作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艰巨的目标任务，我们必须在省委、

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抓住机遇，奋力拼搏，锐意进取，改革创新，为全面完成地方史志各项工作任务、为全面推进地方史志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大省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石占良副州长在发言中指出，《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



(照片提供：孔令奇)

灾害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志》以鲜活的实例和生动的事实证明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形成万众一心、矢志不渝、共克时艰、战胜灾难的强大凝聚力。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是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亲切关怀、坚强领导、大力支持、科学决策的结果，是省直各厅局和全国、全省人民无私援助、鼎力支持的结果，是各级领导、军队官兵、专家技术人员与灾区干部群众一

道自强奋进、苦干实干的结果。我们坚信，这部志书的出版发行，必将对甘南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民族团结教育服务，为推进舟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其特有的作用和功能。

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委员、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郝宗维、车安宁、李振宇参加会议，各市（州）政府分管领导、地方史志办公室主要负责人，甘肃省志各分卷承编单位负责同志和撰稿人员参加会议。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秘书处副处长梁兴明供稿）

甘肃省地方史志系统七项史志成果获 甘肃省第十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是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面向全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设立的最高奖项，对于充分调动广大社科工作者的研究积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奖开展以来，广大社科工作者紧盯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和重大现实问题，紧盯重大理论创新和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盯紧甘肃地方特色和文化大省建设，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职能，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全面展示了全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实力和理论水准，为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2016年度表彰奖励的甘肃省第十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全省地方史志成果获一等奖1项：西北师范大学尹伟先专著《肃南藏族的历史文化与社会》。二等奖2项：庆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庆阳市地方志办公室报送的《庆阳市志（1986-2010）》（主编张玺、副主编乔孝堂、张芹鹤）；庆阳市西峰区地方史志办公室报送的《重读经典（丛书）》（刘强编著）。三等奖4项：庆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正宁县地方史志办公室、陇东学院报送的《【乾隆】新修庆阳府志》（点校张玺、王立明、齐社祥、马啸）；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报送的《洮州厅志校注》（点校张俊立）；酒泉市地方史志办公室报送的《酒泉农业史》（作者杨文琴、张宏伟、王建华）；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志税务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并报送的《甘肃省志·税务志（地方税务）1994-2010》（主编崔伟栋、副主编杨国珍）。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信息教育处张占社供稿）

在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暨《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志》首发式上的讲话

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副省长 夏红民

今天我们召开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暨《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志》首发式，主要任务是贯彻省委十二届十九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和全省“两会”精神，进一步理清思路、强化措施，推动全省地方史志工作持续健康发展。刚才，宗维同志通报了2016年度对各市州的考核情况；占良同志代表甘南州政府就《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志》发了言；军利同志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对过去两年的工作做了具体总结，对2017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地方史志工作提出了具体安排意见，同时就《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志》的编纂情况进行了说明，我完全同意。

过去两年，全省各级地方史志工作部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的部署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紧盯任务，攻坚克难，埋头苦干，扎实工作，各项工作都有了长足发展。两年间共终审出版省志专志12卷，市州志4部，县市区志15部。尤其是2016年省史志办新班子到任后，把志书编纂作为第一任务紧紧抓在手上，突出“质量”和“进度”两个重点，组织开展二轮省志集中攻坚行动，多次召开二轮省志承编单位协调会，有力地推动了全省三级志书编纂进度。目前，全省已有13个市州、71个县市区开展了综合年鉴编辑工作。其中，白银、天水、酒泉等8个市都实现了市县两级综合年鉴编辑全覆盖。今天发行的《舟曲特

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志》，是我省地方志工作总结重大灾害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经验、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次成功尝试。此项工作自2012年10月启动后，通过编委会办公室和10个牵头单位、56个参编单位的密切配合和通力协作，全体编修人员不辞辛劳、广征博采，历经四年、数易其稿，今天正式出版发行，真是可喜可贺！借此机会，我代表省政府向积极支持、大力配合此项工作的有关市州、有关部门表示衷心地感谢！向参与《救灾重建志》编纂工作的所有编修人员表示亲切的问候！

从总体上看，《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志》观点正确、体例完备、结构严谨、资料翔实、文风朴实、装帧精美，是一部精品佳作。作为我省的第一部专项志，全志通过全面客观的记述灾害灾情、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全过程，证明只要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有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我们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通过系统总结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积累的宝贵经验，对于加强灾害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提高防灾减灾工作水平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部志书的出版，既是向全国人民和社会各界的真诚汇报，又是激励我们弘扬伟大的抢险救灾精神，满怀信心，砥砺奋进的宝贵资料。

下面，我就进一步做好今后一个时期全省地方史

志工作，讲三点意见。

一、提高思想认识，坚定信心做好地方志工作

地方志是横陈百科，纵述史实，系统记录一个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文献。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多次强调要坚持文化自信，加强历史文化建设，指出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李克强总理对全国地方志工作曾经作出“修志问道，以启未来”的重要批示；刘延东副总理在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一纳入，八到位”的工作要求。2015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是“十三五”时期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总规划、总思路和总要求。2016年5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甘肃省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为全省地方史志事业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地方史志工作是我省文化大省建设和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志书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的重要载体，做好地方史志工作意义重大，既可以为我省文化大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也可以为我们做大做强文化产业提供坚实基础和有力支撑。省政府积极支持地方史志工作，多次召开会议协调相关事宜，着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实。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和刘延东副总理的指示、批示精神，积极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作出的重大工作部署，进一步统一思想、深化认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强化措施，细化落实，加快进度，确保按期全面完成二轮修志任务。要以战略目光、站在全局高度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地方史志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强做好地方史志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将其纳入当地文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不断推动地方史志事业健康发展。

二、明确任务目标，履职尽责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过去两年，通过各级修志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全省地方史志事业发展实现了新突破。但还有一些地方和部门“一纳入、八到位”落实得不好、志书编纂进度与省政府确定的目标任务还有较大差距、修志队伍的业务素质还需进一步提高。有关政府及部门要认真查找工作中存在的差距和薄弱环节，采取有效措施迎头赶上。

一要坚持依法治志。2006年5月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关地方志工作的全国性法规，结束了地方志工作无法可依的历史，标志着地方志编纂工作从此进入有法可依、依法修志阶段。2009年1月省政府颁布了《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标志着我省地方史志工作已迈入法制化进程。全省地方史志系统要认真落实好《甘肃省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以修志编鉴编史为重点，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靠实工作责任，开拓工作思路，切实做到“一纳入、八到位”（将地方志工作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切实做到认识到位、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编制到位、经费到位、设施到位、规划到位、工作到位）。要注重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通过开展法律宣传教育、组织执法检查等活动，依法调节和规范社会修志用志行为。要立足地方史志工作和省情实际，探索建立促进地方史志事业发展长效机制，推动地方史志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要加快工作进度。我省的修志编鉴工作总体是好的，特别是2016年进度有所加快。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

年)》和省政府办公厅《甘肃省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要求,完成“两全”目标(到2020年,全面完成省、市、县三级二轮修志规划任务;到2018年,县级以上综合年鉴全部启动,到2020年,全面实现一年一鉴,公开出版,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欠账还比较多,任务相当艰巨。二轮修志和年鉴编辑是省政府下达的指令性任务,各地、各承编单位要依法履行职责,切实加强组织领导,采取有力措施,保质保量完成编修任务。工作进度相对滞后的省志承编单位和还没有编纂出版市州志的地方,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倒排时间,全力推进,争取迎头赶上,确保2020年前全面完成任务,不拖全省后腿。完成志书编纂和开始年鉴编辑的地方,要积极响应并实施好中国名镇志、名村志文化工程,重视部门志、行业志、乡镇村志等各类专业志鉴和地方史的编写工作。地方史工作是党和国家赋予地方志系统又一项新的工作任务,要高度重视,扎实安排,制订计划,加强调研,尽快把此项工作开展起来。

三要提高编纂质量。志书质量是地方志事业持续发展的根基所在、活力所在、价值所在。各级修志部门要把质量第一原则贯穿到修志工作全过程和每一个环节。要坚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注重调查研究,科学运用资料,全面、客观、真实、准确地记载历史。要健全和完善志稿评议、质量评价、终审审查验收、批准出版等制度,规范工作程序,严格审查制度,从程序上和制度上保证志书的质量,努力把志书打造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官书”、“信史”。要正确处理进度与质量的关系,我们虽然面临总体进展不快的压力,但是也不能只注重进度而忽视质量。要加强修志理论的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学习借鉴成功做法和经验,并充分利用现代化手段进行志书编纂,以提高志书质量。要着力加大年鉴编辑工作的创新力度,不断提高编辑质量和水平。

四要加快推进地方史志信息化建设。志书是历史典籍,具有长久的历史生命力。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大趋势下,做好地方史志信息化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各地要切实加大对地方史志信息化建设的投入,保证所需经费。各级地方史志工作部门要善于运用信息化、数字化手段,开展实施“互联网+地方志”行动,让地方志加快活起来,帮助人们快捷、系统、及时地查阅、使用所需资料。省史志办要按照《甘肃省地方史志信息化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要求,抓好年度工作任务落实。要抓紧网站的升级完善,力争2017年完成一轮省市县三级志书、年鉴、期刊、部分旧志、地情资料的数字化转换,真正实现甘肃数字方志馆的目标。

五要不断提高地方志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编修地方志既能保存资料、记录历史,更能服务社会、资政育人。全省各级地方志系统要充分利用地方志巨大文化宝库的资源优势,加大研究和开发利用力度,加强对各类志书年鉴的分析研究、综合加工、深度开发,提供深层次、高质量的地方史志产品,发挥好地方志在引领风尚、教育群众、服务社会、推动发展方面的作用。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引领,紧盯省委、省政府1236扶贫攻坚行动、3341项目工程、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建设以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等中心工作部署,推出一批具有时代特征、反映甘肃改革开放奔小康的优秀方志成果,为全省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建设提供丰富、全面、权威、及时、准确的地情资料 and 信息服务。要积极创新服务手段和方式,利用网络、期刊、媒体和音像制品等宣传、传播地方志资源,开展送志书年鉴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等活动,为全社会读志用志提供便利。要把地方志工作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整合资源、科学规划建设方志馆,开展数字化、网络

化建设，推进地方史志资源的整合、共享与开发利用。

三、加强组织领导，切实为地方志事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地方史志工作不是可有可无的软任务，而是文化建设的硬指标。要继续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史志工作部门组织实施、社会组织和力量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主要领导同志要高度重视并经常过问地方史志工作，分管领导同志要定期听取工作汇报，经常进行检查指导，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要按照“一纳入、八到位”的要求，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经费保障等方面抓好落实，特别是要健全和稳定县级地方志史工作部门及各级承编单位的机构、人员，保证必要的投入，不断改善修志工作条件。要加大宣传力度，广泛宣传地方志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地方史志工作的良好氛围。省史志办要不断强化对全省修志编鉴工作的业务指导和督促检查，及时掌握进展情况，定期向省政府报告。地方史志工作者是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实践者和

推动者，要加大对地方志工作部门干部的任用、培养、交流力度，把政治素质高、事业心强、文笔好，熟悉本行业、本地区情况的同志调整充实到地方史志队伍中来，尤其要选好主编、总纂，建设一支专兼职结合、具有较高素质的地方史志工作队伍。要积极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等进行合作，吸收社会各界热爱地方史志事业的专业人才参与修志工作。广大地方史志工作者要勇于肩负传承文明、记录历史、弘扬文化、服务社会的光荣使命，以对人民、对历史高度负责的严肃态度，以科学严谨、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扎实做好地方史志编纂、管理和开发利用工作，打造能够信今传后、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精品良志。

做好地方史志工作使命光荣、意义重大。希望广大修志工作者能够凝神聚力、辛勤耕耘，勇于担当、砥砺前行，努力开创地方史志工作的新局面，为文化大省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甘肃省志·农业志》《甘肃省志·国土资源志》

《甘肃省志·人物志》通过复审

2016年12月31日，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召开会议，对《甘肃省志·农业志》《甘肃省志·国土资源志》《甘肃省志·人物志》进行复审。会议评审认为，《甘肃省志·农业志》《甘肃省志·国土资源志》《甘肃省志·人物志》的编纂坚持正确的政治观点，志稿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准确，篇目设置合理，体例要素完备，符合新编志书的要求和质量规定，同意通过复审。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省志编纂处余德艳供稿)

强化依法治志 加快修志步伐

力促全省地方史志事业迈上新台阶

在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暨《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

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志》首发式上的工作报告

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 张军利

省政府决定召开的这次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暨《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志》首发式的主要任务是：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对全省史志事业提出的各项要求和全国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精神，回顾总结过去两年来的工作，研究部署2017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任务；对历时四年多编纂《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志》的工作进行总结并举行首发式。省政府对召开这次会议十分重视，夏红民副省长将作重要讲话，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这里，我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的委托，向会议作工作报告。

一、两年来的工作回顾

过去两年，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关怀指导下，全省地方史志工作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和省政府《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工作的意见》以及省政府办公厅《甘肃省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精神，按照“以编纂三级志书为主体、以编辑地方综合年鉴为主导、以信息化建设为依托、以服务社会为支撑”的总体发展思路，以实现到2020年全面完成二轮志书修编

和地方综合年鉴全覆盖的“两全”目标为抓手，以“一纳入、八到位”为支撑，创新思路，强化措施，突出重点，扎实工作，全省地方史志工作取得了新进展。

（一）二轮修志进度明显加快。我们紧紧围绕“两全”目标，把志书编纂作为第一任务，狠抓进度，保证质量，印发了《甘肃省第二轮志书出版印刷规范》、《关于二轮省志编纂过程中几个问题的指导意见》，集中解决存在的问题，志书编纂取得了明显成效。在省志编纂中，夏省长高度重视，先后两次给省直有关承编单位主要负责人致信督促。省史志办先后组织召开三次省志编纂工作推进会，多次给编纂进度较慢的单位下发催办函，同时组织全室业务力量开展二轮省志编纂工作集中攻坚行动，促使尚未启动的10部专志已全部启动编纂，正在编纂的46部专志加快了编纂进度，扭转了省志编纂进展缓慢的局面。我室承担编纂的6卷省志分卷2016年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采取一卷一卷攻坚的办法，加快编纂进度。目前，《建制志》已出版，《人物志》已复审；其余4卷已开始编纂，计划2017年完成3卷的编纂任务，2019年全部完成。两年来，省志分卷出版9卷，终审12卷，复审15卷。截止目前，二轮规划的省志分卷72卷，已出版15卷，终审8卷，复审3卷，完成初稿5卷，在

编38卷。在市县志编纂中,紧盯后进地区,加大督导力度,将指导关口前移,从志书启动编纂到出版,全过程介入指导,确保编纂出版的每一部志书都具有较高质量。2016年,召开了市(州)志办主任座谈会和重点工作督办会,加强对志书编纂、年鉴编辑、信息化建设工作的指导。两年来出版《金昌市志》、《武威地区志》2部,终审《嘉峪关市志》、《兰州市志》2部;终审出版县(市、区)志15部,完成初稿20多部。截止目前,14部市(州)志出版7部、终审2部,85部县(市、区)志终审出版53部。

二是地方综合年鉴编辑出版工作取得了新成绩。我们把地方综合年鉴编辑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定任务来抓,一方面狠抓《甘肃年鉴》的编辑质量和时效。从体制机制入手,对资料收集和编写等每个环节,实行分块包干、定量限时、责任到人的工作制度,使《甘肃年鉴》2016年实现2015、2016卷两部年鉴的编辑出版任务,首次实现了《甘肃年鉴》年内编辑、年内出版。另一方面,狠抓市县综合年鉴的质量和覆盖面。我们通过召开重点工作督办会、调研督查、考核督促等方式,对扩大地方综合年鉴编辑工作覆盖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截至目前,全省已有13个市(州)、71个县(市、区)编辑地方综合年鉴。针对市县刚刚开始编辑年鉴出现的体例、质量等问题,我们加大业务指导力度,促使年鉴编辑质量进一步提升。

三是史志信息化建设迈出了新步伐。加快史志信息化建设步伐,是地方史志工作实现科学发展和为社会提供便捷服务的必由之路和迫切要求。去年以来,省史志办对全省史志信息化建设工作高度重视,决定对现有的甘肃省地方史志门户网站进行全面改造升级,同时新建甘肃地方史志全文数据库,使其成为一个信息交流、成果展示、学术研究、服务社会的综合地情信息平台。目前,甘肃地方史志网站和全文数据库建设已初见成效,上传一轮省市两级志书和年鉴70

部、5300万字。两年来,市县网站建设速度加快,全省已有13个市(州)、68个县(市、区)开通地方史志网站或开设了专门网页。这些地情网站(网页)的开通运行,加强了修志系统的信息交流,拓宽了地方史志工作服务社会的渠道,为社会提供了方便快捷的读志用志平台。为发挥地方史志的独特优势,省史志办联合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共同下发了《关于加强读志用志的通知》,提升了地方史志工作的社会影响力。

四是《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志》顺利完成编纂工作并出版发行。2010年8月8日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举国上下全力支持,灾区人民奋起自救,全省人民大力支援,夺取了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重大胜利,在甘肃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全面客观记述灾害灾情、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全过程,弘扬伟大的抢险救灾精神,传承后世,启迪后人,省委、省政府决定编纂《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志》。2012年7月30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志编纂方案》,成立了编纂委员会,在省史志办设立编委会办公室,共确定10个牵头部门和56个参编单位参与此部志稿的编写工作。在四年多的时间里,经过组织发动、篇目设计、资料收集、志稿编写、统稿总纂、初审评议、复审终审等环节,今天正式出版发行。全志设舟曲概况、灾情灾害、抢险救灾、灾区生活、医疗防疫、社会赈灾、灾后重建、表彰奖励等八编,辅以概述、大事记、附录等,以文为主,图照为辅,约75万字,224帧图照。《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志》的编写,得到了省委、省政府领导和省直有关部门、甘南州、舟曲县的大力支持配合。省领导泽巴足、咸辉、郝远、夏红民等同志对全志的编写多次作出重要批示、指示并亲自审读修改志稿;10

个牵头部门和56个参编单位从组织发动到资料长编的纂写,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省舟曲灾后重建前方协调指导小组、甘南州地方史志办公室、舟曲县地方史志办公室在认真做好各自承编篇章纂写工作的同时,在志稿的总纂及修改完善阶段提供了大量资料。值此志书出版发行之际,谨向所有关心支持《舟曲特大自然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志》编纂工作的有关领导和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五是依法治志进程不断加快。两年来,我们把依法治志作为做好地方史志工作的重要抓手,在认真贯彻国务院《条例》和省政府《规定》、《意见》的基础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规划纲要》精神,提请省政府办公厅于2016年4月印发了《甘肃省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规划》对甘肃省地方志事业“十三五”时期的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省史志办对市县两级制订本区域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了具体要求,先后两次下发催办函,督促各市(州)、县(市、区)尽快制订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截至目前,已有14个市(州)、84个县(市、区)制订了本地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十三五”发展规划的制订,为各级地方志事业长久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六是修志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省史志办根据业务工作需要,每年举办2期修志和年鉴编辑业务培训班,邀请省内外方志专家和有经验的志书主编授课,讲解二轮志书编纂和年鉴编辑工作的有关知识和需要注意的问题,有效提高了修志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水平。各市(州)也分别举办培训班、研讨班,对专业修志人员进行业务培训。省史志办不断加强机关内部建设,将出版发行处更名为信息教育处,调整工作人员岗位,整合人力资源,强化岗位责任,为较好地完成好各项工作任务提供了保证。制订了21项机关管理制度,用制度管人管事,使机关面貌、工作人员精神

状态和业务人员能力素质提升发生了可喜变化。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工作中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一是依法治志意识有待进一步增强。个别地方和部门领导对地方史志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仍然不足,地方史志工作“一纳入、八到位”要求不能完全落实到位。二是全省二轮修志任务还很艰巨。从市县两级来看,虽然任务完成超过了三分之二,但有的市(州)迄今还没有一部二轮志书出版。省志编纂进度较为缓慢,到目前规划的72卷分志仅终审出版23卷,一些省志承编单位虽然启动了编纂工作但进展仍然缓慢。三是地方综合年鉴工作仍有差距,目前全省还有1个州和15个县没有开展综合年鉴编辑工作。四是部分修志部门工作主动性不强,还存在等靠要思想,主动担当意识不强,工作后进局面迟迟没有改观。以上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加以解决。

二、2017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工作

2017年是全面推进地方史志事业发展的关键一年,也是全面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发展规划》的重要一年。全省地方史志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志为主体,志鉴史网用多元一体、协调发展”的工作格局,以完成“两全”目标为己任,全面抓好地方志工作业务建设、制度建设、基础条件建设、队伍建设和理论建设,依法推进全省地方史志事业健康全面发展。全省地方史志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服务一个大局,贯彻一条主线,完成好五项重点工作,推广一条经验,建好一支队伍。

服务一个大局,就是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发挥地方志“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是地方史志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伴随着史志资源的逐渐增多,可开发利用的方面也将会越来越多。伴随着各地各部门宣传推介地方发展优势的意识不断增强,社会各方面对史志资信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各级地方史志工作部门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宗旨,不断探索地方史志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点,要紧紧围绕文化大省和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实现地方史志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融合,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and 满足人民文化生活需求中发挥更大作用。要继续加强全省旧志整理及指导工作,有序推进旧志整理,大力抢救保护罕见旧志,延续文脉史脉,流播子孙后代。各级地方史志工作部门要积极开展读志用志工作,通过发行、交换、赠阅等多渠道、多形式扩大读者面。要加大宣传力度,用最广泛的传播手段扩大读者面,让地方志书真正拥有读者、走向社会。充分利用《甘肃史志》交流平台,鼓励和调动修志人员开展方志理论研究。继续探索与高校、科研机构开展学术研究,加强同省内外同仁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拓展地方史志理论研究的渠道和空间,更好地发挥史志理论研究成果的作用。

贯彻一条主线,就是认真贯彻国家和省上的法规制度,牢固树立依法治志意识这条主线。要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条例》、国务院办公厅《规划纲要》和省政府《规定》、《意见》、省政府办公厅《发展规划》,真正实现依法治志。做好地方史志工作是各级政府领导的法定职责,各级政府和地方史志等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把地方志工作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抓紧抓好,努力把依法治志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做实,推进史志工作的经常化、科学化、法制化。各级地方史志工作部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善思善为、敢作敢为,要抓住贯彻《规划纲要》和《发展规划》的有利机遇,继续积极争取各级党委、政府依法

加强对地方史志工作的领导支持,主动担当,积极作为,进一步发挥学术机构和专家学者在修志工作中的作用,有效协同社会力量,形成推动地方史志工作发展的合力。

完成好五项重点工作,就是修志、编鉴、信息化建设、地情资料编研和地方史五项重点工作。

一是采取有效措施,全力加快二轮修志进度。编修志书是地方志工作机构的主要职能和首要任务。按照《规划纲要》和《发展规划》要求,我省必须在2020年前全面完成二轮修志规划任务。截至目前,规划的72卷省志分志终审出版23卷,占32%;14部市(州)志终审出版9部,占64%;85部县(市、区)志终审出版53部,占62%。总的来看,全省二轮修志进展不容乐观。实现2020年全面完成二轮修志任务目标,时间紧迫,任务艰巨。从省志编纂来看,四年时间完成46卷分志(其中6卷合编为3卷)编纂任务,平均每年需编纂出版12卷分志,压力相当大。从市(州)县志编纂来看,酒泉市已全面完成任务,但有的市(州)至今还没出版或只出版了1部志书,时间相当紧迫。市县和省直承编单位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增强志书“官修官责”意识,思想上要高度重视,倒排时间表,严格落实责任,抓紧开展工作,中间丝毫不能停顿,确保按照时限任务要求高质量完成任务,不拖全省的后腿,不拖全国的后腿。目前正在收集资料、编纂初稿的,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快进度:已经通过评议、初审、复审、终审的,要按照终审意见抓紧修改完善,早日出版发行。已完成市县志书出版的市(州),要积极组织开展名镇、名村志编纂工作,深入推进特色志、部门志、行业志的编纂。质量是志书的生命。在抓好编纂进度的同时,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志书质量标准,严格执行中指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坚持志书审查验收出版标准和程序,强化分级指导督查,切实把好各个质量关口和环节。

二是加大工作力度，推进年鉴工作正常化规范化。地方综合年鉴是可以发挥适时资政作用的重要资料性工具书。按照《发展规划》要求，到2018年，县级以上综合年鉴全部启动；到2020年，实现一年一鉴，公开出版，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从目前情况看，14个市（州）除临夏州外，其他市（州）都已经开始编辑年鉴；86个县（市、区）有71个开始编辑年鉴。未启动年鉴编辑工作的地方，要切实强化责任，狠抓落实，务必从今年开始全部启动年鉴编辑工作。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条例》、《规定》的进一步实施，随着第二轮修志任务的逐步完成，地方史志工作部门的主业之一就是编辑年鉴。已经开展年鉴编辑工作的地方，要总结经验，拓展内容，继续完善体例框架和篇目设置，注意体现年度特点和地方特色，美化装帧版面，增加索引和外文目录，加强文字技术规范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提高编辑出版水平。要不断提高综合年鉴的时效性，我们对《甘肃年鉴》的要求是当年编辑、当年出版，并逐步缩短出版时间，力争在当年8月底前完成编辑，确保10月底出版发行，使其能够成为领导干部的案头书。市县年鉴也要向着这个目标努力。继续加强对各级年鉴的指导审定，按照下管一级的原则，省史志办将加强对市（州）综合年鉴的指导和审查，市（州）修志部门要履行好对所辖县（市、区）年鉴的指导审查。另外，在抓好地方综合年鉴的同时，指导部门、单位编辑专业年鉴，为今后编纂志书积累资料，确保全省年鉴工作规范有序发展。

三是以网站建设为依托，进一步提升史志信息化水平。实现数字化、信息化是地方史志工作的大势所趋，势在必行。现在全国已建成地方史志网站1100多家。我省地方史志信息化工作由于经费和人才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建设相对滞后。为加大全省地方史志信息化建设步伐，省史志办印发了《甘肃省地方史志信

息化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是全国第一家印发信息化发展规划的省份，各级地方史志工作部门要高度认识史志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把史志信息化建设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未完成地方史志网站的市（州）、县（市、区）要创造条件，尽快建成；已开通地方史志网站的市（州）、县（市、区），要按照甘肃省地方史志信息化发展规划要求，不断升级改造完善网站和地情资料库软硬件设施。要广泛应用“互联网+”、微信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逐步实现修志编鉴的数字化、网络化，构建多界面、多渠道、多元化、全方位的信息综合服务体系，最终实现省、市、县三级地方史志网的链接，建成集史志成果展示、史志资源利用、地情资料宣传、史志理论研究于一体的甘肃地方史志网络系统。加快方志资料库建设。方志馆建设已立项的地方要争取尽快建成使用。有条件的地方要继续做好方志馆的建设立项争取工作，暂时不具备条件的地方要加强方志资料室（库）建设，把资料室（库）逐步建设成当地地情信息库，为建设方志馆创造条件。

四是利用方志资源优势，加快地情资料的编研。方志记事包罗万象，被喻为百科全书。各级地方史志工作部门要充分利用方志资料和人才优势，在着力编好志书年鉴的同时，克服人员少、任务重、经费紧张的困难，不断拓宽工作领域，深入研究当地历史文化，积极开展地情资料编研工作。在省政府与各市（州）签订的《2013—2015年地方史志工作目标责任书》中，对市（州）每年出版的地情资料书的数量作了明确规定，并进行了考核通报。今后，省史志办也将依据这一要求，把地情资料的编研列入考核内容之中，每年进行考核，各地方史志工作部门要高度重视，把此项工作抓在手上，积极制订“十三五”期间地情资料编研计划，逐年分步实施。

五是加强调查研究，努力做好地方史工作。地方

史与志书、年鉴如地方志工作一鼎之三足。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史编写出版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明确地方史编写与地方志工作密切相关，要加强与本地区地方志工作机构的沟通协调，具备条件的，可将地方史编写纳入地方志工作范畴，统一规范管理。中指组办公室2017年全国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也对地方史编写管理工作作了安排。地方志机构承担编纂地方史的任务，必将极大提升方志机构的权威度，行政功能将更加突显，资政意义将更加显著。各级地方史志工作部门也要将地方史工作列入年度工作计划，认真进行研究，在地方史编写管理方面有一定进展。

推广一条经验，就是加强基层基础建设，真正做到“一纳入、八到位”。“一纳入、八到位”是刘延东副总理在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期间与代表座谈时总结提出、并在讲话中作为做好地方志工作的基本经验加以强调的，是强化对地方志工作领导、搞好地方志工作部门建设、开展好地方志各项业务的基本保障。这是对三十多年来地方志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凝练，也是对修志历史智慧的精确归纳。全力以赴、扎扎实实地做好地方史志工作，要抓住的“牛鼻子”，就是按照“一纳入、八到位”的总要求来开展工作。“一纳入”就是把地方志工作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各级政府工作任务之中，要把地方史志工作视为政府工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八到位”就是认识到位、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编制到位、经费到位、设施到位、规划到位、工作到位。各级地方史志工作部门只要坚持持续推广“一纳入、八到位”的成功经验，工作就一定能够取得良好成绩；不坚持抓“一纳入、八到位”，工作就会陷于被动，也不会取得相应成效。因此，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们一定要把“一纳入、八到位”作为搞好自身各项

工作的抓手，一件一件、具具体体、扎扎实实地持续抓好“一纳入、八到位”这条经验的落实见效。

建好一支队伍，就是不断提高专兼职修志队伍的综合素质。为适应修志业务的需要和修志人员新老交替出现的断档问题，我们把搞好修志培训工作作为业务建设的重要内容，抓出了一些成效。各级地方史志工作部门目前普遍存在修志业务人员缺乏的现象，有些地方的修志工作只能靠外聘人员支撑，因此，要建立一支党性强、作风正、业务精，相对稳定的高素质修志队伍是地方史志事业长远发展的关键。要加大业务人员的培训力度。各级地方史志工作部门要积极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研讨班，下功夫提高培训和研讨的针对性、有效性。省史志办将定期不定期举办修志业务知识和年鉴编辑知识培训班，不断提高修志人员的业务素质。各级地方史志工作部门要注意抓好领导班子建设。抓好队伍建设关键在领导班子，最主要的因素在“班长”，省史志办将抓住市（州）志办主任这个关键，组织参加各种形式的培训，使其既成为行政领导核心，又成为业务带头人。继续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工作部门组织实施、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地方志工作体制，将社会上史志领域的专家学者、熟悉省情地情的老同志吸收到志书编纂工作中来，把专家学者的学术所长、老同志的经验所长与修志人员的业务所长结合起来，实现优势互补，壮大修志力量。

地方史志工作是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光荣事业。当前地方史志工作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艰巨的任务，让我们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抓住机遇，奋力拼搏，锐意进取，改革创新，为全面完成地方史志各项工作任务、为全面推进地方史志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大省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全省地方史志工作会议暨《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志》首发式上的发言

甘南州副州长 石占良

在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发生6年半、舟曲灾后重建取得全面胜利之际，在省委、省政府的重视支持下，经过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和各参编单位的共同努力，《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志》今天正式出版发行，这是继省委、省政府领导舟曲人民取得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全面胜利后，送给舟曲人民、甘南人民的又一份精神文化大礼。在此，我代表甘南州委、州政府及甘南各族干部群众，向组织参与全志编纂的单位及参编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编纂《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志》是省委、省政府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旨在“留存历史以资子孙后代，提供镜鉴以利万世千秋”。2012年7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下发《编纂

方案》后，在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的组织指导下，甘南州委、州政府立即响应，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召开编纂工作动员大会，调集人员，组织班子，成立机构，启动相关编章的资料收集及初稿撰写工作。历任州委、州政府领导高度重视该志的编纂工作，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州、县史志部门积极配合省上各牵头及参编单位搜集提供第一手资料，在志稿初评、复审、终审等过程中，根据全志编委会的要求，多次征求亲身经历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建议，对入志资料进行反复核实和数次修改完善。

《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翔实的资料、完备的体例、严谨的结构、简洁的文字、生动的语言，图文并茂、客观准确地记录了舟曲“8·8”特大山洪泥石流发生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在国内外社会各界人士的爱心援助下，走出的化危为机、崛起危难的跨越发展之路，全面展示了舟曲受灾群众在藏乡江南书写坚强与奋起、创造美好生活的恢弘画卷。全志充分体现了深挚浓烈的家国情怀，志书把抢险救灾全过程中，共和国总理、将军、部长亲临现场指挥、亲自实施救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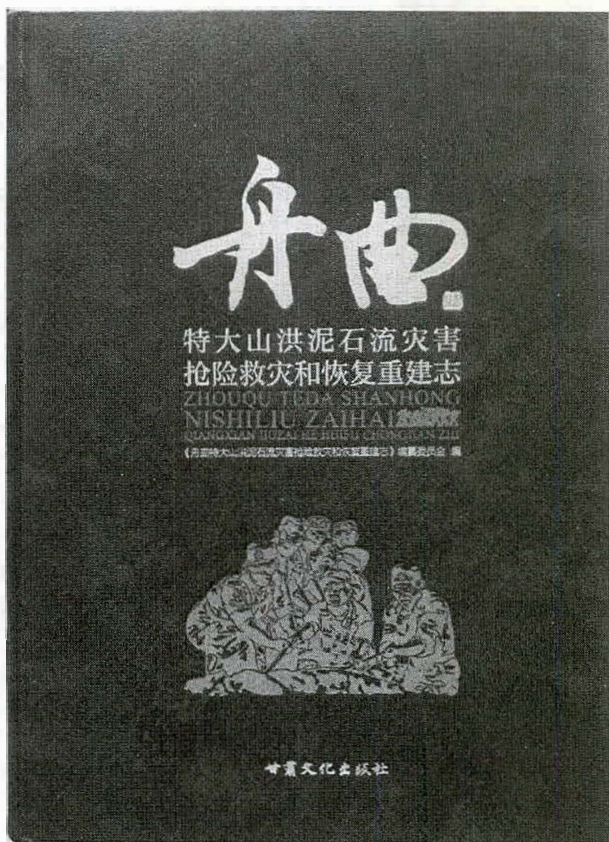


舟曲县城新貌 (图片提供：孔令奇)

动人场面记述得栩栩如生，把全球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下半旗、全体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全国人民一道向舟曲遇难同胞默哀的恢弘场面记述得感人肺腑。阅读该志，往事历历在目，抢险救灾八方驰援、争分夺秒，“大灾不屈、抢险不惧，共克艰难、矢志不渝”的精神令人难忘、令人震撼。灾后重建塔吊林立、机声隆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舟曲，令我们对党和祖国感恩怀德，结草衔环。

《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志》以鲜活的实例和生动的事实证明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形成万众一心、矢志不渝、共克时艰、战胜灾难的强大凝聚力。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是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亲切关怀、坚强领导、大力支持、科学决策的结果，是省直各厅局和全国、全省人民无私援助、鼎力支持的结果，是各级领导、军队官兵、专家技术人员与灾区干部群众一道自强奋进、苦干实干的结果。通读全志，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感悟，就是在大灾大难面前，党始终是我们的主心骨，祖国永远是我们坚强依靠。我们坚信，这部志书必将是一面镜子，“警启世代防患未然”。她又是一本教科书，必将对甘南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民族团结教育服务；它更是一座桥梁，将把所有关心、支持甘南及舟曲的各界人士沟通连接起来，为推进舟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和功能。该志的出版发行，必将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必将成为一部不朽的传世之作，体现出修志编鉴的强大生命力。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



(图片提供：杨成收)

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回顾历史，展望未来，舟曲及甘南各族人民将永远深刻铭记和感恩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的深切关怀，永远深刻铭记国内外各界的大力援助。我们将仔细研读志书的详细内容，从中吸取教训，汲取营养，读志用志，以此为借鉴，以此为鼓舞，以此为动力，感恩图报，继续弘扬自强不息精神，砥砺前行，为实现中国梦谱写甘南藏区新篇章而努力奋斗。同时，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今天的会议精神特别是夏省长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甘肃省地方史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的各项目标任务，努力开创甘南史志工作新局面。最后，衷心祝愿《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志》首发仪式圆满成功！

光绪元年陕甘分闈研究

陈尚敏

摘要：光绪元年（1875年）陕甘分闈，是清代科举史上的重要事件。清咸同之际，为筹措军费，捐纳广开，遂造成仕途壅塞不堪的情状。陕甘分闈在这种背景下提出并被获准，而且还伴有增额，显然，它不只是一个区域科举政策调整的问题。清代分省取士政策以及陕西分省析治是陕甘分闈的缘起；左宗棠力主陕甘分闈，旨在文教治边；西北边疆危机的爆发及其处置，是促成陕甘分闈的重要背景；陕甘分闈后，关于甘肃乡试中额问题，虽是当时捐输广额的结果，但其中也不乏疆臣与枢臣博弈的成分。

关键词：光绪元年、陕甘分闈、科举制度

光绪元年（1875年）陕甘分闈，是清代科举史上的重要事件。但对此问题尚缺乏专门的、深入的讨论，只在有关左宗棠西北事功论述时被提及^①。咸同之际，为筹措军费，捐纳广开，遂造成仕途壅塞不堪的情状。陕甘分闈在这种背景下提出并被获准，而且还伴有增额。显然，它不光是一个区域科举政策调整的问题。清代分省取士政策以及陕西分省析治是陕甘分闈的缘起；左宗棠力主陕甘分闈，旨在文教治边；西北边疆危机爆发及其处置，是促成陕甘分闈的重要背景；陕甘分闈后，关于甘肃乡试中额问题，虽是当时捐输广额的结果，但其中也不乏疆臣与枢臣博弈的成分。

有清一代先后在今西北地区建立三个行省。康熙六年（1667年），陕西分省，析为陕西、甘肃；新疆自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收复，光绪十年（1884年）建省。清代甘肃行省的辖境包括今甘肃省全境、

宁夏回族自治区大部和青海省东部农业区。新疆建省前，天山北路实行府县地区也隶属甘肃行省^②。在新疆建省之后，其文教仍由甘肃学政管理，乡试与甘肃一体在甘肃省会兰州举行。

一、分闈缘起：分省取士政策与陕西分省析治

清代分省取士政策，主要体现在乡、会试上。顺治二年（1645年）始行乡试，各省中额以当地文风高下、人口多寡、丁赋轻重为依据，分为大、中、小省。大省如江苏、浙江、江西等；中省如河南、山东、四川等；小省如贵州、云南、广西等。当时会试中额为预定，凭文取中。顺治九年（1652年）袭明制，会试改分南、北、中卷取中。会试上的这种凭文取中，或是大区域范围的取中政策，都不利于进士在区域间的均匀分布。鉴于此，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会试始行分省取士政策，目的就在于平衡各省

①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设专章讨论左宗棠西北兴学，内容包括兴办书院、兴办义学、刊发书籍、甘肃分闈乡试与分设学政四个方面，于史实考论甚详。继起的研究未能超出秦先生既有的史料和思路范围，故此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推进相当有限。关于光绪元年（1875年）陕甘分闈，秦先生认为自陕甘分省后，“遥遥二百年中，竟没有一位甘肃巡抚或陕西总督想到。光从这一点看，就知道他们对于边方政事，没有放在心上。于是文襄公的举措，格外值得人们的重视了！”参见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3-215页，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秦先生将陕甘分闈之功仅归于左宗棠，其论不仅有实考的地方，而且还有将问题简单化之嫌。

② 清政府对新疆镇迪道及其所属州县采取双重归属体制，一方面在建置上就近划入甘肃省，令陕甘总督辖制，另一方面在行政上命乌鲁木齐都统管理。参见马大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第33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进士中式人数。清代分省取士政策，在保证边隅落后省份有一定数量举人、进士中式的同时，也照顾到了文化发达地区的实际情况。问题在于，会试中额非事先预定，而是取决于各省当年赴考的举人数，也就是说，一个省举人产出的多少，会直接影响其进士中式的数量。康熙六年（1667年），陕西、江南、湖广析治。析出省份因贡院不在本省，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这些省份的士子应试，所以新成立的三个省纷纷要求分闈。

三省当中湖南率先在雍正二年（1724年）得以实现。湖南士子赴试武昌必经洞庭湖，乡试期间正是南方多雨季节，湖水暴涨，应试士子常有覆溺之患。湖南地方官上奏分闈及雍正帝准奏的理由都是基于这一点^①。陕甘分闈的要求始于乾隆元年（1736年），甘肃巡抚许容以陕甘幅员辽阔，奏请分建乡闈，并量增中额，乾隆帝朱批：“此历来定例，遵行已久，何须亟亟纷更为哉”，未予批准^②。乾隆四年，时任川陕总督^③的鄂弥达又奏：“陕甘自分省以来，武举已分闈考校，文乡试仍循旧例，附考西安。伏查甘属各府州县，从前多系卫所改设，今户口日增，人文日盛。统计贡监文生，不下万有余名，每科学臣录送乡试者，亦不下数千人，而赴应试者寥寥。缘士子贫寒十居八九，兼之地方辽阔，各属赴陕程途自一二千里至三四千里不等，山路崎岖，舟车不能直达，盘费更属艰难，殊堪怜悯。查陕甘中额六十七名，甘省除‘丁’、‘聿’字号四名外，近科仅中一二三名。是陕中者十之九，甘省中者不及十之一。又查历科试录，甘省亦有抡元擢魁之人，与西安文风亦不胜悬绝。可否照湖南、湖北之例，酌额分闈，即以兰城武贡院扩充校试；抑或照江南分额之例，酌增额数，陕省取中三分

之二，甘省取中三分之一，俾知进身有阶，于文风不无裨益。”得旨：“此事尚可缓图。”^④江苏、安徽，又称上江、下江，在乾隆元年（1736年）分额，分闈是在乾隆二年由江南总督赵宏恩提出，得到部议准行，但遭乾隆帝严厉斥驳：“安徽赴江宁应试，既不若湖南有洞庭之险，并不若陕甘道路辽阔，徒以增广解额。廷议遂加以应否分闈之请，令部议准行，明系九卿中江南人多，而陕甘无人，遂致事同而异。此风断不可长”，“赵宏恩等不顾事理之当否，遽议分闈，殊属不合，著交部严察议奏”^⑤。这样一来，有谁还再敢提议分闈之事，江苏、安徽终清一代都未能分闈。

清代九位皇帝大都有自己的科举政策。乾隆朝的科举政策有两点值得重视：其一，坚持分省取士政策。分省取士政策本身潜藏着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矛盾，就是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分省取士已实行七十余年，当时还有朝臣对此提出异议，但乾隆皇帝的态度十分明确，坚持认为这一政策具有深远意义。“国家取士，博采旁求，于甄录文艺之中，原寓广收人才之意。且各省文风高下互有不齐，若如钱沅所奏，势必至江浙大省取中人数居其大半，而边远小省或竟至一名不中，殊非就地取才之意。”^⑥其二，由于雍正朝，进士取额较高，加之社会承平已久，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仕途已显壅滞。分闈往往伴随着增额，势必会对仕途带来更大的压力，乾隆帝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因查（乡试一一引者）每科中额一千二百九十名，统十年而计，加以恩科，则多至五千余人。而十年中所铨选者，不及五百人，除各科会试中式外，其曾经拣选候选者，尚余数千。经久愈多，遂成壅积。”^⑦陕西、甘肃；江苏、安徽的分闈提议未能

①参见段伟：《清代湖北、湖南两省的形成——兼论分闈与分省的关系》，《清史研究》2009年第2期。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38—0058—001。

③陕甘总督因辖地变化，其名称也多有变化。

④《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03，乾隆四年己未十月癸卯。

⑤《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39，乾隆二年丁巳三月甲辰。

⑥光绪《清会典事例》卷350《礼部·贡举·会试中额》。

⑦光绪《清会典事例》卷354《礼部·贡举·恩赐一》。

准行，应与此有密切关系。乾隆朝严格控制进士中额人数，自乾隆十三年（1748年）始，取进的进士数量一降再降，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癸丑科降至81名，是清代取录人数最少的一科。

二、文教治边：左宗棠力主分闱意图

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时，陕甘回民起义进入高潮时期。“左宗棠威望素著，熟娴韬略，于军务、地方俱能措置裕如。因特授为陕甘总督，以期迅扫回氛，绥靖边圉。”^①左宗棠在给僚友的信中直言：“度陇之命，专筹剿回。”^②光绪元年（1875年），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驱除阿古柏，收复新疆。两次受命可谓于危难之际，于此也可见出，左宗棠肩负使命之重点所在。但在他实际的施政过程中，文教同样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关陇要事，读书为急”^③；“蚕桑、学校今时急务”^④；“窃惟戡乱虽在武功，而郅治必先文德”^⑤。在左宗棠看来，发展文教同样是西北边疆治理的重要途径之一；换言之，文教治边是左宗棠西北兴学的真正意图。

传统边疆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还是一个民族的和人文的概念。具体而言，边疆是疆域的外缘部分，这里少数民族聚居，同时又处在文明发展的低级阶段。“窃维甘肃地处西北边荒”，“地当西陲冲要，

南北界连藩服荒服。汉蒙回番杂处，其间谣俗异宜，习尚各别。汉敦儒术，回习天方，蒙、番崇信佛教，亘古之今，未之有改”^⑥；“自有天地以来，此方不沾圣人教泽”^⑦。传统教育在实践中往往以“文治”作其别称，强调的实际是它的政治功能。因此，文教盛衰关乎社会治乱，便是题中应有之义。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历代政治追求的理想状态是社会伦常秩序的和谐，教育也就是在传授相关的规范知识。这在实践中就形成了政教相维的特点^⑧。张之洞就说：“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⑨这里的“学”即是“教”。正是基于这一传统，后来也就形成了“官”“师”身份的合一。费孝通就说：“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⑩左宗棠西北兴学，其出发点也是基于这一点的。“臣自征西以来，目睹民俗陵夷，泯焚日盛，不但劫杀争夺，视为故常，动辄啸聚多人，恣为不法。而民间伦纪不明，礼教久斲，干名犯义之案，诛不胜诛”，“不得已，设局鄂省，印刊《四书》、《五经》、《小学》善本，分布各府厅州县”^⑪。人不向学，就不明理，不明理就不知行，乱也就由此而起，因此“柔以诗书，梟獍亦化鸾凤，国

① 《调补陕甘总督谢恩折》，《左宗棠全集（奏稿三）》，第109页，岳麓书社2009年版。

② 《答骆藩门宫保》，《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19页。

③ 《答袁筱坞宫詹》，《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319页。

④ 《答谭文卿》，《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344页。

⑤ 《请旨颁发甘省各属书籍条例者》，《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64页。

⑥ 《请分甘肃乡闱并分设学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五）》，第511页。

⑦ 《岷州吕牧恕禀请颁发书籍由》，《左宗棠全集（礼件）》，第312页。

⑧ 杨念群先生认为，“政教”关系自宋以后成为历代王朝赖以构建“正统性”的手段，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至清代已臻成熟。传统中国对所谓“政”（政治）与“教”（教化）的认知与西方的“政教关系”完全不同。中国历史上不存在类似西方那样的“宗教”与世俗王权相互对抗渗透的关系格局。“政”的涵义不是指单纯的政府行政职能，还包括思想训导、规范行为等内容，调控的对象上自帝王下至民众。“教”也异于西方宗教威权的思想统摄，也不单指教书育人，其涵义是灌输关于社会秩序的道德标准。参见杨念群：《清帝逊位与民国初年统治合法性的阙失——兼谈清末民初改制言论中传统因素的作用》，《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⑨ 张之洞：《劝学篇·序》，《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第545页，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

⑩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5页，香港三联书店1986年版。

⑪ 《请分甘肃乡闱并分设学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五）》，第511页。

家数十年之安也”^①。

左宗棠西北兴学的几个方面，更具根本意义的便是陕甘分闱。传统时代，读书人舍科第便无登进之阶。陕甘合闱时期，甘肃士子赴陕应试，路途遥远，盘费高昂，造成许多士子不能正常应试，“计甘肃府厅州县，距陕近者平庆泾、巩秦阶两道，约八九百里、千里；兰州一道，近者一千三四百里，远者一千六七百里；兰州以西凉州、甘州、西宁，以北宁夏，远或二千余里，或三千里；至肃州安西一道，则三千里或四千里，镇迪一道，更五六千里不等。边塞路程悠远，又兼惊沙乱石，足碍驰驱，较中原行路之难，奚翅倍蓰！士人赴陕应试，非月余两月之久不达。所需车驮雇价、饮食台秣诸费，旅费、卷费，少者数十金，多者百数十金。其赴乡试，盖与东南各省举人赴会试劳费相等。故诸生附府厅州县学籍后，竟有毕生不能赴乡试者，穷经皓首，一试无缘。”因而造成甘肃士气抑塞，“非各省皆知稽古之力，争自濯磨，甘肃士人独安固陋，不求闻达也”^②。左宗棠力主陕甘分闱，旨在激发甘肃地方社会的向学热情。

民族问题往往居边疆治理的核心，文教治边自然关涉到对少数民族施教的问题。夷夏之辨是传统时代民族交往的重要原则。这一观念萌生于西周末年，当王室衰微，四夷交侵，激起了中原华夏族的民族意识，尊王攘夷成为时代主题。但这一观念在发展中不

断被注入新的意蕴，像儒家代表人物孔孟，出于王道思想，提出“有教无类”、“文教怀柔”、“用夏变夷”等观点。在他们看来，如果蛮夷接受了华夏文化就成为华夏一员，这样以文化而非种族的认同模式，为蛮夷向华夏转化敞开了—扇大门。是“用夏变夷”而不是“夏变为夷”。长期以来，中原地区因自身较为发达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始终扮演着文化中心的角色。“夏”代表着文明和秩序，“夷”便承载着野蛮、乱离等负面意义。甘肃“缘地杂华戎，习俗渐染已深，正恐夏变为夷，靡所止极”^③。因此对少数民族施教就有着特别的意义。

清代甘肃，回民起义多次爆发，尤其是同治这一次规模大、历经时间长。左宗棠对回族教育尤为措意：“师行所至，饬设立汉回义塾，分别训课，冀耳濡目染，渐移陋习，仍复华风”^④；“化回、汉之见，则义学不可不设”^⑤。陕甘分闱后，鉴于在光绪元年（1875年）乙亥恩科和光绪二年丙子正科的两科乡试，回族士人未有中式者，左宗棠奏请自下科为始，回卷一科另编“良”字号之例取中一名，一科归入大号合试取中，“俾其观感奋兴，力图上进。不但兴教劝学，道有攸宜，即以移风易俗之政言之，端亦有赖乎此”^⑥。

自明代中叶以降，回族经堂教育兴起。一般认为，经堂教育是在回族社会面对强势主流文化挤压

① 《与黄怒咳少宗伯》，《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375页。

② 《请分甘肃乡闱并分设学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五）》，第511—514页。

③ 《请分甘肃乡闱并分设学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五）》第511页。

④ 《请分甘肃乡闱并分设学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五）》，第511页。

⑤ 《狄道州喻牧光容禀举办地方各事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387页。

⑥ 《甘省回生乡试拟编列字号分科取中折》，《左宗棠全集（奏稿五）》，第603页。左宗棠这一奏请在光绪五年（1879年）己卯科得到具体实施，今甘肃天水回族翰林哈锐记曰：“先是督臣左公宗棠以回族科名向隅请于朝。编良字号，自此科始，俾回族得获隽一人，又虑额少，见遗者多，其次科则合汉族取之，不拘数，永定为例”，“首以良字号获乡荐者为清水马可，字象仪，其家为世族清门”。参见胡圭如编辑：《哈锐集》，第41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另据今藏甘肃省图书馆光绪各科《甘肃乡试题名录》考，除光绪五年（1879年）己卯科的马可外，以“良”字号中式乡试的回族士人尚有：刘耀鼎，西宁人，光绪十一年（1885年）乙酉科；吴必发，秦州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己丑恩科；喇士俊，光绪十九年（1893年）癸巳恩科；吴衍鏊，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丁酉科。

时，旨在维护其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的一种宗教教育形式，本就有着抵制汉文化的意味。“回民鲜读孔孟之书，故不明义理，因而不知趋向。”^①在左宗棠看来，回民起义爆发的原委，就在于文化教育背景的不同。同治回民起义被镇压后，为了安置乱后余生的回民，于同治十年（1871年）二月析平凉府属华亭县之化平川地置化平直隶厅，左宗棠令有司建书院，专以教导回族子弟。“人所别于禽兽者，何也？曰性善也。孩提之童子，孝弟发于性，虽戎与狄无异也。则就所发者，推之君臣之义从孝出也，夫妇朋友从弟出也。同本而异枝，滋乎此，必去乎彼也。故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虽然，性之善，戎狄无异也，而犯上作乱无所顾忌，中国有之矣，戎狄为尤甚，何也？曰：‘此非性之异，教之异也。’”^②书院取名“归儒”，即其旨趣所在。

三、分闹背景：西北边疆危机爆发及其处置

几与陕甘回民起义爆发的同时，阿古柏侵入新疆，沙俄、英国等列强也觊觎新疆，西北边疆处在分裂的境地。在关于驱除阿古柏和恢复对新疆统治问题上，朝野出现了“海防”、“塞防”大讨论，清廷最后做出的抉择是两防并重。

首先，在处置西北边疆危机时，甘肃的战略地位提升，其治理自然受到当局重视，也就是说，在驱除阿古柏收复新疆的过程中，一个稳定的甘肃就显得特别重要。左宗棠就说：“臣兹出塞远征，兵事、饷事必以关、陇为根本，一有间隔，则局势立形滞碍，贻误戎机。”^③

科举在笼络士人的同时，强化地方社会对王朝的

凝聚力。有清一代，对此业已形成朝野共识。“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宜广其途以汇之”^④；“从来致治保邦，必以收拾人心为要务，而士类尤为四民之首，古帝王莫不恩礼有加。诚以士心之所豫附，即为民情之所归往，不可不急为招致，而鼓舞及之者也”^⑤。因受战乱影响，陕甘同治元年（1862年）壬戌恩科、三年甲子科、六年丁卯科三科乡试未能如期举行，战事结束后，陕西巡抚刘蓉上疏要求予以补行，也是以此为出发点来立论的。“诚以人心为国本所系，而士气实人心所关，振励微权，必以选举为急。”^⑥

科举造就了“士”这一群体，他们承载着社会特别的期待。“为士者乃四民之首，一方之望。凡属编氓，皆尊之奉之，以为读圣贤之书，列胶庠之选，其所言所行俱可以为乡人法则也。”^⑦除了极少部分进入体制而成为所谓的政治精英外，大部分究属在野阶层，作为地方社会的榜样人物，发挥着转变民众观念和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作用。士习影响着民风，士人安则社会宁。清代每逢国家重大庆典都要增加乡、会试，此为“恩科”；若爆发大规模、长时段的战争，某些省份的乡试被迫停止，在战后条件允许，清廷总要设法补上。像陕甘在同治朝缺考的三科乡试，其后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癸酉科、光绪元年（1875年）乙亥恩科和光绪二年丙子正科分别予以代补。说到底这是清廷对科举社会功能的成熟认识。

科举史上的分区取士和凭才取士问题，至少在北宋以降已经变得相当突出，出身北方的司马光和出身南方的欧阳修有关科举取士的南北地域之争以及发生在明

① 《安插新抚回众请增设平凉通判都司折》，《左宗棠全集（奏稿五）》，第15页。

② 左宗棠：《归儒书院碑记》，宣统《甘肃全省新通志》卷35《学校志·书院》。

③ 《请简派大员帮办陕甘军务折》，《左宗棠全集（奏稿六）》，第273页。

④ 王重翰点校；《清史列传》卷5《范文程传》，第259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⑤ 《和监鼎题戊午乡试应补各省乙卯未及之数事本》，王戎笙主编：《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六卷）》，第326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⑥ 柏景伟：《泮西草堂集》卷1《请补行陕甘文闱乡试疏（代刘中丞）》，民国十三年刊本。

⑦ 《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48，雍正四年丙午九月丁巳。

代洪武年间的南北榜事件是这一问题凸显的典型例子。由宋代依旧坚持凭才取中，到明宣宗年间分南北中卷，再到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分省取中，科举改革越到后来越是分区占了优势。这一方面有助于各地共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维护地方社会的政治稳定。

其次，西北边疆危机的发生，在根本上反映了传统因俗而治以及重武轻文的西北边疆治理策略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要求。“穷则思变，变则通。”此后，该地区出现了包括陕甘分闈在内的一系列变革措施，与内地的一体化是这些变革的基本走向，首当其冲的就是变新疆的军府制为行省制。

清自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收复新疆之后，在回疆地区实行严格的隔离政策。就文教而言，明文规定青海蒙古、新疆蒙古以及回疆维吾尔族不许学习汉文，严格禁止中华文化在这些地区传播。“至若新疆地方因俗施治，政教未行，愚回信奉其奸比条勒，已成锢习，非革除旧习，渐以华风，望其长治久安，事有难言者”^①；“新疆勘定已久，而汉回彼此扞格不入，官民隔阂，政令难施，一切条教均借回目传宣，壅蔽特甚。将欲化彼殊俗同我华风，非分建义塾，令回童读书识字、通晓语言不可”^②。因此，左宗棠把在回疆分设义塾看成是与修浚河渠、建筑城堡、广兴屯垦等一样重要的治理措施。

甘肃历来为用武之区，清代也不例外，这是缘于其民族构成及特殊的战略地位。“甘肃地处边要，军政为先”，“原设兵额之多，缘地居边塞，北连蒙部，南杂番、回，西路新疆，更番换戍，防范宜周，兵力不得不厚也”^③；甘肃“置省以来，诸凡建设，或因或创，于武备尚详，而文治独略于各省”^④。左宗棠力主陕甘分闈，就是要改变这种治理格局。出任光绪

五年（1879年）己卯科甘肃乡试主考官的陈宝琛，就深知其中用意。“以武节之既厉，不可不修文德以绥柔之，遂乃分陕甘闈，专设甘肃学政政治学校事。”^⑤

早在道光朝，龚自珍就提出过新疆设省的建议，但直到光绪十年（1874年）才付诸实施。乡试阶段为少数民族设专额取中政策，在中国1300年的科举史上其实并不多见。陕甘分闈的提议并非始于左宗棠，但这次提议能够得到清廷认同。这一变革的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变化了的客观外部情势。

四、分闈经过：捐输广额及其他

清代前期，各省乡试中额屡有变化，陕甘乡试中额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定为62名，这一中额一直保持到光绪元年（1875年）分闈时未有变动。同治八年（1869年），左宗棠对陕甘乡试中额在两省中做了分析，甘肃分得21名，“其时宁夏、河湟、安、肃均未收复”，所以甘肃分额较少。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二月十八日，左宗棠正式提出陕甘分闈事宜，在中额问题上，要求“比照各省中额最少之贵州，每科取中四十名”^⑥。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一月接到礼部咨文：“由甘至陕，路程远者自一二千里至五六千里不等，士子跋涉之苦，资斧之艰，诚如该督所称者。所请分闈考试之处，自系为作育士气起见。惟是欲议分闈，应先定中额。”因此要求左宗棠与陕西巡抚“核定具奏”。陕甘为中省，乡试中额本就有限，两省分闈势必要增额。陕西巡抚亨豫增额的依据为，“雍正七年题准贵州定额，有十学取中七名明文。甘学多于黔学，自可比例。又乾隆元年，部复议准尚书杨名时奏江苏、安徽分中时，实增额二十一名”。左宗棠也基本是以这两点为依据的，特别是江苏、安徽分额时增额二十一名，更是可以援引的成

① 《逆酋窥边官军防剿情形折》，《左宗棠全集（札件·咨札）》，第351页。

② 《办理新疆善后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466页。

③ 《甘省兵制亟宜变通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410页。

④ 《请分甘肃乡闈并分设学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五），第511页。

⑤ 陈宝琛：《序》，《光绪五年己卯正科甘肃乡试录》，光绪五年刊本。

⑥ 《请分甘肃乡闈并分设学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五）》，第513页。

例。他的提议是，“赏准甘肃增额九名，合近科分额二十一名，广额十名，则甘省可得四十名。”^①关于广额，“甘肃素称瘠苦之区，此次捐输团练，合银至四千余万两之多。”^②捐输广额最多不能超过10名。

光绪元年（1875年）三月十日，清廷议准陕甘分闱，自本年恩科乡试始。关于甘肃乡试中额：“准增额九名，分额二十一名，共三十名，作为甘肃中额。其甘肃捐输，请广永额十名，查外省捐输，概不准请加永额，业由部于同治十三年十一月间奏奉谕旨在案。所请加广永远中额，应毋庸议。”^③在左宗棠看来，30名既非省份，也与自己在戡乱后“作育人才”的意愿不符，因此左宗棠争取广额的决心并未放弃，只是光绪初元的恩科乡试举行在即，“科场定例，届期之年凡有变更，概不允行”^④。广额之事只有留待将来，“两科举行后，或有能再申前说者”。同治十三年（1874年）捐输广额政策进行了调整，此次以后，无论捐输多少，一律不准广永额，作为政策制定者，“盖新章甫定，不欲自紊其例也”^⑤。

未及两科，左宗棠于光绪二年（1876年）正月八日再次奏请广额，“臣维甘肃瘠苦，本较各省为最。时值兵燹，物力尤艰。各属士民犹能踊跃捐输，先后集银之五千余万两之多，情殊可嘉，亦极可悯”；“甘肃捐输巨款，请加文闱中额，事同一律，自应据情吁恳天恩，逾格特准，将甘肃捐输巨款赏加文闱乡试永远中额十名，即以光绪二年丙子正科为始”^⑥。左宗棠奏请在二月初五获准，“加恩着照所请”，“即以光绪二年丙子正科为始，用示嘉惠士林至意”^⑦。从上

奏到获批，不及一月时间。

甘肃乡试中额最终定为40名，并非按小省成例来确定，而是捐输广额的结果。捐输广额政策消解了科举本身的社会职能，而且还危及到科举维系的社会公平和正义；但同时它又是社会动员的一种手段，有学者将其形象地描述为中央与地方的交换，一个录取名额就意味着一份资源，科举名额分配制度即承担着合理分配社会资源的职能，地方社会尽力输诚，作为补偿，清廷便增加地方科举录取名额^⑧。从这一政策的出台到调整，始终是以维护政权稳定为出发点，甘肃捐输广额的“逾格特准”自然也不例外。面对晚清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捐输广额政策也不能说没有成功的地方。两害相权取其轻。

陕甘分闱经历了从分额到分闱，再到中额几个阶段，其过程可谓是一波三折。其中两个时间点尤应注意：光绪元年（1875年）三月十日，清廷议准陕甘分闱，三月二十八日，清廷诏谕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光绪二年二月五日，清廷议准甘肃乡试广额，二月二十一日，左宗棠从兰州动身，开赴肃州（治今甘肃酒泉）大营，收复新疆的战略决战就此拉开大幕^⑨。特别是在广额问题上，上年三月还是“应毋庸议”，翌年二月便“着照所请”。面对戡乱有功而又新肩重任的疆臣，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左宗棠多次在给僚友的信中抱怨说：“近日部务多吹求细故，而于应筹议之事概置不理，外间催促号呼徒取憎恶”^⑩；“近日部中颇好与外吏齟齬。不佞婞直，易取

① 《援案吁恳分闱增额折》，《左宗棠全集（奏稿六）》，第118-119页。

② 《陈明甘肃捐输实数乞广文闱中额片》，《左宗棠全集（奏稿六）》，第362页。

③ 《请加甘肃文闱乡试永远中额折》，《左宗棠全集（奏稿六）》，第362页。

④ 《复陕甘学政许振祜》，《左宗棠全集（附册）》，第365页。

⑤ 《答邵汴生中臣》，《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460页。

⑥ 《请加甘肃文闱乡试永远中额折》，《左宗棠全集（奏稿六）》，第363页。

⑦ 《谕照左宗棠所请加甘肃文闱乡试永远中额十名》，《左宗棠全集（奏稿六）》，第364页。

⑧ 参见谢海涛：《中央与地方的交换：晚清咸同年间科举录取名额的增加》，《清史研究》2009年第4期。

⑨ 《年表》，《左宗棠全集（附册）》，第493页。

⑩ 《答袁筱坞阁学》，《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402页。

唐代中期吐蕃侵占陇右及其后收复经过

潘守正

唐代中期“安史之乱”爆发后，西部新兴的奴隶主政权—吐蕃趁边防空虚，侵占陇右广大地区。面对强悍的吐蕃，国势转衰的唐王朝任其长时期占据。终唐一代，除秦州属吐蕃屯兵主动归附和清水县及成、武（阶）两州部分地方有所收复外（成、武两州当初吐蕃只占部分地方），其余广大地区直到北宋时才陆续回归中原王朝。期间从765年吐蕃兵大举东出攻略今青海东北诸防屯军起，至1109年最后收复廓州西部止，历时长达353年，创历史上周邻部族占领内地时间之最，也成为陇右地区不堪回首又值得记述的一段历史。

一、吐蕃兴起与唐代前期双方关系

吐蕃为公元7~9世纪在今西藏等地所建政权名称。其来由有两说：一说源自西羌。西羌散处析支（今青海东南河曲之地）以西，有发羌唐旄等部，在鹳提勃悉野率领下崛起，兼并周邻各部，后渐强大；另一说为十六国时鲜卑人所建南凉国秃发氏后代。南凉主秃发利鹿孤（399~402年在位）有子樊尼，在南凉为西秦所灭后，率余众附北凉。不久，北凉又为北魏所灭，樊尼遂率众南奔，于羌中建国，开地千里，以“秃发”为国名，后渐讹为“吐蕃”，子孙繁昌，土域渐广。^①

唐贞观四年（630年），居住在今西藏南部的雅隆



部落首领囊日论（伦）赞在内部争权中被杀，其子松赞干布（《唐书》中称弃宗弄赞）继位。史称松赞干布“慷慨才雄”^②。在平息部落内乱后，又率部陆续以武力征服周邻的苏毗、羊同等部，3年后定都逻些（又称逻娑，即今拉萨），筑宫室，设管制，定法律，确立以赞普（即国王）为中心的奴隶制统治，形成统一的吐蕃王朝。

吐蕃政权初成立，即向外尤其是唐王朝炫耀武力，采用了又打又拉的策略。贞观八年（634年），松赞干布首次遣使到长安向唐廷朝贡。太宗李世民作为回报，遣行人冯德遐为使往逻些临抚。松赞干布从唐使口中得知突厥和吐谷浑可汗皆娶唐公主，遂又遣使往长安，向唐求娶公主，李世民当时未予表态。吐蕃使回归后，称求婚不成是由于当时吐谷浑亦在朝贡，是其从中离间造成。从此，松赞干布便迁怒于吐谷浑。贞观十二年（638年），松赞干布率羊同等部落进

与枢臣博弈的成分。

意尤”^①。左宗棠上奏分闱、广额等问题时，总是要考虑时机的，枢臣的因应亦然，这里不能说没有疆臣

（作者：兰州城市学院文史学院副教授）

① 《答吴清卿学使》，《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404页。

攻吐谷浑。吐谷浑抵拒不住，败退至青海湖以北，大片土地连同牲畜皆为吐蕃所获。接着，松赞干布又采用武力逼婚办法，一面遣军20万屯松州（今四川松潘）西境，一面遣使携金帛往长安迎娶公主。旋未及李世民答应，即令大军进攻松州，击败松州都督韩威，致边境大扰。李世民怒，派吏部尚书侯君集督步骑5万迎击，败其于松州城下，斩首千余级。松赞干布惧，引退兵，并遣使谢罪，但仍坚持请婚。李世民为息兵戈，答应联姻。十四年（640年），松赞干布遣其相禄东赞携礼往长安议亲，李世民许以宗室女文成公主往嫁。十五年（641年），李世民以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送文成公主往吐蕃，与松赞干布成亲。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新继立为帝的唐高宗李治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时因太宗卒，吐蕃国中已有轻唐之意。

唐永徽元年（650年）松赞干布卒，其孙芒松芒赞继位，因年幼，国事皆决于禄东赞。龙朔三年（663年），吐蕃击败吐谷浑。吐谷浑诺曷钵可汗与弘化公主（唐嫁和亲公主）弃国走凉州，地尽为吐蕃据，从而使今青海省除西宁及以东仍属唐外，余尽为吐蕃所有，并以禄东赞统兵屯守。同年禄东赞遣使往长安，为芒松芒赞请婚。李治因灭吐谷浑之故，不许，并以书责之。咸亨元年（670年），因吐蕃攻取西域诸州，南疆尽属吐蕃。为防其东侵，唐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率军10余万讨伐吐蕃，欲复吐谷浑故地，结果在大非川（在今青海湖以南）被吐蕃相论钦陵（禄东赞子）所率40万兵击败，死伤略尽。薛仁贵为此被免死除名。上元三年（676年）闰三月，屯驻今青海湖以南的吐蕃兵大举东出，寇鄯（治今青海乐都）、廓（治今青海贵德县东）、河（治今甘肃临夏）、芳（治今甘肃迭部县东）等州。八月，再寇叠州（治今甘肃迭部县）。仪凤二年（677年）五月，又寇扶州（治今四川九寨沟县），擒镇将。同年十二月，李治下诏讨伐吐蕃。次年双方在鄯

州境战，互有胜败。时文成公主尚在世，双方战端已开多年。永隆元年（680年），吐蕃兵3万寇河源（今青海东北），被左武卫将军黑齿常之击败，旋以黑齿常之为河源军经略大使，开屯镇守，战守遂有备，吐蕃一时不敢进。

武则天执政后，屡遣军讨伐驻屯青海湖一带的吐蕃兵，或胜或败。证圣元年（695年）七月，吐蕃兵攻洮州（治今临潭县）。武则天以王孝杰为肃边道行军大总管讨伐，次年双方战于素罗汗山（在临潭境），结果唐军败，王孝杰被贬为庶人。久视元年（700年），吐蕃兵寇凉州（今甘肃武威），被陇右驻军大使唐休璟督军击败。长安二年（702年），吐蕃赞普器弩悉弄欲复当初松赞干布之辙，以武力逼唐再嫁公主，亲率万余人攻悉州（在今四川黑水东，一说攻茂州，邻近悉州），都督陈大慈与其四战，皆破之。次年，器弩悉弄遣使献马千匹、金二千两以求婚。武则天许之。旋因器弩悉弄卒于南部平叛之战，7岁的儿子弃隶缩赞继位，因其尚幼，联姻暂时中止。此后，吐蕃势转衰，数年间边境无战争。至景龙四年（710年），为履行先前承诺，且图边境无战事，中宗李显以养女金城公主往嫁弃隶缩赞（松赞干布玄孙，时13岁）。

但这次和亲几乎未对边境安宁起到作用。就在金城公主出嫁后第四年，即唐开元二年（714年）秋，吐蕃将盆达延（或书盆达焉）、乞力徐率众10余万攻洮州（今临潭），并分兵掠兰州和渭源（今甘肃渭源县，时属渭州），掠取牧马。玄宗李隆基令左羽林将军薛讷为陇右防御使，右骁卫将军郭知运为副使先行往河、陇募兵，以拒吐蕃。十月，吐蕃兵复寇至渭源。李隆基怒，下诏准备亲征。旋薛讷督军与吐蕃战于武街（在今临洮境，即渭源西），击败吐蕃兵。接着，陇右群牧使王峻选700名勇士，着吐蕃兵服在武街西20里袭击盆达延大营。番兵以为唐大军至，自相残杀，死者万计。旋王峻、薛讷合军，与吐蕃兵战于长城堡（在今临洮县），再获全胜。吐蕃兵前后被杀

数万，所掠牲畜被截回。吐蕃既败，李隆基遂止亲征，令设陇右节度大使^{〔3〕}，统鄯、廓、兰、河、临、洮、岷、叠、宕、渭、秦、武等12州军事，防御吐蕃，并以郭知运为节度大使。开元四年（716年），吐蕃兵又攻松州，结果失败，遂于七月遣使赴唐请和。开元五年（717年），郭知运遣军主动出击，收复河曲（在廓州以西，今青海共和县南），是为吐蕃北进攻灭吐谷浑后唐军第一次主动出击并收复失地。此后20多年，吐蕃兵再不敢窥伺陇右。

唐开元十四年至十七年（726~729年），吐蕃兵多次转攻河西甘州（今甘肃张掖）、瓜州（治今甘肃瓜州县）等地，均为唐守军击败。于是，吐蕃又遣使求和，李隆基允许修好。接着，相互使节来往，并在甘松（今四川松潘）开互市，再进入和平相处阶段。至开元后期，吐蕃兵又屡次侵扰唐境，掠夺财物、牲畜。开元二十八年（740年）金城公主卒，吐蕃遣使告丧并请和。李隆基因吐蕃屡犯边，不许。二十九年（741年），吐蕃兵40万进侵承凤堡，至河源军，再入安人军（或称安仁军，在鄯州西，即今青海湟源县境），结果被击退。时唐王朝重视西北边防，设陇右、河西两节度使分防吐蕃。其中陇右节度使于边境

置有河源、安人、白水、振武、威戎、漠门、宁塞、积石、镇西等10军，绥和、合川、平夷3守捉使，总兵7.5万，分屯鄯、廓、洮、河4州境。天宝六载^{〔4〕}（747年），以猛将哥舒翰（突厥人）为陇右节度使，在九曲（今甘肃禄曲）、石堡城（在鄯州西）屡败吐蕃兵。一时，陇右防御甚固，吐蕃兵不敢觊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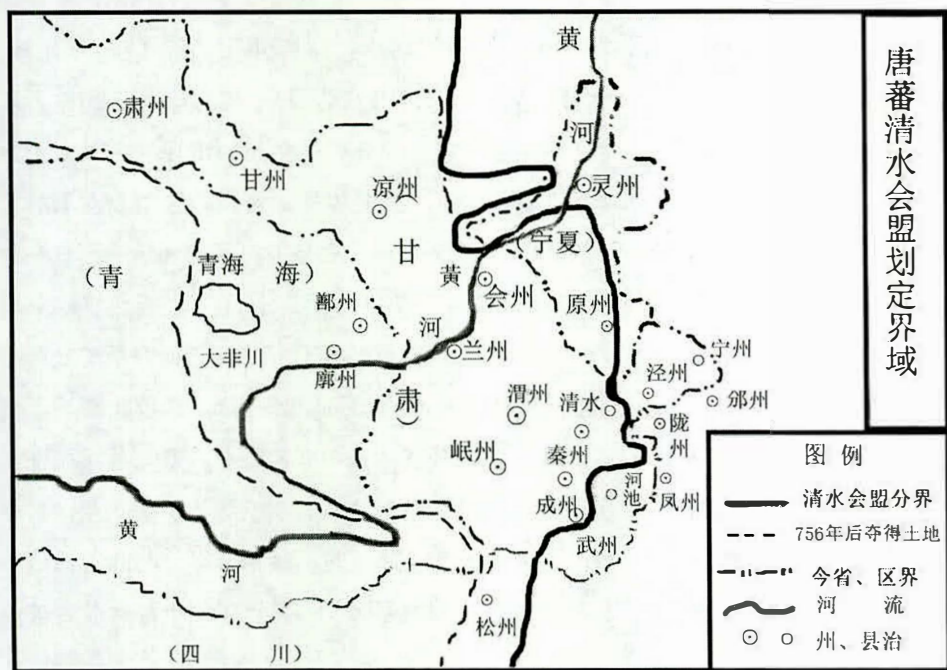
二、吐蕃侵占陇右

唐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拥兵叛唐，京师长安危急。李隆基诏令天下兵马勤王平叛，陇右部分守军东调。吐蕃见此机会，即兴兵东进，欲取陇右。

唐至德元载（756年），吐蕃兵大举出击，攻掠陇右节度使所统诸军、城，连陷威戎、定戎、宣威、神威（以上均在鄯州境西，即今青海西宁市以西、以北）、制胜、金天（在廓州以西，今青海共和县南）、天成（在河州境西，即今积石山）等军和石堡、百谷、雕窠3城（均在今青海贵德一通化一带）。时安禄山叛军已攻入关中，李隆基避往四川，太子李亨继位于灵武（在今宁夏）。二载（757年）二月，李亨抵凤翔前线，督军平叛，再次下令调陇右、河西以至西域军会攻京城长安。吐蕃兵见唐军悉数东调，防卫空虚，即于同年十月占领鄯州（时称西平郡，治今青海

乐都）。上元元年（760年），再占廓州。至此，今青海境全为吐蕃占据。

唐宝应元年（762年），吐蕃兵大举东出，陷临洮（即洮州，治今甘肃临潭县），取渭（治今陇西县）、秦（治今天水市秦州区）、成（治今甘肃西和县）等州^{〔5〕}，直至陇坻，所至均如进入无人之境。广德元年（763年），河（治今甘肃临夏）、兰（治今兰州市）等陇右诸



州以及河西皆陷于吐蕃⁽⁶⁾。同年七月，吐蕃兵会氏、羌、党项、吐谷浑计众20万又入大震关（在陇坻），袭陇州（今陕西陇县）；十月，袭泾州（治今甘肃泾川）、邠州（今陕西彬县），直攻入长安，肃宗李亨东走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吐蕃兵遍掠京城财物后有返回陇右。至此，“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⁷⁾。

吐蕃占据陇山以西整个唐土并屡攻泾州、邠州、灵州（今宁夏灵武）不克后，向唐廷提出和议。衰落至极的唐王室此时再不顾眷已被吐蕃占领的广大地区，只求吐蕃不要再占去更多领土，尤其保住京都所在的关中地区，便答应和议。建中四年（783年），唐凤翔兼陇右节度使张镒与吐蕃宰相尚结赞会盟于清水（今甘肃清水县），划分疆界，确定以陇州西与秦州清水县相界的陇山为界，向北延至原州（今宁夏固原），再迤北至灵州南；向南延至成州同谷县（今成县）西，再迤南至今甘、陕、川交界。至此，陇右之地除属凤州（治今陕西凤县）的河池（今徽县）、两当（今两当县）和成州、武州（治今武都）部分地方仍属唐外，其余均属吐蕃。总计占去唐土约80万平方公里（不计今青海省中部、西部、南部756年以前已由吐蕃占据的地方），使吐蕃疆域扩及今甘肃省陇山以西全部地区（只陇山以东庆阳和平凉一部以及两当、徽县、成县等地未被占领），宁夏灵武以南，青海全部、新疆大部（不计乌鲁木齐—哈密一线以北地区）和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东部（即理县、黑水、松潘一带）。

三、陇右收复过程

在短短数年中大片领土被吐蕃占领后，唐王朝不时有忧国之士提议恢复，但自“安史之乱”被平息后，地方势力坐大，国力日衰，只能望而兴叹。大中年间秦、原、安乐3州的收复，主要还是缘于吐蕃守兵的厌战而主动归附。而其后，已收复诸州还经历了反复（原州、安乐州和秦州北部又被吐蕃占据）。直至北宋，陇右诸州才逐渐得以收复。从唐大中二年

（848年）崔珣收复清水开始，至北宋大观三年（1109年）溪哥城降宋为止，期间延续261年，可谓是放弃容易收复难。

秦州等州的收复 唐会昌二年（842年），吐蕃达摩赞普卒，因无子，其妃琳氏立兄尚延力之子、3岁的乞离胡为赞普，自己把持政权，由此引起国内动乱。洛门川（今甘肃武山县洛门镇）讨击使论恐热起兵讨伐琳氏，内战多年不能息，吐蕃政权迅速转衰。大中二年（848年）十二月，唐凤翔节度使崔珣奏请收复陇右，旋遣军先克复清水⁽⁸⁾。其时，由于论恐热所部被吐蕃相、邠州节度使尚婢婢击败，秦州等地吐蕃守兵多有厌战之意，适论恐热又“扬言将请唐军50万共定其乱，保渭州，求册为赞普，奉表归唐”⁽⁹⁾。于是，秦州、原州（治今宁夏固原）、安乐（在今宁夏中宁至同心县一带）3州和石门、驿藏、制胜、石峡、木靖、木峡、六盘7关（多在原州境内，即今宁夏南部）守兵表示愿意归唐。三年（849年）二月，宣宗李忱遂命太仆卿陆耽为宣谕使，诏泾原、灵武、凤翔、邠宁、振武节度使分别出兵接应。七月各节度使分别接收3州7关，其中秦州为凤翔节度使李玘接收，原州和诸关为泾原节度使康季荣接收。八月，李忱又下诏“募百姓垦辟三州、七关土田，五年不租税。自今京城罪人应配流者皆配十处”⁽¹⁰⁾。于是，秦、原、安乐3州在被吐蕃占据87年后，成为首批回归于唐的地方。收复后，于“故地置官守”⁽¹¹⁾，即恢复旧有建置。秦州仍统上邽、成纪、陇城、清水、伏羌5县，其治因战乱破坏，由上邽迁成纪（今秦安县中部叶堡川）。咸通十三年（872年）复置长道县，划隶秦州。安乐州则于同年改称威州。

山南诸地收复 唐大中三年（849年）秦州等3州收复后，朝廷诏令“其山南、剑南边境有没蕃州县，亦令量力收复”⁽¹²⁾。山南即秦岭以南。宝应初吐蕃东下时，成（治今西和县南）、武（治今武都）2州部分地方为吐蕃占领。其后划界中，成州唯同谷县（治今成

县)属唐。唐一度置行成州于同谷;武州亦为吐蕃据,唐曾设行州于州东。大中四年(850年),唐收复成州^{〔13〕},咸通(860~874年)中又复武州^{〔14〕}。是为继秦州等3州后又收复的2州。咸通五年(864年),唐设天雄军节度使,统秦、成、武(唐末景福初改名阶州)3州军政^{〔15〕}。与此同时,剑南还收复维州(在今四川理县)和扶州(今四川北九寨沟一带)。

河、渭等州回归的反复 由于实力所限,大中年间对秦州以西陇右诸州朝廷未作收复打算。大中五年(851年),河西沙州(治今敦煌)人张义潮率当地汉民起义,驱逐吐蕃守兵,不久渐据有河西以及陇右兰、河、鄯、廓等11州,奉表归唐。唐以张义潮为十一州观察使、归义军节度使,使统诸州。然不久因唐廷未给以实际支援,甘、凉等州为回鹘所据,张义潮仅固守沙、瓜2州,陇右兰、河等州“唯名存有司而已”^{〔16〕},其地仍为吐蕃占据。大中十一年(857年),吐蕃部落首领尚延心以河、渭2州地归唐,唐廷命尚为武卫将军。唐秦成防御使李承勋恐尚归唐危机自己己得地位,使尚延心远居凤林关(在河州境,即今临夏境),并奏请改授为类似番官的“河渭都游奕使”^{〔17〕}。尚延心的急切归唐之心为李承勋所阻,遂渐生冷淡,终致各部离心,乃独成部落分据河、渭2州地,使其地失去收复并正式归入唐版图机会。此后,秦州以西10州地直至北宋初仍由吐蕃部落占据。

吐蕃部落 再次攻略秦、原等地 大中三年(849年)原州收复后,将原设于泾州之临泾(今甘肃镇原县)的行原州归治平高(今宁夏固原)。大中五年(851年),于原州北萧关新设武州。原州南部一直未被吐蕃占据的平凉县(今甘肃平凉市)则早在元和四年(809年)设为行渭州(原渭州治今陇西县,辖定西等地)。吐蕃逻些王朝历琳氏干政,终致灭亡后,居住在陇右的吐蕃部落各自为政,其中强者又蚕食唐土。唐广明元年(880年),居于旧会州(治今甘肃靖远)、渭州(治今陇西县)一带的吐蕃部落攻陷

行渭州(治平凉),旋又陆续攻占原州(治平高)、武州(治萧关)、威州(即原安乐州),据其地^{〔18〕}。中和四年(884年),唐收复行渭州,但其余诸州则未能收复,致大中三年所复原、安乐2州复为吐蕃占据。唐王朝不得不又于临泾置行原州,于潘原(在平凉东)置行武州,于凉州镇设行威州。

吐蕃当时是否攻略秦州,史籍不载。但从至五代后唐时秦州只统成纪、清水、长道3县而不载上邽、伏羌、陇城和原上邽县地由军镇分别统辖^{〔19〕}推知,大约在广明元年(880年)或稍后,吐蕃对秦州亦发动了进攻,以致位于州北的陇城县和州西的伏羌县又为吐蕃部落占据。为加强防御,避免吐蕃的进一步深入,上邽县驻屯重兵防卫,由镇将长期分屯,以致其县撤销。其事从《新五代史·职方考》所载“秦州天水、陇城,唐末废”中亦可得到佐证。由此可见,大中三年收回的秦州,亦因吐蕃的复侵,部分地方再次丢失。

北宋初朝廷的消极退让 史载五代时,吐蕃已微弱,“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各有首领,内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20〕}。至北宋初,吐蕃部落主要分布在秦州以北、以西广大地域内。势弱、有求时附于宋;势强、无求时据寨自立,甚至与宋军民对抗。接壤宋境,其生活习惯接近汉民,过着定居生活且附宋者,史称“熟户”,由宋委以官职,称羁縻之地;大部地方以牧或牧猎为业,且性喜掠夺者称“生户”。宋建隆三年(962年),居住原伏羌县(今甘谷县)境的吐蕃部落首领尚波千(或称尚波于、尚巴约),以宋设在夕阳镇(今天水市麦积区新阳镇)以西的采造务侵犯其利益为由,率部族千余人攻采造务^{〔21〕}。知秦州高防令守军出战,将其击败,并俘获47人。太祖赵匡胤闻讯,因其时取得政权不久,不愿西北有事,亦无意收复西部疆土,遂以枢密使吴廷(延)诈为雄武节度使、知秦州,让其释放被俘者,撤销采造务。尚波千感悦,献伏羌地归宋。是伏羌地即今甘谷县东南部地,旋设为伏羌寨,

由宋军屯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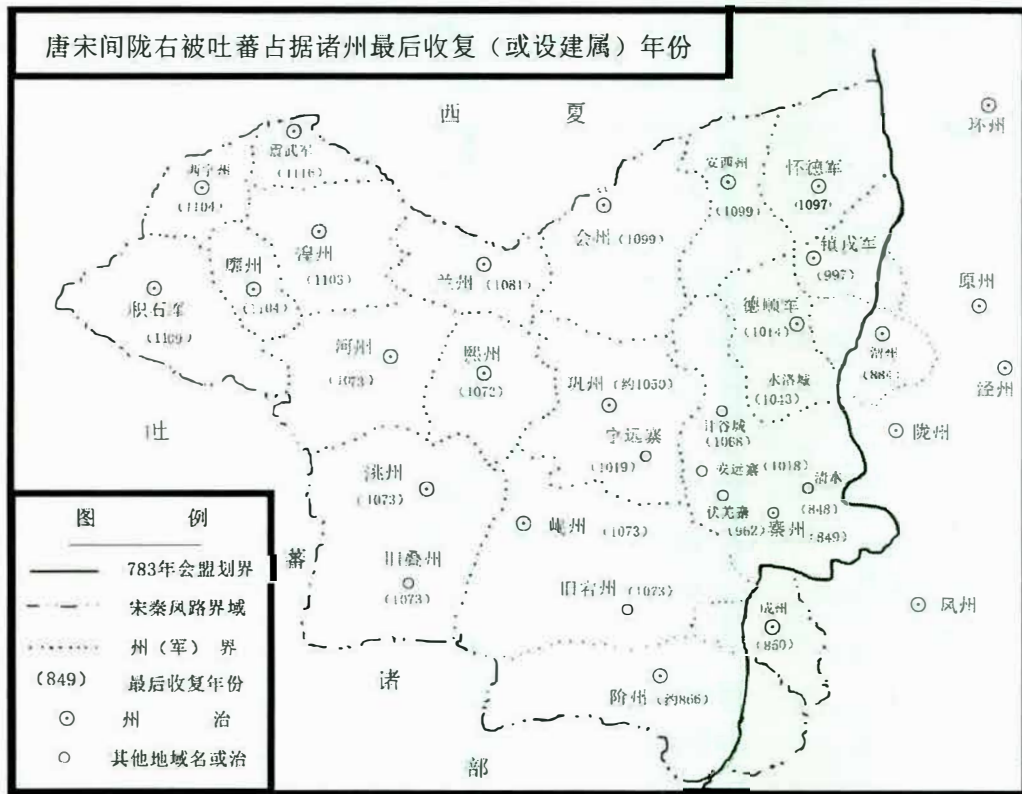
之后，宋廷一再告诫边界军民不得妄动。但吐蕃部落中一些强悍者把宋廷的忍让当做软弱可欺，不时骚扰边界，而秦州首当其冲。从开宝八年（975年）至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间，吐蕃部落连续攻略秦州腹地三阳寨等地，迫使宋在秦州境内防线南移，秦州治连同成纪县治亦南迁旧上邽城（今秦州区市区），今秦安大部、张家川一部原秦州辖域尽弃于吐蕃。旧伏羌县东部地，按双方约定，渭河南属宋，河北属吐蕃。淳化四年（993年），温仲舒出知秦州，将今甘谷西部与武山交界一带渭河南吐蕃居民悉令移居渭河北，并立堡栅以限。太宗赵光义恐生边患，将温调离⁽²²⁾，又派参知政事寇准往秦州安抚。

咸平至大中年间的收复 宋咸平年间（998~1003年），党项羌人李继迁率部叛宋，攻陷宋属灵州（今宁夏灵武），并由此向西、向南攻略，促使居于陇右北部的吐蕃部落进一步分化。已接受汉民生活习俗的熟户，纷纷要求内附。咸平六年（1003年），原、渭（治今平凉之渭州）

2州吐蕃32族内附，陇山西麓今静宁东和宁夏隆德一带的延家族首领秃逋等部亦内附。此前至道三年（997年），宋于新附旧原州治平高（今固原）置镇戎军戎守，至景德元年（1004年），先前叛去的吐蕃部落复至镇戎军归附。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知渭州曹玮督筑笼竿城（在今宁夏隆德县），后又筑得胜寨（在今宁夏西吉县）。至

此，陇山北段（今六盘山）一带俱隶属宋。

与此同时，宋边臣在朝中主张收复失地的大臣支持下，也主动出击，攻略吐蕃所据之地。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骐驎使张佖出知秦州后，率部驱走今武山东南部吐蕃部落，先后兴建四门寨（在今四门镇）和大落门寨（今洛门镇）。八年（1015年），吐蕃赞普后裔唃廝囉聚众数十万在宗哥城（或称宗噶尔，在今青海西宁市东南）复立吐蕃政权。朝廷见其势大，遂以曹玮为泾原仪渭镇戎缘边安抚使兼知秦州，主持陇右防务。九年（1016年），居住伏羌北部的吐蕃部落头领厮鸡波与宗哥部首领李磨论联络，欲起事反宋。曹玮得知后，即率部围剿，厮鸡波大败西走。曹玮令斡室帐，进占其地。接着，唃廝囉派马波叱腊（臆）、鱼角蝉率兰、河、洮等地吐蕃部落数万之众至伏羌，声言将在数日内攻取秦州，在秦州大会诸将。曹玮与钤辖高继忠、都监王怀信等率宋军设伏于三都谷（一说二都谷），及吐蕃兵至，大举出击。吐蕃兵大败，战死、被杀千余人，损失牛马杂畜、器仗3万



多。马波叱腊不甘失败，立营野吴谷，伺机再战。曹玮选数百精壮突入其营，毁其营地。从此，唃廝囉再不敢东侵。接着，曹玮又击败居住秦州西部永宁寨（在今甘谷西）附近的陇波、他斯麻两部族。天禧元年（1017年），曹玮再讨平居住在伏羌一带的鬼留家族。二至三年（1018~1019年），曹玮征募役丁，筑安远寨（今甘谷定远镇）、宁远寨（今武山县城）以及静边寨（在今静宁县东），使宋直接控制地区扩至今甘谷县大部、武山县中东部及静宁县境。

庆历至皇祐年间的收复 由于西夏势力南侵，不时有吐蕃族人西迁，未迁者益感孤立。庆历三年（1043年），居住水洛城（今庄浪县城）吐蕃生户头领元宁（或为亢宁）受静边寨主刘沪诏抚，以城归宋。同年，宋在笼竿城置德顺军，辖今静宁、庄浪和宁夏隆德、西吉县地。五年（1045年），又置陇城寨（在今秦安陇城镇），标志着秦安东北部归属于宋，使陇山西麓宋域南北连成一片。皇祐（1049~1054年）中，因吐蕃族内附，陕西转运副使、权知秦州范祥^[23]募民筑哑儿峡寨（在今武山县西邻陇西界），接着又筑古渭寨（今陇西县城）。其后由于吐蕃部族大部西迁，又于治平四年（1067年）置鸡川寨（在今通渭县东），熙宁元年（1068年）置甘谷城（又称竿策城，在今甘谷县北部与通渭交邻处）。熙宁五年（1072年），宋以古渭寨置通远军。从而，今秦安、通渭、陇西全境均归属于宋。唐宝应以前的秦州至此亦全归隶宋统。宋在陇右已置有秦、成、阶3州和通远、德顺、镇戎3个军，计6个州级建置（设治平凉的渭州则不属陇右）。

熙宁年间收复陇右西部 由于西夏加紧向南扩张，使陇右形势更为复杂。熙宁元年（1068年），进士王韶在陇右一带实地考察后，向朝廷上《平戎策》，认为要击败西夏，必先收复河湟，即陇右西部。四年（1071年），朝廷在王安石力主下，纳王韶策，设洮河安抚司，由王韶主持收复河湟事。时今渭

河源头一带的吐蕃部落，以青唐部最强，大首领俞龙珂号称有12万部族，西夏欲拉拢其共同反宋。王韶至边地后，亲率数骑往见俞龙珂，晓以利害，劝其归附。不久，俞龙珂归宋。五年（1072年）秋，王韶派军击败吐蕃部族头领蒙罗角等，筑渭源堡（在今渭源县城）。居住河州吐蕃头领木征（《续资治通鉴》中称玛尔戩）欲东渡洮水阻击宋军，被王韶亲率宋军击败，其部2万余众降宋，遂于武胜（今临洮县）筑城。不久，朝命于其地置熙州，并设熙河路，以王韶为经略安抚使。六年（1073年）春，王韶收复河州，俘木征。至秋，又率军南下，进讨宕州（治今宕昌县），所至吐蕃部落皆降。九月，再进军岷州（治今岷县县城），吐蕃首领木令征（《续资治通鉴》中称摩琳沁）亦不战而降。居住叠（治今迭部县）、洮（治今临潭县）2州部落闻讯，皆遣人向王韶归顺。是次南征，王韶率众行军54日，转战1800里，得洮、岷、宕、叠4州。神宗赵顼闻讯，甚为惊异，加王韶左谏议大夫，赐端明殿学士。不久，叠州并入洮州，宕州并入岷州，熙、河、洮、岷4州和通远军（崇宁三年即1104年改为巩州）均上隶熙河路。陇右西南部始归于宋。

北宋后期收复陇右西北部 宋元丰四年（1081年），朝令西北五路出兵伐西夏。九月，熙河路经制使李宪督军败西夏兵，收复兰州城。兰州本为吐蕃部族占据，景祐三年（1036年）始易手西夏。宋军攻取兰州后，筑城置官守，并将熙河路改称熙河兰会路，辖及兰州。元符二年（1099年），宋始置会州（治今靖远县），又在会州东置西安州（治今宁夏海源），各置城设戍军屯守，以备西夏。至此，陇右西北部回归于宋。同年，洮西安抚使王瞻出兵攻青唐、邈川，即兰州以西的原鄯、廓2州地，吐蕃部落头领陇拶（唃廝囉裔曾孙）归宋。宋旋将原鄯州地分为鄯州（治今青海西宁市）和湟州（治今青海乐都），原廓州地仍为廓州。后因其地吐蕃族人不愿归附，群起反宋，致

3州又放弃。崇宁二年（1103年）宋以知河州、权熙河兰会路经略司事王厚和监军使童贯督军10万平叛，大败据守湟州的吐蕃族人，收复湟州（后改乐州。其北部于政和六年析为震武军）。三年（1104年），王厚、童贯与陇右都护高永年等督军向鄯、廓进兵，吐蕃部落屡败，余者投降，遂再复2州，旋鄯州改称西宁州。大观三年（1109年），居住廓州以西的藏征扑哥以溪哥城（在今青海贵德西）降宋，宋将其地设为积石军。至此，陇右西北部今青海湖以东地始最后收复，并将原2州析设为3州、2军。

四、总结

吐蕃作为一个在短期内迅速崛起的西部边地民族，占据陇右大部地方长达数百年，可谓历史长河中的异常现象，而中原王朝历经三代又迟迟不能完整收复其失地，更为历史中奇特之事。

唐玄宗李隆基晚年奢侈腐败，利令智昏，纳儿媳杨氏为贵妃，任用奸佞杨国忠，宠幸胡人安禄山，结果安禄山叛变引发国内动乱，京都失守，最后不得不将防御吐蕃的主要兵力东调勤王，使吐蕃趁势东进。尚没有安禄山之乱，就没有陇右守军东调，也就不会有吐蕃东侵。故追根溯源，还是李隆基的昏聩引发了陇右大片国土的丧失。

对历史上唐与吐蕃的关系，现今人们多侧重于记述文成公主嫁与松赞干布促进双方友好关系的一面，而对吐蕃长时期占据陇右大片领土的史实较少述及。其实，唐公主两次下嫁吐蕃，都是吐蕃采用了萝卜加大棒的手段，通过武力威胁迫使唐王室答应和亲的，本身就带有很大的勉强成分。贞观十二年（638年）松赞干布为娶唐公主，一面遣使请婚，一面又派军20万围攻松州，进行武力威胁。其后李世民虽然是在将围攻松州的吐蕃军击退后答应和亲的，但吐蕃的武力威胁动机显而易见。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赴吐蕃，至咸亨元年（670年）吐蕃即攻取时属于唐的西域，迫使唐廷撤销设在西域4镇。接着，双方战

事再起。可知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只换来了不到30年的和平。其后武则天于长安三年（703年）的再次许婚，亦是在吐蕃进攻不胜烦扰的情况下答应的。至景龙四年（710年）金城公主往吐蕃联姻后，吐蕃兵开元二年（714年）即向洮州、渭源等地攻略。第二次和亲，只换来了4年的平安。两次下嫁公主，计维持34年平安。在唐与吐蕃交往的270多年（634~907年）中，只占其中较短一段时间。故对唐与吐蕃的和亲，应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

吐蕃的长期占领，对陇右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其破坏是严重的。首先表现为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和迁徙。由于不愿受吐蕃奴隶主的统治，大批汉民在吐蕃占据后纷纷外迁。与此同时，由于吐蕃部族头领贪恋陇右的富庶和地理条件的优越，将大批吐蕃部落迁入新占土地，使其地由过去的以农耕为主又反退为畜牧为主。未迁出汉民则沦为奴隶，受吐蕃头人压迫。当时迁出多少汉民，史无详载，但从史籍中唐、宋时人口统计估计，至少在百万以上，即原有汉民中相当一部分迁往关中、中原和江汉地区。而迁入的吐蕃人口，约数十万人。据《宋史·地理志》，治平年间（1064~1067年），仅秦凤路当时依附于宋的吐蕃“熟户”就有13寨，41194名壮丁（史称“强人”），7991匹壮马^{〔24〕}。时秦凤路所统，仅秦、成、阶、凤、陇5州，向西只及今陇西县城，北至静宁、庄浪，故所载吐蕃户口，主要指今天水市辖域。而环庆、泾原两路（辖域在今平凉、庆阳和宁夏南部）吐蕃壮丁加总还多于秦凤路^{〔25〕}。秦凤路以西原河、兰、洮、岷、鄯、廓等地，吐蕃族人更多。这些吐蕃人，特别是其中被称为“熟户”者，后来大都留居陇右，与当地汉民同化。明代秦州直辖区今三阳川一带，有以汉四、汉六、汉二十、番八、番九、番十命名的里级建置，有人认为是宋、金分治秦州的遗迹，但秦州北乡南宋时俱陷于金，没有宋金分治的可能，故应是吐蕃部落留存的子遗。北宋后

期，因西夏进逼，绝大部分吐蕃“生户”向西迁走，以致秦州以西原唐属诸州人口急剧减少。《资治通鉴》唐大中十一年（857年）纪事中，引吐蕃部落头领尚延心的话，称“河、渭二州，土旷人稀，因以饥疫……二千里间，寂无人烟”。其说或因尚延心欲归唐有夸大之处，但亦说明陇右当时衰败之状。《续资治通鉴》熙宁元年（1068年）纪事中，有大甘谷口寨（今甘谷县北部与通渭交界），称其地“生户为谅祚劫而西徙，有空地百里”，可证当时因吐蕃生户西迁，许多地方成为荒无人烟地区。又据《宋史·地理志》，北宋后期陇右西北部收复后，因吐蕃部族迁走，兰州仅有居民395户、981人，河州仅有1061户、3895人，而据《新唐书·地理志》，唐代中期未陷时，兰州2889户、14226人，河州5782户、36086人。位处兰州以西的鄯、廓2州，唐代中期各有2万余居民，但北宋末收复后，由于吐蕃族人迁走，《宋史》中无人统计，或说明刚收复后属空旷无人区。

陇右自汉以后，世称富庶地区。就在吐蕃占据前的天宝年间，《资治通鉴》纪事言：“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见天宝十二载纪事）。但吐蕃部落进驻后，以夺取汉民财产、财富为目的，进行政治压迫，强逼居民改变其习俗，使汉民长时间遭受其剥削，生活穷困。吐蕃最后向西撤退时，又携所掠财物西去，留给陇右这块地方的，是一片破败荒废的断垣残壁。秦州治上邽城，罹难最深，以至收复后不得不将秦州治向北迁往成纪县（治今秦安叶堡）。

吐蕃对陇右的占领，是突袭式的。除鄯、廓2州稍早外，其余10余州是在宝应元年（762年）至广德元年（763年）的1年多时间内即完成占领的。但其收复，历经260多年。由于长时期内不能收复，而陆续被收复的地方，面对吐蕃、西夏与宋3方对峙的形势，又得不到很好治理，故至北宋末陇右大部地方仍处于非常落后状态，过去那种“阗阗相望，桑麻翳野”（《资治通鉴》天宝十二载纪事语）的繁盛之状

已经不再。陇中植被的破坏，应与吐蕃部落的畜牧垦殖有关。如今陇右地区远远落后于东、中部地区而变成贫困地区，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吐蕃的占领无疑是最早起因。

注释：

(1) (2) (9) 见《新唐书·吐蕃传》。

(3) 《新唐书·方镇表》中，陇右节度大使置于开元五年，上从《资治通鉴》。

(4) 天宝三年（744年），李隆基下令改“年”为“载”，后在至德二年（757年）仍为“年”。下文哥舒翰任陇右节度使，又有天宝三载、七载说，上从《资治通鉴》。

(5) 吐蕃攻据陇右秦、渭等州时间，又有广德元年（763年）说，上从《新唐书·吐蕃传》和《地理志》。

(6) 见《旧唐书·代宗纪》和《资治通鉴》。

(7) (10) (12) (17) 分别见《资治通鉴》广德元年（763年）、大中三年（849年）、大中十一年（857年）纪事。

(8) 《新唐书·吐蕃传》中为李玘收复清水，上从《资治通鉴》和《新唐书·地理志》。

(11) (14) (16) 见《新唐书·地理志》陇右道条。

(13) (20) 见《宋史·外国传·吐蕃》。

(15) 《资治通鉴》中，咸通四年置天雄军，统秦、成、河、渭4州，上从《新唐书·方镇表》。

(19) 见《旧五代史·都县志》。

(21) 《宋史·外国传》载其事于建隆二年（961年），上从《续资治通鉴》。

(22) 《宋史·外国传》载其事于淳化五年，上从《宋史·温仲舒传》。

(23) 《续资治通鉴》中范祥为转运使，上从《宋史·范祥传》。

(24) (25) 见《宋史·兵志·蕃兵》。

（作者：甘肃省麦积区地方志办公室科员）

古陇西与今陇西之考辨

张 慧

在中国历史上，地名的更易、重复、错位以及一个地名之下辖属的变更、范围的伸缩，旧地名的消失，新地名的产生，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正是由于这种情况，给后人造成了一些理解上的困难和麻烦，例如在《山海经》和《水经注》出现的许多地名、山川江河名称已经不复存在和不知所指。即使今天，地名仍在不断变动中，如近年襄樊改称襄阳、思茅改称普洱等即是其例。

“陇西”是甘肃出现很早且影响很大的一个地名，随着朝代的更替，它的辖属范围和行政区划有过多次变化，所以就有了“古陇西”与“今陇西”之间迥异情况的出现。这个差别至今仍然影响着人们对于它的历史面貌和现实状况的认知，最突出的例子便是对“天下李氏出陇西”所称李姓发源地的争执。因此有必要考辨清楚从“古陇西”到“今陇西”的演变过程，将对李氏郡望之类的问题有所廓清。本文只对“古陇西”与“今陇西”的辖属范围及变异流迁进行考证，而对李姓郡望问题则不涉及。

首先要搞清两个概念：一、“陇”是甘肃省的简称，但是绝不能简单地把“陇西”作“甘肃西部地区”来理解，恰恰陇西地区地处甘肃省的中部位置，历史上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它不同于今天所称的“陇东”“陇南”，不是因所处省份的方位而命名，它的命名远在甘肃成为省份之前。陇西之“陇”与陇东、陇南之“陇”是两个概念，前者是史书上所说的“陇坻”或“陇山”，山名；而后者则是省名，指甘肃，是在省名甘肃得名之后形成。二、古陇西是指历史上以“陇西郡”为主的“陇山”之西广大范围地

区；今陇西则指今天的“陇西县”。在辖属和范围上不同，出现的时间也不同，两者不是一回事。

先说古陇西，即以陇西郡为主的“陇山”之西广大范围地区。

据史载：东周安王姬骄十八年（前384年），秦献公兵临渭首，灭狄、獯二戎，始建狄道县。秦昭王二十八年（前279年）设置陇西郡，郡治狄道（今临洮县）。何以称“陇西”？《汉书》“陇西郡”注中说：“应劭曰：有陇坻，在其西也。师古曰：陇坻谓陇坂，即今之陇山也，此郡在陇之西，故文。”说明陇西郡因在陇山之西而得名。陇山已是古名，在何处？宋元之际的胡三省注解《资治通鉴》，对“陇西”的注解是：“扶风、岷县之西有大陇山，名陇坻，秦以其地置陇西郡。”《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二·陇州》：“禹贡雍州之域……西魏文帝改名陇州，因山为名。”此处所言之山当为陇山。《辞海》解释更明白：陇山即六盘山南段别称，古称陇坂。在今陕西省陇县西北，延伸于陕、甘边境。南北走向，延长约100公里，海拔2000米左右，山势陡峻。于此可以断定，陇西郡因在古称陇山、陇坻、陇坂的六盘山以西而得名。

另，酈道元《水经注》云：“洮水又北迳降狄道故城西，阚骜曰：今日武始也。洮水在城西，东北下。又北，陇水注之，即《山海经》所谓‘滥水’也。水出鸟鼠山西北高城岭，西迳坻（陇坻）。其山岸崩落者，声闻数百里，故杨雄称‘响若坻颓’是也。又西北，历白石山下。《地理志》曰：降狄道东有白石山，滥水又西北，迳武阶城南。又西北，迳降狄道故城东。……汉陇西郡治，秦昭王二十八年置。

应劭曰：有陇坻在其东，故曰陇西也。……湟水又西北流，迳注于洮水。”当地学者解读酈道元这段话，认为酈道元所说的“陇坻”在临洮县（狄道）境内的“东峪河”（湟水）流域，离狄道城近在咫尺，并不是六盘山。陇坻是否为六盘山虽有争议，但以陇坻之西而命名陇西郡，应该没有异议。

古陇西郡的演变情况是：

秦昭王二十八年（前 279 年）设置陇西郡，郡治设狄道（今临洮县）。秦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分全国为三十六郡，仍置陇西郡，治所未变。辖 21 县，为狄道县、西县、兰干县、略阳县、上邽县、冀县、郿道县、故道县、临洮县、獮道县、绵诸县、襄武县、阿阳县、下辨县、辨道、戎道、武都道、予道、薄道、成纪县、枹罕县。相当于现在的兰州市、定西市、天水市、陇南市一部和临夏州一部，是当时面积最辽阔的郡之一。陇西郡是右拒西羌、左护咸阳之要郡，战国秦长城起首，军事价值十分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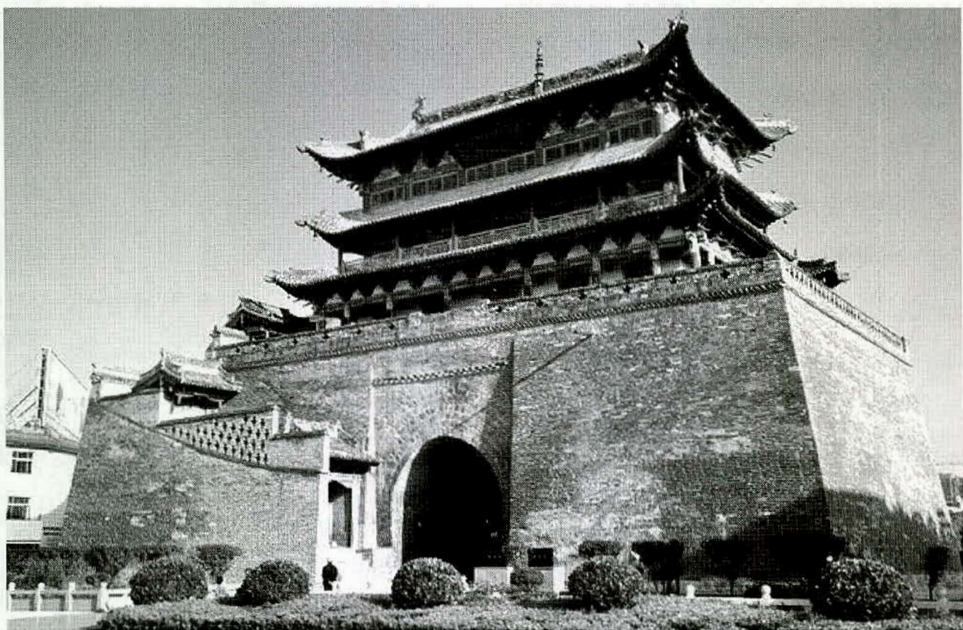
汉代，仍设陇西郡，治所狄道。西汉武帝元鼎三年（前 114 年），分陇西郡一部分置天水郡（郡治平襄，今通渭县）。陇西郡辖 11 县，为狄道、上邽（今天水市西南）、安故（今临洮县南）、氐道（今礼县西北）、首阳（今渭源县东北）、予道（今岷县西南白龙江上游）、大夏（今广河县西北）、羌道（今宕昌县西南）、襄武（今陇西县东南）、临洮（今岷县）、西县（今礼县盐官镇）。属凉州刺史部。东汉仍领 11 县，原领狄道、临洮、襄武、首阳、安故、大夏、氐道 7 县未变，分襄武县新置障县（今漳县西南），金城郡枹罕、白石 2 县划入

陇西郡，撤销予道县，另置河关县（今积石山县）。属凉州刺史部。东汉安帝永初五年（111 年），因羌乱，陇西郡治从狄道徙襄武，乱平后，延光三年（124 年），陇西郡治迁还狄道县。

三国时期陇西郡属魏国。魏文帝黄初元年（220 年），陇西郡治再迁襄武（此后郡治一直于此），辖地县数目减少，属秦州。后秦州并入雍州，属雍州。陇西郡治东移襄武后，狄道仍未衰落，唐初置临州，后置狄道郡；五代时吐蕃置武胜军地；宋置熙州，为州治狄道；元、明、清均置临洮府，为府治之所。清乾隆五年（1740 年），迁府治于兰州，升狄道州；民国二年二月降州为县。民国十八年（1929 年），改为临洮县。

仍叙陇西郡变迁。两晋南北朝时期，郡治襄武。两晋时只有 4 县：襄武、狄道、临洮（今岷县）、首阳，属秦州。十六国前赵、后赵时，陇西郡仍领四县，仍属秦州。前秦改属河州，领三县。后凉属凉州。后秦属雍州。西秦复属秦州。北魏属渭州。西魏、北周因之。北周领襄武、渭源 2 县。

隋唐时期，隋开皇三年（583 年）废陇西郡。大业三年（607 年）复置陇西郡，治襄武县，领襄武、



陇西县城威远楼

（图片提供：孔令奇）

陇西(今武山县西北)、障县(今漳县)、长川(今秦安县东北)、渭源5县。唐武德二年(619年)废郡改置渭州。天宝元年(742年)改渭州又为陇西郡,仍治襄武县,领襄武、陇西(今武山县西北)、漳县、渭源4县。属陇右道。乾元元年(758年),改陇西郡为渭州。陇西郡从此消失。

综上,陇西郡从秦昭王二十八年(前279年)设置,到唐乾元元年(758年)撤销建制,前后经历1037年。期间几废几立,郡治经历3次变迁:东汉安帝永初五年(111年)郡治从狄道县迁襄武县;东汉安帝延光三年(124年)迁还狄道县;三国时期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徙迁襄武县,直至唐乾元元年(758年)废郡为州。

古陇西郡在历史上共存在了1037年,治所在狄道492年,除去中间暂迁襄武17年,实际475年;治所在襄武545年。同时,陇西郡的辖域呈逐渐缩小趋势,由原来的覆盖兰州、定西、天水、陇南、临夏21县,逐渐缩小为11县、2县、5县、4县,最后仅辖今陇西县、漳县、渭源一隅。

以上是陇西郡的变迁情况。那么能不能说,所谓“古陇西”是否就是指古代的陇西郡呢?笔者的看法是,古陇西是一个大的概念,也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不单局限在陇西郡的范围之内,而是泛指六盘山以西今甘肃省兰州、定西、天水、陇南、临夏等州市及青海省东部河湟地区,略同于秦设陇西郡的管辖范围。在对古陇西的理解上,切不可以其郡治的变化作肤浅的认知,不能说三国以前郡治在狄道县,就认为古陇西就是狄道县(今临洮县),也不能说三国以后郡治在襄武,就认为古陇西就是今天的陇西县。不能否认的事实是,陇西郡治在三国时期由狄道东移襄武,狄道在唐为临州、为狄道郡,但仍在古陇西范围之内。古人有许多描写陇西的诗歌,就是将陇西认定为一个范围非常之广的地区的。如唐代诗人陈陶的《陇西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

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唐代诗人王维的《陇西行》:“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关山正飞雪,烽火断无烟。”从“无定河”“酒泉”“关山”这些名词上看,在唐人眼中,陇西的外延更大,他们从来没有把陇西理解为一县一邑狭小的地方。

次说今陇西,即今天的陇西县。

现陇西县辖地,在宋哲宗元佑五年(1090年)以前,实际上一直称襄武县(隋开皇十年即590年初设的陇西县,实际在今武山县西北),元佑五年才改襄武县为陇西县。当然,在三国时期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郡治迁入至隋开皇三年(583年)废陇西郡的363年间,以及从隋大业三年(607年)复置陇西郡至唐武德元年(616年)废郡改置渭州的9年间,和唐天宝元年(742年)又改渭州为陇西郡至唐乾元元年(758年)的16年间,因郡治都在此地,习惯上也可能将此地称作“陇西”。同时由于习惯延续的缘故,也不排除自三国时期郡治迁入以后一直称为“陇西”的可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曹魏以后的陇西郡的辖属范围已经非常小了,远非秦朝实行郡县制时可比。

然而,襄武一直是古代陇西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是在陇西郡郡治设在狄道的漫长历史时期里,它始终处于西拒羌戎、扼护三秦的重要位置。郡治的迁入,更为襄武之地发展为西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重镇带来了空前机遇。

陇西县境内,自有建制以来,曾有过三级建制。最高一级为渭州(北魏置)、巩昌路便宜都总帅府(元置)、巩昌布政使司(清置),次一级为陇西郡(秦置)、南安郡(汉置)、巩州(宋置)、通远军节镇(金置)、巩昌府(元置),县一级为襄武(秦置)、獠道(汉置)、首阳(汉置)、通远军(宋置)、陇西(宋置)等。按时间顺序,陇西地区的建制沿革大体如下:商周时期属雍州之地,为汉族与羌戎杂居地带。春秋战国时期,为西戎部族所据。秦穆公三十七

年（前623年），秦开疆拓土，称霸西戎，该地进入秦国版图。秦统一六国实行郡县制，境内设襄武县，辖于陇西郡。汉代，境内有襄武、首阳、探道、兰干四县，由陇西、天水二郡分辖。三国时期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为陇西郡郡所。隋开皇三年（583年）废陇西郡。大业三年（607年）复置陇西郡，治襄武县。唐代，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废陇西郡，置渭州，为州府所在地。高宗上元二年（675年），分襄武县置首阳县。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在襄武县设立陇右节度使。天宝元年（742年）改渭州又为陇西郡，仍治襄武县。乾元元年（758年），改陇西郡为渭州。代宗宝应元年（762年），渭州陷于吐蕃。北宋，皇佑四年（1052年）置古渭寨。元佑五年（1090年）升古渭寨为陇西县。崇宁三年（1104年）设立巩州，以巩固西陲取名。元、明、清时期，陇西称为巩昌府，辖区达及甘肃中、东、南全部地区，一度成为陇右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元代，设巩昌都总帅府，统督巩昌、平凉、临洮、庆阳四府及秦、陇、宁、定西、兰、镇原、阶、成、西和、会、环、金、徽、德顺、金洋15州行政军事，包括今兰州市以东和四川、陕西省的部分地区。明代，洪武八年（1375年），设立巩昌卫，为卫所。清代，康熙三年（1664年），陕西省右布政使司设于巩昌，辖有巩昌、临洮、平凉、庆阳四府。康熙六年（1667年），改陕西省右布政使司为巩昌布政使司，成为陕甘分省后甘肃最早省会。康熙七年（1668年），巩昌布政使司改为甘肃布政使司，迁至兰州。民国二年（1913年），废府改县，仍称陇西县。

陇西是长达千年的郡、府、道、州的治所，也是军事重镇所在，故历朝对其城防十分重视。唐贞观十四年（640年），上柱国公汪达镇守陇右，驻襄武，移城于今县址。宋仁宗皇佑五年（1053年），古渭州归宋后，陕西转运使、秦州知府范祥亲率蕃民，在原城址修筑古渭砦，历时一年九个月告竣。哲宗元佑五

年（1090年）置陇西县时，以古渭砦为县城。元朝，都总帅汪世显父子重筑陇西城，城池向东扩张，规模扩大。明初，朝廷命大兴边事，太祖洪武十一年（1378年）巩昌卫指挥使刘显，为了便于防守，重筑大城，修成周长9里120步、高4丈1尺、宽3丈的城墙，城墙通用青砖裹饰。城开四座城门，四门皆有月城，四角又有角楼，翼然于城上。宪宗成化五年（1469年），因河套鞑靼部南侵，知府李钺、知县陈忠修筑北关城垣。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年），知府米裳增筑长方形东西两关，历时四年完工。神宗万历三年（1577年）分守陇右道李维祯扩展修筑北关，修筑城墙2.4万余步，城高壕深与大城相同，而面积倍于大城。清雍正年间，又修建东西二关门楼。修筑后的陇西城群楼重迭，殿宇嵯峨，金顶辉煌，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千百年来，陇西十里城郭，烟火万家，物阜民康，商业繁盛，呈现出一派繁华景象。

陇西有过悠久的历史，也有过繁盛的文化，而真正的灿烂和辉煌却在今天。近年来，陇西县抢抓国家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机遇，紧紧围绕打造中国药都、陇中现代物流中心和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的目标定位，聚焦精准扶贫，夯实城乡基础，提升特色产业，做大优势工业，发展现代物流，开发文化旅游，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全县经济社会始终保持着平稳健康发展态势。今日陇西，千帆竞发，生机勃勃。

[参考文献]

- [1] 肖爱斌, 张爱民, 刘作录. 对古陇西郡得名缘由之考辨.
- [2] 班固. 《汉书》卷28下《地理志》陇西郡条注.
- [3] 郦道元. 《水经注》.
- [4] 瞿学忠, 王卓. 陇西古郡追寻汉唐文化印记.
- [5] 陈军. 千秋陇西.

(作者: 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宣传统战部副部长)

唐诗地名“临洮”辨正

刘 满

我国历史悠久，幅员广大，地名雷同是常见的现象，唐诗中出现的临洮就是一例。唐诗中的临洮，名称相同，而地望实异。近年来出版的一些唐诗注本，由于没有仔细分辨，以致在对临洮一地的注释中出现一些失误。如唐诗中的临洮，有的指唐临洮郡，而注者误以为秦临洮县；有的指唐临洮军，而注者或误以为唐临洮郡，或误以为秦临洮县。因此，本文试作辨析如下。

一、王昌龄《塞下曲》中之临洮

王昌龄《塞下曲》之二云：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平日沙未没，黯黯见临洮。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¹⁾。

马茂元先生注释说：临洮，秦置县名，长城的起点。因县临洮水，故名。注详前《哥舒歌》⁽²⁾。

又云：“长城战”一作“黄龙战”。按“长城”与上文“临洮”相应，作“黄龙”误。开元二年（714年），吐蕃将十万入寇临洮，朔方行军道总管王峻与战于武阶，斩首七千，获马、羊二十万。又战于长子，吐蕃大败。死者枕藉，洮水为之不流。这里所说的“长城战”，当系指此⁽³⁾。

《中国历代诗歌选》和《唐诗三百首新注》也都采用了相同的说法⁽⁴⁾。

上述注本将诗中的长城战与开元二年（714年）吐蕃寇临洮联系起来，这是符合诗意和历史的。但由于没有对史料作进一步的分析，注者将诗中的临洮和“长城”误以为是秦临洮县及其境内的长城了。其实这一临洮指的是唐临洮军，长城指的是临洮军附近的“长城堡”。

关于开元二年吐蕃进犯临洮事，《新唐书·吐蕃传》记载说：垒达延将兵十万寇临洮，入攻兰、渭，掠监马。……友诏薛讷为陇右防御使，与王峻等并力

攻击。帝怒，下诏自将讨之。会峻等战武阶，斩首万七千，获马羊无虑二十万。又战长子，丰安军使王海宾战死。乘之，虏大败，众奔突不能去，相枕藉死，洮水为之不流。帝乃罢行。

《旧唐书·薛讷传》亦云：吐蕃大将垒达延、乞力徐等率众十万寇临洮军，又进寇兰州及渭州之渭源县，掠群牧而去。诏讷白衣聂左羽林将军，为陇右防御使，与太仆少卿王峻等率兵邀击之。十月，讷领众至渭源，遇贼战于武阶驿，与王峻角夹攻之，大破贼众。追奔至洮水，又战于长城堡，丰安军使王海宾先锋力战死之。将士乘势进击，又败之，杀获万人，擒其将六指乡弥洪，尽收其所掠羊马，并获其器械，不可胜数。

上述两条记载中，关于吐蕃进攻的地点所记不一：一作“临洮”，一作“临洮军”。查有关史料，除《新唐书·吐蕃传》、《新唐书·薛讷传》、《新唐书·王峻专》作“临洮”外，《旧唐书·玄宗纪》、《旧唐书·王峻传》、《旧唐书·吐蕃传》、《通鉴》和《册府元龟》均作“临洮军”⁽⁵⁾，与《旧唐书·薛讷传》所记相同。由此可知，吐蕃入寇的临洮，实为临洮军。

其次，上述两条史料都提到一个事实，即吐蕃时入临洮之后，“掠监马”，“掠群牧而去”，而且新、旧唐书《王峻传》都说王峻当时为陇右群牧师。由此可见，吐蕃入侵之地，是唐监牧地。据《元和郡县志》卷三原州条下云：监牧：贞观中，自京师东赤岸译移马牧于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县之西。置监牧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刺史为监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北使寄理原州城内，东宫使寄理原州城内。天宝中，诸使共有五十监。……

这说明，当时官方养马地，南以秦州、渭州（今

甘肃天水、陇西一带)为界,西界在兰州狄道县(今甘肃临洮)以西。而秦临洮县(为唐岷州郡治所)和唐临洮郡(洮州)在兰、渭、秦三州的南方,都非监牧地。

既然吐蕃入侵的临洮有监马,说明此临洮既不是秦时的临洮县,也不是唐代的临洮郡,应是监牧地所在的临洮军。

据《元和郡县志》卷三九临州条记载:

天宝初,割兰州狄道县,又别置安乐县,置临州。郭旧有临洮军,久视元年置,宝应元年陷于西蕃。

上述记载说明,临州(狄道郡)置于天宝初,辖狄道、安乐二县,郡治在狄道(今甘肃临洮)。久视元年(700年),置临洮军,在狄道城内。开元二年(714年)吐蕃入侵时,洮州当时地属兰州,但临洮军早已设立了。可见吐蕃入寇的临洮实为临洮军。

再次,关于开元二年(714年)吐蕃入侵临洮一事,有关史书涉及唐与吐蕃战斗的地方有大来谷、武阶和长子,考证这些地名的大体方位,也可以看出临洮是否为临洮军。

据《新唐书·王峻传》记秦载:

开元二年,吐蕃以精甲十万寇临洮,次大来谷,其酋垒达延以兵踵而前。峻率所部二千与临洮军合……俄而薛讷至武阶。距大来二十里……

吐蕃寇临洮,王峻以所部二千与临洮军合,说明此临洮是临洮军的防区。已如上述,当时临洮军在狄道,说明吐蕃入寇之临洮与狄道有关。另外,吐蕃寇临洮,驻军大来谷,说明临洮在大来谷附近。而大来谷又与武阶相距二十里,因此我们只要确定了武阶的方位,就可以知道大来谷与临洮的方位了。

武阶一地,《旧唐书·王峻传》作“武阶谷”,《通鉴》作“武街”,《旧唐书·吐蕃传》、《新唐书·薛讷传》、《旧唐书·薛讷传》、《册府元龟》等均作“武阶驿”。关于武阶的位置,《册府元龟》卷九八六谓在“渭州西界^⑥”,《旧唐书·吐蕃传》说它在渭源县(今甘肃渭源县)。而《水经·河水注》对武阶的记载则更为具体:

(洮水)又北,陇水注之,即《山海经》所谓滥水也:水出鸟鼠山西北高城岭,西径陇坻(按:此与陇山的异名陇舐有别)……又西北历白石山下。《地理志》曰:降狄道东有白石山。滥水又西北,经武街城南,又西北经降狄道故城东。

滥水,或曰陇水,即源于甘肃渭源县西北的东峪沟^⑦。其水西北流,至今临洮县城汇入洮河。由此可知,武街在今临洮县东、东峪沟北。今临洮县为唐狄道,临洮军就在狄道城内。因此,吐蕃进犯的临洮决不是远离武街的秦临洮县或唐临洮郡,只能是武街西的临洮军。

上述史料和论证说明,开元二年吐蕃入侵的是唐临洮军、兰州和渭州。因此,唐与吐蕃作战的地方也当在这一带。关于“长子”一地,只见于《新唐书·吐蕃传》,而《旧唐书·薛讷传》、《新唐书·薛讷传》和《通鉴》均作“长城堡”。可见,“长子”实为“长城堡”,所以以上述《塞下曲》之“昔日长城战”,就是指长城堡之战。长城堡之战发生在唐军于武街大败吐蕃之后。唐军乘胜“追奔至洮水,又战于长城堡……将士乘势进攻,又败之,杀获万人,擒其将六指多弥洪,尽收其所掠羊马,并获其器械,不可胜数^⑧”。《新唐书·吐蕃传》说这次战斗“虜大败,众奔突不能去,相枕藉死,洮水为之不流”。吐蕃士卒死伤的数字,反映了唐军士气之盛。这些情况,与《塞下曲》中的“咸言意气高”、“白骨乱蓬蒿”都是相一致的。上述史料也说明,长城堡地近武街,濒临洮水,与秦临洮县是无关的。

总之,《塞下曲》中之临洮为唐临洮军,在今临洮县;“长城战”之“长城”为长城堡,在今临洮县北的洮水边。

二、岑参诗中的临洮

岑参两度出塞,经过临洮,先后写了《临洮客舍留别祁四》、《临洮龙兴寺玄上人院咏青木香从》、《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和《临洮泛舟赵仙舟自北庭罢使还京》等诗^⑨。这四首诗中的临洮,《岑参集校注》是这样注释的:

临洮,唐郡名,治所在今甘肃临潭县西南^⑩。

上述四首诗中的临洮，并不是唐代的临洮郡，而应该是一度设在临州的临洮军。临州的治所在狄道县，其地即甘肃临洮县，临洮军曾设在这里。

自汉至唐，狄道县都是由长安通往西域的交通要冲。从岑参两次出塞行经的地点看来，他都要经过狄道县，决不会行经僻在甘肃南部的临洮郡的。岑参在出塞途中行经的地点说明，他由长安出发，沿渭水西行，到了今甘肃和陕西的界山陇山。如他的《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中的“平明发咸阳，暮宿陇山头”，以及《经陇头分水》、《赴北庭度陇思家》等诗就是证明^{〔11〕}。过了陇山，经秦州（治所在今甘肃秦安县西北），就到了渭州（治所在今甘肃陇西县东南），诗人在这里写了《西过渭州见渭水思秦川》^{〔12〕}。由渭州西行到兰州，兰州唐亦称金城郡，《题金城临河驿楼》就是在这里写的^{〔13〕}。从兰州过黄河往西，大致沿今兰新线西北行，就到了当时河西的重镇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县城关）。由上所述可知，诗人由长安到凉州的路线，就是唐人所谓的“秦州路”，这一段路程总长为二千里^{〔14〕}。

从岑参全部边塞诗反映的情况来看，诗人两次出塞的往返路线，都是经由秦州路的。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既然岑参出塞取秦州路，那么他在渭州与兰州间就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到远离这条线路的临洮郡去绕一个大圈子。因为据《元和郡县志》记载：渭州西南至岷州二百二十六里，岷州西南至洮州一百八十里；临州南至岷州三百四十里，岷州西南至洮州一百八十里；兰州西南至河州三百里，河州东南至洮州三百里^{〔15〕}。上述渭州、临州和兰州三州与洮州的方位和里数，可以看出临洮郡（即洮州）僻在这几州的西南或南方，其间相距数百里。我们不禁要问：岑参为什么到远离秦州路很远的临洮郡去呢？按常理说来，确实是没有必要的。

如按《岑参集校注》所说，岑参诗中的临洮即唐临洮郡，那么岑参就不止一次地绕远道前往该地。据闻一多先生考证，《临洮客舍留别祁四》和《临洮龙兴寺玄上人院同咏青木香丛》两首，是天宝十载（751年）诗人由凉州返长安途中所作；《发临洮将赴

北庭留别》是天宝十三载（754年）诗人赴北庭时途经临洮所作^{〔16〕}。这就是说，诗人第一次出塞由安西返回长安时到过临洮，而且在第二次出塞前往北庭时又一次如往临洮。如临洮指唐临洮郡，那么当时在西域供职的诗人，为什么不惮烦劳，一再要绕道去临洮郡呢？这是令人无法理解的。更奇怪的是，《临洮泛舟赵仙舟自北庭罢使还京》一诗说明，由北庭罢使返长安的赵仙舟也绕道去临洮郡。这些问题只能说明，岑诗中的临洮不是临洮郡，而是当时秦州路上的另一临洮。

据《元和郡县志》卷三九渭州八到条下云：西北至临洮军百九十里。

同书兰州八到条下又云：东（按：应作“南”）至临州一百九十里。

己如上述，临洮军一度设在临州治所狄道县，上述记载中渭州至临洮军的距离，实际为渭州至临州的距离。由此可知，由渭州经由临洮军，或曰临州，到兰州的距离是三百八十里。

《元和郡县志》卷三九渭州八到云：东至上都一千一百里。

同书兰州八到又云：东至上都一千四百六十里。

这样，兰州至渭州为三百六十里，与上述三百八十里相接近。这说明，由渭州经临洮军至兰州是一条最捷近的路线，临洮军为秦州路的必经之地，因此，岑参所经的临洮当为临洮军。

这里要指出的是，岑诗经临洮是天宝年间，天宝三年（744年）唐已设立临州，但当时临洮军已不在临州了。据《元和郡县志》卷三九鄯州条下记载：

开元二十一年，置陇右节度使，备西戎，统临洮军（开元中，移就节度衙置，管兵五万五千人，马八千四百匹）^{〔17〕}。

又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

临洮军在鄯州城内，管兵万五千人，马八千匹^{〔18〕}。

上述史料说明，开元年间临洮军早已由狄道迁移到鄯州治所湟水县（今青海乐都）。既然如此，怎么能说岑诗中临洮为临洮军呢？地名的改易变化是常有的，但人们还是习惯于沿用旧称。如在《元和郡县

志》成书时，唐人仍将临州称为临洮军，就属于这一类。

总之，岑参诗中的临洮不是唐临洮郡，应是唐临洮军，也就是临州狄道县，即今甘肃临洮县。

三、《哥舒歌》中之临洮

《哥舒歌》云：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胡马，不敢过临洮^{〔19〕}。

马茂元先生和文学所的《唐诗选》以及其他注本都认为“不敢过临洮”之临洮，指的是今甘肃省岷县，即秦临洮县。

其实《哥舒歌》中的临洮指唐临洮郡，治所在今甘肃临潭县。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先对《哥舒歌》反映的历史事实作一简单的探讨。

有的注本把《哥舒歌》的本事指为哥舒翰筑龙驹岛，破吐蕃石堡城，这也是不符合历史和诗义的。据《通鉴》天宝七年（748年）十二月条云：哥舒翰筑神武军于青海上，吐蕃至，翰击破之。又筑城于青海中龙驹岛，谓之应龙城，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

诚如《通鉴》所记，哥舒翰筑城龙驹岛之后，吐蕃确实不敢近青海。但《通鉴》天宝八载六月条又记载说：项之，翰又遣兵于赤岭西开屯田，以谓卒二千戍龙驹岛，冬冰合，吐蕃大集，戍者尽没。

由此可见，哥舒翰筑城于龙驹岛，后来又增派部队戍守，但不久即为吐蕃扫荡尽净。此后哥舒翰再也没有进兵龙驹岛，实际上是承认了失败。

至于哥舒翰攻拔石堡城一役，完全可以说是唐军的一次失败。《通鉴》天宝八载六月条云：上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帅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东兵，凡六万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险绝，惟一径可上，吐蕃但以数百人守之，多贮粮食，积楛木及石，唐兵前后屡攻之，不能克。翰进攻数日不拔，召裨将高秀巖，张守瑜欲斩之，二人请三日期可克；如期拔之，获吐蕃铁刃悉诺罗等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数万……

唐兵以六万余对数百人的绝对优势攻打吐蕃一个小城，最后以几万人死亡的重大牺牲，达到了目的。这次战争，一没有重创吐蕃，二没有夺回失地，这样的战争能够解除吐蕃对唐边境的威胁吗？这样的战果

有什么值得歌颂的地方呢？再说，诗中明言“不敢过临洮”，临洮与青海是不能混同的。至于哥舒翰以半条枪败吐蕃，使吐蕃不敢近青海这种说法，就离史实和诗义更远了。

《哥舒歌》称颂的是哥舒翰收复黄河九曲之役，这是因为收复黄河九曲，是哥舒翰一生中最大的一次战功，同时也是安史之乱以前，唐与吐蕃长期斗争中一次重要的转折，正是这次战役的胜利，使唐朝在陇右收复了失地，阻止了吐蕃对陇右的入侵。

黄河九曲指的是黄河流经今甘肃玛曲至青海同德间黄河以北的地区。原来“吐蕃本以河为境”^{〔20〕}，也就是说九曲之外，黄河以南，地属吐蕃，黄河以北的九曲之地属于唐朝。因为九曲“水甘草美，宜畜牧”，21吐蕃买通鄯州都督杨矩，得到了九曲之地。《新唐书·吐蕃传》说，自从吐蕃得河曲之后，“虜益雄张，易入寇”。《通鉴》卷二一一开元二年（714年）八月条也说，九曲“其地肥饶，吐蕃就之牧马，因以入寇”。吐蕃取得九曲在睿宗景云元年（710年），自这以后，不断入侵九曲邻近的郡县，如上述开元二年（714年）吐蕃入寇临洮军、兰州、渭州，致使玄宗“下诏欲亲征”，就是吐蕃的一次大举入侵。再如开元五年（717年）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大破吐蕃于九曲，开元十六年（728年）陇右节度使张忠亮拔吐蕃大莫门城（在九曲），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杜希望夺吐蕃河桥置镇西军（在河州西百八十里），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唐“选募关内、河东壮士三五万人，诣陇右防遏”吐蕃，^{〔22〕}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吐蕃屠达化县，陷石堡城等等，都是唐与吐蕃在九曲一带的争战。由此可见，吐蕃在取得九曲之后对唐造成很大的危害与威胁。

此外，从唐所设置的陇右节度使及其屯兵设守的重点，可以看出吐蕃对唐的威胁及收复九曲的重要性。《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元年条云：陇右节度使备御吐蕃，统临洮，河源镇西十军，经和、合川、平夷三守捉，屯鄯、廊、洮、河之境，治鄯州，兵七万五千人。

陇右节度使设置于开元二年（714年）十二月，即吐蕃大举入侵临洮军、兰州、渭州之后两月，目的

是为了防御吐蕃。它共领有十二个州郡，但屯兵设守的只有鄯、廓、洮、河四个州郡，这四个州郡都是与九曲相连的地方。因为唐失九曲之后，使这四个州郡失去了原来的屏障，因而使其成为直接面对吐蕃的前沿阵地。而收复九曲以后，使这四个州郡免受吐蕃的直接威胁，也减轻了吐蕃对整个陇右节度使防区的压力，其意义是很重大的。至于秦临洮县，唐时为岷州治所溢乐县（今甘肃岷县），位于洮州之东，吐蕃本来对其构不成威胁，更谈不上经过这里。收复九曲之后，它又多了一道屏障，吐蕃更是鞭长莫及了。因此，“不敢过临洮”之“临洮”，决不是指秦临洮县。

己如上述，临洮是陇右节度使重兵戍守的州郡之一。在陇右节度使统率的十军中，驻在临洮城内的漠门军有兵五千五百人，仅次于鄯州的临洮军、河源军、安人军和河州的镇西军。^{〔23〕}据《通鉴》卷二一三开元十五年（725年）十二月记载：

戊寅，制以吐蕃为边患，令陇右道及诸军团兵五万六千人，河西道及诸军团兵四万人，又征关中兵万人集临洮，朔方兵万人集会州防秋；至冬初，无寇而罢，伺虏入寇，互出兵腹背击之。

唐朝征调十余万大军集结临洮郡，等待吐蕃入犯，可见临洮郡是吐蕃入寇的重要目标和通路。《通鉴》卷二一七天宝十三载七月条云：癸丑，哥舒翰奏：于所开九曲之地置洮阳、浇河二郡及神策军；以临洮太守成如璆兼洮阳太守，充神策军使。

同书胡注云：洮阳、浇河二郡，皆置于洮，廓二州西南。……洮州西八十里磨环川置神策军。

收复九曲之后，在临洮郡西置洮阳郡和神策军，由临洮太守兼管。唐朝在临洮郡西重点设防，也说明该地为吐蕃入侵的重要目标和通路。重点设防的目的就是要阻止吐蕃对临洮的入侵，同时要切断吐蕃由临洮入侵内地州郡的通路。这都与“不敢过临洮”是完全相符的。

总之，《哥舒歌》歌颂的是哥舒翰收复九曲的功绩，其中的临洮是唐临洮郡。

注释

(1)《全唐诗》卷一四〇。

(2)马茂元：《唐诗选》，上册，1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3)马茂元：《唐诗选》，上册，1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4)林庚、冯沅君：《中国历代诗歌选》，上编（二）3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金性尧《唐诗三百首新注》，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5)《册府元龟》卷九八六。

(6)《册府元龟》：“薛讷破蕃于渭州西界武阶释。”

(7)杨守敬《水经注疏》（科学出版社影印本）引董祐诚说如下：“今渭源县北分水岭即鸟鼠山之干，东则渭水源，西则滥水源也，俗曰东峪河。”按：此说至确，东峪河今又作东峪沟。

(8)《旧唐书·薛讷传》。

(9)四首诗均见《全唐诗》卷二〇〇。

(10)陈铁民、侯忠义：《岑参集校注》，97页、1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1)分别见《全唐诗》卷一九八和卷二〇一。

(12)《全唐诗》卷二〇一。

(13)《全唐诗》卷二〇〇。

(14)《元和郡县志》卷四〇武威郡八到条下云：“东北（按：应作“东南”），至上都取秦州路二千里。”

(15)《元和郡县志》郑三九。

(16)《岑嘉州系年考证》。

(17)按：《元和郡县志》所记临洮军管兵数为五万五千人，与《旧唐书·地理志》、《通鉴》胡注所记不同。据冬仲勉先生《通鉴隋唐记比事质疑》一书“天宝元年天下兵马数”条考证，“五万五千”是“万五千”之讹。

(18)又见于《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元年胡注。

(19)《全唐诗》第十一册8850页。

(20)《新唐书·吐蕃传》。

(21)《新唐书·吐蕃传》。

(22)《通鉴》卷二一四开元二十七年正月条。

(23)《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元年胡注。

（作者：兰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西汉酒泉郡若干县城的调查与考证

李并成

《汉书·地理志》载，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开，领县九：禄福，表是、乐馆、天隄、玉门、会水、池头、绥弥、乾齐。这是酒泉地区有史以来最早的行政建置，这些县城也是本区最早设立的一批城镇。它们奠定了嗣后几千年来本区城镇发展演化的基础。因而弄清它们的位置，不仅对于汉代乃至后代这一地区历史面貌的研究极有必要，而且对于探讨整个西北绿洲地区城镇起源演变的规律及其环境变化亦甚有意义。对于这些县城的城址《汉书》未详，前人所做研究亦较少，且不免有所失误。笔者经过多次实地调查，并将文献资料与大量的考古材料结合起来，对这九县中前六县的城址予以考证。

禄福 为《汉书·地理志》所载酒泉郡首县，系郡治。《后汉书·郡国志》误作福禄县，《大清一统志》、清人吴卓信、王先谦等据东汉《曹全碑》、《三国志·魏书·庞统传》及所引皇甫谧《列女传》等正之，认为改称福禄当自晋始。黄盛璋又依敦煌遗书于闐文《使河西记》之Laha pum的对音，考得唐代仍名禄福，禄福之名自汉迄唐沿而无改。甚是。敦煌市博物馆藏天宝初年《地志残卷》（敦博58号）亦作禄福。《汉书·地理志》载：“禄福，呼蚕水出南羌中，东北至会水入羌谷。”知呼蚕水流经禄福县境。王先谦《汉书补注》、徐松《西域水道记》、陈澧《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洪颐煊《汉书水道疏证》等均考是水为讨赖河，是之，今亦俗称北大河。该河源于祁连支脉陶勒南山，北流，经今酒泉市城西、城北，又东流、东北流，切穿夹山，在今金塔县东北注入黑河（汉之羌水）。可见汉禄福县位今酒泉市域。至于汉禄福县城，学界一直公认即隋唐时的肃州城，也即今天的酒泉城。《西河旧事》载，禄福城“谢艾所筑”。查《晋

书·张轨传》、谢艾为前凉张重华主簿，永乐二年（347年）功封福禄伯，继任酒泉太守。谢艾当在汉城故址上重新筑城。又据清《肃州志》、《重修肃州新志》载，明洪武28年（1395年）指挥金事裴成于旧城东城外展筑新城，“今日之鼓楼，即昔日之东门也”。鼓楼今仍存，屹酒泉市中心。如此看来古禄福城当位于今酒泉城的西半部，东半部则为明代新辟。又访之酒泉市博物馆刘兴义先生知，1954年拆除酒泉南城墙时发现墙中旧南门遗址，（今军分区院内），当为谢艾晋城之南门，并由此测得晋城面积950米×630米。

禄福城位处北大河、洪水坝河洪积冲积扇缘泉水出露带西南侧，地势平衍，地表地下径流均很充盈，生产生活用水方便，具有发展农垦，置郡设县的优越条件。该城又地当贯通走廊平原的丝绸之路东西向主干道上，并且沿讨赖河、黑河河谷北上又可直趋蒙古高原腹地，这条河谷水草地带遂每每成为匈奴南下的天然孔径。禄福正位居这东西、南北两条要道交汇点，在这里置县并立为郡治，具有交通、军事等方面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今酒泉城北2.5公里处讨赖河北岸崖下的赵家水磨还发现新石器遗址一处，其东西长约300米，灰层厚1米许，内涵丰富，属火烧沟文化类型。酒泉城关内外还分布着大量的汉代墓葬，以东关一带最为集中，仅明显的封土堆即达200座以上，墓区范围3平方公里许，大多为汉字母砖室墓，其中又专设儿童墓区一处（《考古》1960.6）。这些墓葬应为当年禄福县军民的遗冢。

表是 《后汉书·孝灵帝纪》载，光和三年（180年）秋“表是地震，涌水出”。李贤注，‘表是，县，属酒泉郡，故城在今甘州张掖县西北也’。《通典》卷

174亦云：“汉表是县故城在今（张掖）县西北。”唐张掖县即今张掖市，其西北当指今高台一带。《重修肃州新志·高台县》云：“表是故城，在县西，汉置，属酒泉郡”。《嘉庆重修一统志》、清人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钱坫《新斲注地理志集释》、王先谦《汉书补注》等亦持是说。即在今高台县城西约50公里的地方，即酒泉市屯升乡沙山村北15公里处的沙丘中恰可找到一座汉代城址，今俗名新墩子城。城垣已很残破，仅可看到残高1~2米的夯土颓基，略呈方形，周长800米许。东、南二垣各开一门，有瓮城。城内城周遍地散落汉代灰陶片，亦见铜箭镞、石磨、汉半两钱币等遗物。该城今日虽已环处沙漠之中，但于其周围吹扬灌丛沙丘之间仍可见成片的故耕地遗迹出露，特别是在该城北面、东北面、西北面宽约8公里的范围内弃耕地连片分布，皆遭风蚀，呈较规整的条、块排布，亦见渠道、地埂遗迹，其上亦零星散落陶片、石磨残片、铁镰残片等物。由此表明这里曾是一片农耕兴盛的绿洲。当年流灌这片绿洲的水源应为源于其南部祁连山的马营河，今天由于其中、上游地区的大量开垦灌溉河水仅流至沙山村，但该河故河道遗迹一直北伸至新墩子城下及其以北。新墩子城西距汉乐涇县城（后考）30公里，东距晋前凉张骏置建康郡（高台县西南骆驼城，考证见齐陈骏《河西史研究》273页）亦30公里，同样位处贯通走廊东西的丝绸之路主干道，地理位置重要。据此新墩子城当为汉表是县城无疑。在该城西侧、南侧的洪积戈壁滩上还发现汉墓群3处，曾出土陶壶、陶仓、汉五铢钱、铜发簪等汉代文物。

另须提及，前引史料称光和三年表是发生地震，《后汉书·五行志》亦云，是年“自秋至明年春，酒泉表氏（是）地八十余动，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顿，县易处，更筑城郭”。新墩子城废于是年地震。那么地震后的新县址又移往何处？至今亦是个未解之谜。笔者认为表是新县址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海乡的草沟井城恰可当之。该城位新墩子城南6公里，距离较近，易于搬迁重建，并且处南部上游地区，地势较

高，摆脱了因地震涌水而出的沼泽地带，这个选择是合乎情理的。草沟井城墙垣犹存，南北120米许，东西130米，残高5米许，墙体较厚，底宽10米，顶宽2.5米，甚雄壮，当为防震特意加筑的。四角又筑角墩，门一，南开，宽10米，设瓮城。城内外散落五铢币及大量灰陶片、红陶片等，为汉至隋的遗物，而这又恰与表氏县沿延时期相同（该县废于隋代）。城附近又有古墓群3处。由此可证草沟井城当为光和三年以后的表氏县城。

乐涇 刘兴义《酒泉县下河清乡皇城遗址考》（载《敦煌学辑刊》1986年2期）考得汉乐涇县城即为皇城遗址。该城位酒泉城东南50公里，城址呈矩形，面积298米×351米，残高3~7米，且四周埋藏着大面积的汉代墓葬。刘先生考之有据，言之成理，所得结论笔者完全赞同，不赘。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最近王北辰先生又撰《河西明海子故城考》一文（载《西北师大学报》1990年4期），则认为明海子故城为汉乐涇县城。王先生尽管列举了几条似有道理的论据，然而却不无疏误，同时又忽略了一些最能说明问题的史料，因而所得结论不免偏颇。对此不可不辨。

王先生首先引用《汉书·地理志》“饒得：千金渠西至乐涇入泽中”的记载，认为千金渠所入的泽即明海子湖，汉乐涇县即湖旁明海子城。然而查明海子湖周围一带地势，海拔约1400米左右，其东20余公里的黑河河面的海拔则在1330米上下，较明海子湖低70米许，如此黑河的河水是无法引到明海子湖的，可证千金渠所入的泽非明子海湖。实际上上引千金渠的记载并非《汉书》原作，而是唐人颜师古对《汉书》的注文，唐时乐涇县易名福禄，其辖境包括汉乐涇、表是等县范围，师古的注文系泛指，并不表明千金渠流经乐涇城附近。

在赞同刘兴义先生考证结论基础上，笔者再补充几点看法。《元和郡县图志》卷40载：“福禄县，中下。西至（肃）州一百里。本汉乐涇县，属酒泉郡”。《太平寰宇记》卷152亦云：“福禄县，（肃州）东一百

里，……唐武德二年于乐涓古城置福祿县。”酒泉城东一百里正是今皇城遗址。《新唐书·地理志》又云：“福祿，下。武德二年别置。东南百二十里有祁连戍，东北八十里有盐池。”《元和郡县图志》亦载：“祁连戍，在（福祿）县东南一百二十里。盐池在县东北八十里，周回百姓仰给焉。”在今皇城东南120里许的高台县红崖子乡东大村恰可找到一座唐代故城址，俗称羊蹄鼓故城。该城基本方形，有内外两道城垣，内垣虽已残破但尚可连续，90米×80米，残高2~7米，唯西北角墩突兀，残高10米许，似原为瞭望台，门一北开，有瓮城。外垣残损严重，大段塌毁无存，残余部分多成高0.5~1.5米的颓堦，仅少数墙段高3~5米，亦方形，每边长170米许，门一亦北开，有瓮城。据当地退休干部丁鸿寿等同志介绍，以前城中遍布陶片、瓦片，并发现过汉、唐钱币。笔者实地考察中亦剑到了红、灰陶片。城周围还发现古墓。据之该城显系汉唐时期的古城址，很可能其外垣系汉城墙垣，唐代又新建内垣，并将外垣用作羊马城。该城南距祁连山仅4公里，且向南正对山中水关口，该口为通往祁连山区乃至青海高原的要径，地势险峻，口侧山顶上仍保留烽燧遗址一座，可见羊蹄鼓城当为昔日的军防要地，又位处祁连山下，在唐为祁连戍无疑。刘兴义将祁连戍考为今红崖堡，虽不确，但方位无大错。陶葆廉《辛卯侍行记》卷5则将祁连戍定在酒泉清水堡，误。唐诗人岑参当年赴西域途中曾留下“昨夜宿祁连，今朝过酒泉”的诗句，祁连即指祁连戍，当时西行大道经此。又上引史料所云盐池正是今高台县西北盐池乡之盐池，其范围颇大，今东西长近10公里，南北宽4公里左右，自古以来就为邻近数县居民食盐的主要采掘地。该盐池西南距皇城遗址37公里，与上引史料之福祿东北80里的记载亦大体吻合，舍此盐池这一带别无他池可考。由祁连戍和盐池的地址即可推定皇城遗址为唐福祿县、汉乐涓县城址无误。《读史方輿纪要》卷63云乐涓故城在肃州东250里，清初梁份《秦边纪略》卷3云高台县即汉之乐涓县，《重修肃州新志·高

台县》又云乐涓故城为高台县城西南四十里的骆驼城，皆误。

皇城遗址处丰乐河下游，水源充沛，沃野平畴，具有发展灌溉农业的优越条件，并且地当丝绸之路要道，实为设置县城的理想之地。在今皇城东北5公里处还发现新石器遗址一处，名下河清遗址，面积4000平方米余，出土石斧、石锄、石手磨盘和磨棒、石凿、刮削器等遗物，属马厂类型。可知早自新石器时代这里即有人类的农业生产等活动。在今下河清乡北侧、南侧戈壁沙滩上以及皇城以东的大小淌沟两岸及两河间地带还遍布汉晋时期的墓群，1956年曾在这里发掘汉墓24座，又清理汉代砖窑5座（《文物》1959年10期）。由此亦可窥见汉代城址与汉墓群在地理分布上的密切关系。

天隄 《汉书》师古注：“此地有天隄阪，故以名。”阪即山坡、斜坡之谓，祁连山北麓浅山区由山区向走廊平原过渡，坡度很大，符合“阪”的特点，天隄阪当位于此山麓地带。天隄县的位址清人吕吴调阳《汉书地理志详解》考为在“玉门县北柳沟堡，隄同隄，天颠也，义同删丹”。清玉门县即今玉门镇，其北部的柳沟堡今为柳沟乡，这是处绿洲平原腹地，远离山区，平旷无阴，何来天隄阪？显然柳沟堡说误。近年新出《玉门市地名普查资料汇编》又认为，西汉天隄县到东汉改置为延寿县，因而延寿县地即原天隄县的所在，然而令为费解的是，尽管《后汉书·郡为志》中酒泉郡领县无天隄而新增延寿，但从史籍上根本找不到天隄改置为延寿的只字片语，二县之间并不存在前后相承的关系，亦不在同地。东汉新增延寿的位址笔者考为即今玉门市清泉乡驢马城，拟另文专论，不赘。新编《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又云：“天隄县，西汉置，治所在今甘肃玉门市东南，东汉废。”今玉门市即位祁连山麓，玉门市东南当指由玉门市沿祁连山麓向东南的今红卫林场、青头山、直到嘉峪关市的大小红泉一带。这里虽符合“阪”的地形特点，然而位处山麓洪积扇上部，地表砾面粗糙，发展农耕困

难，根本不具备建立县城的自然条件，并且这一带无任何汉代故城址、古遗迹可考，因而此说亦不足取。

查今酒泉、玉门附近的祁连山麓地带，唯有玉门市昌马盆地具备建县置城的条件。该盆地位玉门市正西60余公里，为祁连山北麓浅山区一拗陷盆地，略呈方形，南北、东西各约20公里、昌马河（疏勒河上游）及其支流小昌马河从中流过。盆地内径流萦绕，土质细腴，成为这一带祁连山沿山地区唯一一块肥沃的绿洲，具有发展农牧业生产以及设置县城的优越条件。昌马之名得于清代，原有昌马湖，即因水肥草美宜于牧马而名（《玉门市地名普查资料汇编》）。今天这里为玉门市昌马乡的所在。昌马盆地文物荟萃，古代遗存比比皆是。盆地南、北山崖上保存古代岩画7处，多为单线条凿刻而成，内容主要为羊、狗、狐、豹、驼及狩猎图等，考古工作者初步认为可能是羌族、月氏或匈奴族的早期文化遗存。可见早在汉代以前这里即有人类的生息活动。盆地以北的照壁山麓又保存石窟群一组，今仍存留早期塑像和五代、宋初的壁画。盆地北部的拱伯滩散落许多汉代陶片，亦见新石器时代的夹沙红陶，并在一水冲断崖上发现厚0.1~0.5米、南北延伸300米许的灰层，其间亦夹杂汉陶碎片。乡政府东面的荒滩上亦遍布红、灰各种陶片，并见成片的风蚀古弃耕地，其间还发现若干段夯土颓垄，当为昔日房宅或城垣的遗迹，惜已残破太甚，无法勾勒出其完貌。盆地北大坝的黑崖子上还有古墓群1处，俗称将军墓。清代在盆地又设屯堡，名昌马堡子。可见昌马盆地为汉代乃至后代人类活动的频繁之地。昌马河谷又是沟通走廊平原与青藏高原的要径，军事地位显要，在这里筑城设县具有防犯羌人北来、隔绝羌匈交联的作用，据此笔者认为天依县当位于昌马盆地中，其城址很可能即乡政府东面荒滩上的颓垄，亦可能被清代筑昌马堡时所利用。《重修肃州新志·靖逆卫》云，靖逆卫（今玉门镇）“与酒泉天依县接壤者也”。这一记载亦与上考结果相符，昌马盆地正位于清初靖逆卫之南，二者地界相连。

玉门 《汉书》师古注曰：“阸駟云，汉罢玉门关屯，徙其人于此。”玉门县亦由此得名。《旧唐书·地理志》云：“玉门军，在肃州西二百里，管兵五千二百人，马六百匹。”《通典》卷172亦如此记载。唐之玉门军即汉以来的玉门县，天宝十四年又改军置县（《新唐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卷152亦云玉门县位肃州西二百里，“本汉旧县也，属酒泉郡。《十三州志》云，玉门县置，长三百里，石门周匝，山间裁经二十里，众泉流入延兴”。《元和郡县图志》卷40则云：“玉门县，中下。东至（肃）州二百二十里。本汉旧县，属酒泉郡。”所记里数与以上诸书略有出入。王国维《流沙坠简序》（《观堂集林》卷17）又云：“余疑玉门一县，正当酒泉出敦煌之孔道”，并认为后晋高居海《使于阗记》所记出肃州后渡金河西二百里的玉门关“实即自汉迄今之玉门县也”。亿考汉玉门县的位址亦与上述记载略同。

出酒泉趋西200里许一带地方，正是今玉门市赤金绿洲之所在。赤金绿洲位祁连山与其北部的宽滩山之间，南北长约18公里，东西宽15公里，石油河流贯其间，祁连山山前洪积冲积扇缘泉水亦在这里出露，水草丰茂，地土沃饶，汉玉门县置于这一绿洲无疑。因为在这一带除赤金绿洲外，余皆洪积戈壁或剥蚀残山，根本无置县的条件。赤金绿洲系一半封闭式的盆地绿洲，周围山丘环列，山沟石峡、石门广布：绿洲南部祁连山脉自东向西有白杨河石门、石油河石门、鸭儿峡、妖魔山安门、西牧场沟口、旱峡、安站口、昌马水峡口等，绿洲北部有赤峡、峡台，西部有沙山子红柳峡，正东70公里许又有黑山峡，正如《十三州志》所云“石门周匝”。这些石门石峡除石油河谷与白杨河谷较长外，余皆长10余公里许，故曰“裁经二十里”。石油、白杨二河汇纳沿途诸泉流，北流入于花海子，此海即汉晋时的延兴海。陈梦家《玉门关与玉门县》（《考古》1965.9）将延兴海比定为赤金堡北13里的赤金湖，误。可见赤金绿洲一带的地理状况与《十三州志》所记颇吻合，汉玉门县确置于这里无疑。唐

僧道宜《释迦方志》卷上记，蒲昌海（今罗布泊）东面少北“去玉门一千三百里”。赤金绿洲位罗布泊东600公里许（鸟道），若考虑到道路的迂曲起伏恰可与1300里之数合，亦证实了上考结论的正确。

据《玉门县志》、《重修肃州新志》等的记载，清康熙年间在赤金绿洲设赤金卫，雍正五年改为赤金所，这里“原有旧城一座，高二丈二尺，根宽二丈六尺，顶宽七尺七寸，周围共一里一分零，没有正南门。于康熙五十六年在旧城西南连筑新城一座，……周围一里二分零。开南、北二门，合新旧城周围共二里三分零”原有的旧城可能即为汉唐玉门县城，或可能是在汉唐玉门县城的基础上构筑的。今新、旧二城犹有遗迹留存，名赤金堡，位赤金镇内。二城东西相连，东为旧城，略呈方形，仅遗东、西、北三面部分墙段，残高0.5~3米，镇小学位于城中；西为新城，长方形，亦存部分墙垣，残高45~米。该城因处人烟稠密的乡镇，所受干扰破坏较重，今地面已无遗物可寻。

赤金绿洲自汉代以来就为重要的农垦屯田之地。出土于T·46n烽燧（斯坦因编号，位金塔县北部）的汉简云：“令玉门屯田吏高年垦田七顷□□□刑十七人”（《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947简），表明玉门县设屯田吏，有一套田官系统，并有驰刑徒等从事屯田。赤金又地当丝绸之路干道，自古以来就是酒泉连接敦煌，并进而西出西域的必经之地，赤金北沿石油河谷又可抵达花海绿洲，其交通地位重要。赤金镇东20公里的清泉乡即为著名的火烧沟文化遗址，其附近还分布着白土梁汉墓群和窑洞汉墓群。

会水 《汉书·地理志》载：“呼蚕水出南羌中，东北至会水入羌谷。”又云会水县“北部都尉治偃（前）（泉）障，东部都尉治东部障”。师古注曰：“阩駟云众水所会，故曰会水。”呼蚕水已如前考即今讨赖河，羌谷水“出羌中，东北至居延入海”，即今黑河（弱水），会水县当位于讨赖河（北大河）汇入黑河处一带。《史记·夏本纪》索隐曰：“案《水经》云弱水出张掖删丹县，西北至酒泉会水县入合黎山腹。”合黎

山今亦同名，为走廊北山的中段，今临泽、高台、酒泉、金塔等县以北延伸的剥蚀残山属之。《水经注》卷40云：“合离（黎）山在酒泉会水县东北。”标明了会水县与合黎山的相关位置。金塔县天仓乡以北10公里许黑河右岸的大湾城堡（汉肩水都尉府）所出汉简曰：“出钱千三百□七，赋就人，会水宜禄里兰子房，一两。”（《居延汉简甲乙编》506.27）；“……粟会水”（541.47）；“到会水而不交难亭留待难”（无出土地，甲附4）。盖肩水与会水相邻，故有会水县的就入（佣）。

《元和郡县图志》卷40：“白亭海，在（酒泉）县东北一百四十里。一名会水，以众水所会，故曰会水。以北有白亭，故曰白亭海。方俗之间，河北得水便名为河，塞外有水便名为海。”酒泉东北140里正是今金塔县城东北25公里的县良种场东部及其以远的条湖一带，这里为一条东北——西南向斜长约20公里、宽8~12公里的洼地，北大河故道从洼地北部穿过，洼地东北又与黑河河床相连。洼地中不仅地表径流可以注入，而且绿洲农田灌溉回归水亦排每出露，今天虽北大河已无余流泄入，但仍见成片沼泽湖滩和已干涸的盐渍草甸分布，并且仍有大片的芦苇生长，还留下了条湖、芦苇沙窝、野麻湾等地名。这片洼地无疑为唐白亭海之所在。此海实即北大河与黑河交汇处的河道湖，汉肩水都尉府位该湖东北15公里许。

这一湖沼地带以北系走廊北山山前洪积戈壁，以南则遍布半固定的白刺灌丛沙堆和柽柳灌丛沙堆，沙堆高约2~4米，并间有新月形沙丘和流动沙梁分布（今名东沙窝）。在这些沙堆的丘间上则散布着成片的弃耕地，遗迹清晰，地表形态表现为遭受风蚀的光板硬质地面，渠道、阡陌的残迹依稀可辨，并到处散落灰陶片、红陶片、碎砖块、石磨残件等遗物，甚至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刀、石锄、石纺轮、夹砂红陶片等亦屡屡出现，有些地段俯拾即是。由此表明今日沙浪滚滚满目龙荒的东沙窝，昔日曾是一片人类活动频繁的繁荣绿洲，其范围南北30~35公里，东西20公里许。这片故绿洲垦区还残存着十余座故城遗址，计

有：西三角城，小三角城、西古城、一堵城、三角城、下长城、破城、黄鸭墩城（银耳子城）、三个锅桩、下破城、北三角城、西窑破庄等。从其周围暴露的大量遗物看它们均为汉代始建，大多废于唐代以前。城址附近不远多有汉墓群分布。并在这一带还可看到不少故陶窑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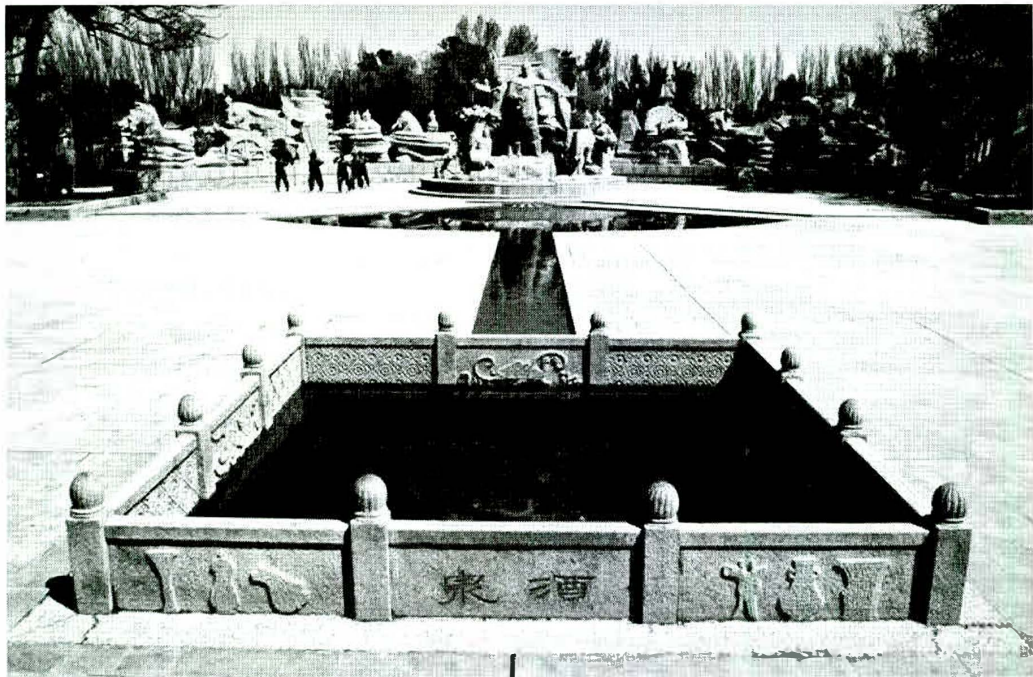
这些故城址大都规模较小，多呈方形，周长一般50~200米不等，仅破城（89米×89米）和西古城（80米×200米）较大。依汉代县城的通常规模，笔者认为西古城当为汉会水县城。该城位金塔乡五星二队西部，分东西二城，西城80米×90米，东城80米×110米，总面积80×200平方米。墙垣多已倾圮，残高1.5~3米许，许多地段仅见墙基，宽7米许，夯土版筑，夯层厚0.1~0.3米。城角4个角墩仍甚显著，残高6米许。北垣部分墙体被红柳沙堆壅压，沙堆高约4米，城西、城北亦多有沙堆侵入，城南、城东已被辟为农田、村舍。城内城周暴露有汉代灰陶片、碎砖块等物，亦见后代的陶片、瓷片等。该城东北6公里处为一较大的汉墓群区，城东、城南约1.0余公里范围内又为故绿洲耕地的集中分布带，城东2公里许还发现新石

器遗址——渝树井遗址，地面暴露夹砂红陶、粗陶片等。西古城地当由酒泉沿北大河、黑河河谷通往蒙古高原腹地的要道，所处位置与上引诸史籍及汉简记载皆合，且规模又系东沙窝汉代诸城之最大者，应为汉代这一带最高政权机构——会水县的治所。至于其他诸多小城当为乡、里治所或军事驻所。

至于上云会水县境内的北部、东部二都尉，居延汉简亦曾提及。如“其一封居延都尉府章，诣酒泉北部都尉府”（44.16, 破城子）；“乃以戊午宿酒泉北部[都尉]”（484.20, 破城子）等。又金塔县天仓乡北黑河右岸地湾城堡所出简有“东部北部塞”的记载（甲1261），有可能即指酒泉郡东部和北部都尉所辖塞垣。据考古工作者的发掘研究，酒泉郡北部都尉辖有今玉门市花海东、疙瘩井北及其以东一些地区的塞墙，其东则为东部都尉边塞，该边塞经金塔县北一直东延至鼎新西，又接张掖郡肩水都尉肩水侯官塞（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笔者又进而认为北部都尉所治的偃泉障可能为今西坝乡西移村北6公里的石银子坊故城，东部都尉所治的东部障今大庄子乡东北约20公里的西窑破庄故城可当。限于篇幅，不赘。

西汉酒泉郡禄福等6县城址考论如上。由此我们可

以得识，这些城址的布局不是偶然的，它们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由特定的空间关系（自然的、经济的、政治军事的等）所规定的。设县之处均是发展农业生产自然条件优越，特别是水资源较丰盈的地方，因为绿洲县城主要是在屯垦开发的基础上形成的，农业经济基础乃是制约其发展兴衰的主因之一。这些县城又都位



酒泉公园

（图片提供：孔令奇）于贯通走廊平原的丝绸

“一带一路”视野下甘肃方志编纂与文化传播构想

陈郑云

摘要：中国方志文化在记录当代、保存历史、传承文明、发展文化、激发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推动海内外文化交流合作、提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借鉴和智力支持等方面，成绩日益突出、作用日益显著。在新的“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为使文化交流更好地服务政治经济交流的大局，甘肃应加强方志编纂与方志文化传播，创新方志文化对外传播的路径，拓展方志文化内涵，提升甘肃方志文化的学术影响力。

关键词：“一带一路”战略、甘肃方志文化、对外传播

自“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全国各地都在以不同方式主动融入这一战略，为各省区的发展争取资源、拓宽路径，甘肃也不例外。甘肃省政府对于甘肃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是：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构建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和次区域合作战略基地。

“一带一路”，既是历史概念，也是现实战略。方志文化在记录当代、保存历史、传承文明、发展文化、激发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推动海内外文化交流合作、提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借鉴和智力支持等方面，成绩日益突出、作用日益显著。然而，作为联系历史与现实的重要桥梁与纽带，地方志、地方

史、年鉴应成为“一带一路”史志文化的重要载体，成为文化软实力的史料基础，成为继往开来中华文化乃至华夏文明传承、传播的权威工程、精品工程、传世工程。地方史、地方志、年鉴等多层次、多维度、全方位、百科式的文化传承，能让人充分感受到“一带一路”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地方史、地方志、年鉴等进一步开发利用，发挥文化传播导向，既能促进“一带一路”文明传播的推陈出新，又能够助推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为传递文化正能量提供源源不断的原始资料 and 信史精品。

因此，本文在论述甘肃独特的地方志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分析甘肃如何在“一带一路”视野下依法编

之路东西大道沿线，或走廊平原沟通蒙古高原腹地的北大河、黑河河谷沿岸、或沟通青藏高原的昌马河谷盆地中，均具有重要的交通、军事等方面意义。汉武帝河西开边之主旨即在于切断匈奴右臂，打通东西交通孔道，屏卫边境安全。《史记·匈奴传》云置酒泉郡隔绝胡与羌之路，《大宛列传》又云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这些县城的分布格局表明，它们不单是绿洲土地开发范围的标志，反映了地理条件对绿洲开发的制约作用，更是汉朝将河西作为“以通西域、隔绝南羌、匈奴”之基地来从事经营的政治战略在地理布局上的反映。上述县城附近往往分布新石器遗址和汉代墓

群，因为不论是石器时代的原始公社抑或后代的文明社会，人们总是要选择一个地区中自然条件理想之处设置居民点，特别是大的居民点。根据新石器遗址和汉墓群的分布来考索汉代县城位址，或根据汉县城址来探查新石器遗址和汉墓群的布局，这对于考古工作以及城市起源的研究有参考意义，这些城址发展到今天，有的仍为城市或大的集镇所在地，有的则由于人为的或自然的原因引起的环境变化，早已深处沙漠之中。研究它们的兴废及其地理环境的历史变迁对于今天绿洲地区的开发整治、防沙治沙又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

（作者：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修史志，利用方志文化资源，拓展方志文化内涵，发挥其文化传播作用，提升甘肃方志文化的学术影响力。

一、甘肃方志文献是“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根据《“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段建设总体方案》中所提出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的总体思路，甘肃对黄金段的建设重点在于推进道路互联互通、经贸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合作、经济新增长极、人文交流合作、战略平台建设等六大工程。从这六大工程来看，都离不开“合作”、“交流”、“互通”等“连接”功能，这表明甘肃打造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黄金段”作用，就是发挥好甘肃作为“一带一路”黄金段的地理和人文连接作用。

甘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发挥地理连接的重要节点城市有兰州、白银、酒泉、嘉峪关、敦煌等。而地方志正是这些重要节点城市人文链接、文化传承和彰显文明的重要载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马上了解一个地方的重要情况，就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历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这是我的一个习惯。过去，我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地方志。”这种以志为信、以志为鉴的认知方法，则是源于地方志特有的“存史”功能。

甘肃修志历史悠久，有着鲜明的区域特色。如“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的重要节点城市敦煌，敦煌石室中发现的《沙州都督府图经》、《西州图经》等作为早期方志，弥足珍贵。以后历代编修，至今甘肃境内可考的各类方志约500余部，包括省志3部、府志32部、州志85部、县志210部、厅志1部、关镇卫所志23部、山水寺庙志8部、人物志11部、乡土志17部、地记32部、图经23部、调查记17部、采访录4部、杂记31部、要览7部、星图1部。这些方志，全方位记载甘肃的历史文化、地理风貌、社会风俗、物产资源等，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更是“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文明传承的重要文献载体。

二、“一带一路”与甘肃方志编纂与文化传播构想

甘肃省之所以将甘肃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主要源于东西长度约1600公里的甘肃，不仅是内地连接边疆的交通要道，也是内地与边疆进行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更是连接中亚、中东、欧洲的次区域合作地段。可见，“丝绸之路”因其自古以来横穿甘肃，体现了甘肃多元融合的文化特色，也成为甘肃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可以唱响的发展主题。不仅如此，甘肃东北部与长城沿线、西南部与藏彝走廊沿线密切的地理和人文关系，更使得甘肃在“一带一路”战略中能发挥好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经济、文化的连接作用。2015年国务院颁布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首次将“史志不分家”上升到国家顶层设计层面，强调“将地方史编写纳入地方志工作范畴，统一规范管理”。这种“史志合一”的统管编修机制创新，无疑是对传统史志学术文化的又一重大突破，必将对史志文化“承前启后、开创未来”产生重大影响，导启中国史志文化的新纪元。

因此，甘肃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就要及时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规划纲要》，修志问道、直笔著史，强化地方史、地方志、年鉴的编纂工作，勇于担当史志文化传承、传播责任。

1. 强化顶层设计，积极推进依法治志

在建设“一带一路”的进程中，我们应当坚持文化先行，通过进一步深化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沿线国家落地生根。

“一邑之典章文物，皆系于志”。回顾延续两千多年的方志发展史，持续不断的地方志编修活动，与官方行政推动是分不开的，与“官修史书”的传统是分不开的。自隋初，“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汇编《诸州图经集》，我国有组织地大规模编修地方志之始，后基本确立史志官修制度后，历代不断颁布政令对修志进行统一规范，通过行政命令推动修志工作。据不完全统计，新

中国成立前, 历代共发布修志命令 46 份, 包括清以前 35 份、民国时期 11 份。这些政令确立了编修地方志是“官职”“官责”, 并不间断地从编纂方法、内容要求等方面进行统一规范, 为我们留下了 8000 多种旧志典籍。《规划纲要》指出, 要以修志编鉴为主业, 统筹兼顾理论研究、开发利用、信息化建设、方志馆建设、旧志整理等工作, 实现地方志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规划纲要》的指引下, 甘肃致力于全面发展, 进一步树立和强化依法治志、科学治志、开放治志意识。2016 年 5 月份开始施行的《甘肃省地方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以下简称《发展规划》), 标志着全省地方志工作迈入了全面依法治志的新轨道。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 要自觉运用《发展规划》来审视和检验地方志工作, 对照《发展规划》检查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需要努力的方向, 综合运用执法检查、行政督察等手段, 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地方志工作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的能力。与此同时, 要坚持科学治志, 遵循规律、突出重点、协调推进; 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好治志过程中的若干重大关系, 比如, 修志与编鉴的关系, 提高志鉴质量与加快工作进度的关系, 修志编鉴与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的关系, 发挥地方志工作机构主动作用与调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的关系, 等等。要坚持开门修志, 善借外力, 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和方方面面的积极性, 不断充实和壮大地方志工作队伍, 扩大地方志事业发展的社会根基和社会影响力。社会各界人士应提高对地方志重要性的认识, 积极参与地方志的开发利用工作, 以地方志为基础创造更多的优秀文化成果, 努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参与地方志事业的良好氛围。

2. 纂修精品志鉴, 拓展方志文化内涵

甘肃是承东启西、连接欧亚的重要通道, 是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和次区域合作战略基地。“一带一路”给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个新概念, 构建了向西开放新格局。后队变前队, 甘肃从过去相对落后的后方, 变成了向西方开放的前沿。面对机遇, 甘

肃的战略定位: 向西开放的纵深支撑和战略平台、丝绸之路的综合交通枢纽和黄金通道、经贸物流合作的区域中心、产业集聚和合作示范基地、人文交流合作的桥梁和纽带。用一句话概括, 就是要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

对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下甘肃要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 地方志事业应站在更新的文化高度, 进一步做好精品志书纂修, 拓展方志文化内涵。首要任务是志史兼修, 立体纵深。一要实施志书精品工程。《规划纲要》要求, 要坚持存真求实, 确保地方志质量, 严把政治关、史实关、体例关、文字关、出版关, 编纂出版经得起历史检验、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的地方志成果, 为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提供资鉴史料。二要实施年鉴精品工程。《规划纲要》要求, 大力推进地方综合年鉴工作, 到 2020 年, 做到地方综合年鉴由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编纂, 一年一鉴, 公开出版, 实现省、市、县三级地方综合年鉴全覆盖; 要制定质量管理与质量监督规定, 完善质量评议与审查验收制度, 设立年鉴评比奖励项目, 为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提供可信的年鉴资料。三要实施名镇志文化工程。“在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 地方志也要改革, 也要创新, 编纂名镇志就是地方志工作的创新, 也是留住乡镇记忆的文化工程。”即在体例、篇目结构、记述方法等方面创新, 在保持“志性”的前提下记述出名镇的“特性”, 增强志书的可读性与功用性; 通过名镇志的编纂, 记载“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甘肃段沿线的乡镇历史文化, 记住乡愁, 留住乡音, 传承乡风。这一项项工程, 既是一个地方志创新工程, 又是一个国家的信史文化工程。只有这样做好精品志书纂修, 拓展方志文化内涵, 志史兼修, 立体纵深, 才能全面、系统地传承方志文化, 让“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在从甘肃地方史志中汲取智慧的同时, 更宏观、更全面地了解、借鉴积淀深厚的甘肃文化资源。

3. 依托“一带一路”, 提升学术影响力度

中国方志文化在世界传播甚广, 尤其受“中华文

化圈”的外国学者的“青睐”。甘肃省是“一带一路”上的黄金段，是一颗耀眼的明珠，这是不争的事实。甘肃不仅是连接亚欧大陆桥的战略通道和沟通西南、西北的交通枢纽，西北乃至全国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基地、有色冶金新材料基地和特色农产品生产与加工基地，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示范区，还是构建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和次区域合作战略基地。这也是甘肃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框架，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的重要优势。要搞好黄金段的发展，就要充分利用自身的重要优势，要坚持共享发展，共享是黄金段人民参与黄金段发展与实践的内在驱动力。只有让黄金段人民不断有获得感，他们才会把发展与自己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才会有投身于建设黄金段的激情和干劲。

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建设，方志文化是公共文化的重要内容，在甘肃方志文化发展中，要发挥地方志资源在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中的重要作用，利广泛宣传地方志成果，推动方志文化进农村、进社区等活动，推动城乡方志文化建设，培育地方历史记忆。正如《规划纲要》强调，要健全地方志工作机构主导、社会各界有序参与修志编鉴的途径和方式。因此，甘肃省的地方志工作不能单打独斗，要学会合作，达到共赢、共享，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档案机构、图书馆等单位加强交流，引导社会各界更广泛地参与地方志工作，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升事业发展水平。同时，推进甘肃方志文化走向世界工程，服务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推介一批高质量地方志成果，充分展示地方志的当代价值及永恒魅力，增强方志文化的学术影响力。

4. 彰显民族特色，重视民族地区修志

整个甘肃河西走廊南部分布的众多少数民族如蒙古族、藏族、裕固族、哈萨克族，与甘南、临夏两州的藏族、回族、保安族、撒拉族、东乡族一起，创造了绚丽多彩的甘肃少数民族文化。这些文化既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又是内地汉族农业文化与边疆牧业文

化的连接带文化，因此甘肃文化自然就成为连接古代与今天、内地与边疆不同民众多元文化的桥梁。这座桥梁，不是独木桥，而是纵横交错、穿越古今的文化理解与尊重的桥梁。内地人到甘肃来，通过了解甘肃的多元文化，为其接近和了解边疆不同时代不同族群的文化奠定人文基础，而边疆人从甘肃进入内地，通过对甘肃多元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又拉近了其与内地文化的距离。通过这种内地人与边疆人之间持续不断的了解与认识，久而久之，内地与边疆的文化以甘肃多元文化作为桥梁，从而形成多元共存、百花齐放的中国文化，这是甘肃作为“一带一路”“黄金带”所发挥的文化连接作用。

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瑰宝，最具民族特色和地方文化的地方志，同样肩负着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因此，对于甘肃民族地区史志来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重视“民族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和“支持民族地区做好地方志编纂工作”、“加大对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地方志工作的支持力度”，不仅体现党中央、国务院对民族地区地方志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更重要是彰显民族地区地方志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具有的独特文化作用。民族地区编修的地方志书，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全面系统地记述民族地区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传承和传播尊重差异、多元一体的文化观，引导和帮助民族地区各族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和历史观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带一路”在文化多样性的重构中，涉及宗教民族方面政策时，有待地方史志提供历史经验和智慧，方志文化有利于构建“一带一路”联系历史与未来的桥梁。因此，甘肃要凭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黄金带位置，通过方志文化交流与传播，架起各族民众互相尊重、包容、共享、信任的桥梁，促进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提升。

5. 利用媒体推介, 创新方志传播路径

在美国、在欧洲、在日本的许多国立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古籍中, 有着大量丰富的地方志史料, 为确立汉学研究、推进中国研究发挥了极大作用。鉴于方志文化的国际知名度和认可度, 在“一带一路”视野下, 甘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 地方志工作部门应与甘肃卫视文化频道等传统媒体合作, 精心打造方志文化对外宣传名牌, 可以拍摄制作方志文化纪录片《方志甘肃》, 纪录片可以展示了两千多年来甘肃方志的起源、发展历程和累累硕果, 凸显甘肃从清代、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修志史上所取得重要的成果。剧情可用以事系人的方志笔法展开, 用文字、选配甘肃方志历史图片为支撑, 讲述了甘肃方志史上传承至今的往事, 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立体式地展示甘肃地方志中记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重镇的风土人情、文化历史。这可以对人们认识地方志, 深入了解地方志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宣传教育意义, 对发展地方志事业、对广大地方志工作者都将有巨大的鼓舞和激励作用。

在新兴传播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 正如《发展规划》强调, 要加强地方志信息化建设, 按照分级建设、资源共享、安全高效的原则, 加快省、市、县三级地方志网站建设进度。要按照全国地方志事业信息化发展意见的有关要求, 不断升级完善地情网站和地情资料库软硬件设施, 广泛应用“互联网+”、微信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逐步实现修志编鉴的数字化、网络化, 构建多界面、多渠道、多元化、全方位的信息化综合服务体系。因此, 要最大化地利用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资源, 实现“甘肃志库”+互联网, 开设微信平台、APP终端等现代媒介技术, 打造网络史志“一带一路”软实力, 扩大甘肃方志文化对外传播的受众, 提高甘肃方志文化对外传播的信息流通效率, 促进甘肃方志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为“一带一路”提供实时信史文化资源、文化品牌支撑。在传承的同时进行实时有效传

播, 更好地贴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贴近人民群众需要, 充分发挥地方志资源在“一带一路”公共文化服务中的“资政”“商鉴”“教化”等重要作用。

结语: 在当前我国大力实施“一带一路”的战略指引下, 在甘肃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和文化强省的引领下, 如何抓住国家宏观政策给地方志文化带来的巨大机遇, 努力开展地方志文化与“一带一路”战略对接的相关研究, 对我省地方志文化“走出去”, 扩大我省地方志文化的影响力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甘肃地方志文化在更好的传播反过来必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助推甘肃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的宏伟蓝图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 [1] 邓敏杰. “一带一路”推陈出新与方志文化“双传”导向[J]. 广西地方志. 2015(06).
- [2] 徐黎丽、王悦. “一带一路”建设中甘肃“黄金段”作用的发挥[J]. 西师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5(06).
- [3] 车安宁. 甘肃历史上的方志编修[J]. 甘肃日报. 2013年6月24日(13).
- [4] 郝玉屏主编. 甘肃方志通览[M].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7.
- [5] 刘伟平. 着力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J]. 求是. 2014(18).
- [6] 20省份全面布局“一带一路” 甘肃定位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N]. 西部商报. 2015年1月29日(A16).
- [7] 蔡武. 坚持文化先行 建设“一带一路”[J]. 求是. 2014(09).
- [8] 邱新立. 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 解读[J]. 中国地方志. 2015(11).
- [9] 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 [E].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5年9月11日(09).
- [10] 李培林. 坚持依法治志, 推进地方志事业全面发展——在纪念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实施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R]. 2016年5月13日

(作者: 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

谈年鉴体例和编撰思路

唐剑平

摘要：中国年鉴发展速度很快，30余年来，出现了三次发展高潮，但中国年鉴整体质量不高，数量与质量发展不同步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影响中国年鉴事业的健康发展。中国年鉴整体质量不高的原因有很多，重要的原因是年鉴工作者没有真正了解年鉴的体例，没有掌握正确的年鉴编撰思路。年鉴编纂思路涉及年鉴编纂的所有质量环节，而年鉴编撰思路专指条目编撰思路，这是年鉴编纂质量的核心。提升中国年鉴的整体质量，关键要正确了解年鉴的体例，树立正确的年鉴编撰思路，才能确保年鉴质量的方向。

关键词：年鉴、体例、编撰思路

中国年鉴发展30余年来，其基本特点有二，一是发展速度快，先后经历了三次发展高潮，第三次发展高潮正在进行中，年鉴数量庞大，仅2012年国家图书馆统计，其馆藏年鉴种类就达5769种^①。目前，全国年鉴种类有6000余种。二是年鉴整体质量不高，主要表现是年鉴编撰思路不到位，导致条目编写不规范，信息挖掘不具体，资料不全面，语言不规范等。中国年鉴数量与质量发展不同步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影响中国年鉴事业的健康发展。年鉴数量发展毋庸置疑，但年鉴质量问题不容忽视。如何有效提升中国年鉴的整体质量？这是摆在我们广大年鉴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笔者认为，要提升中国年鉴的整体质量，关键要正确了解年鉴的体例，树立正确的年鉴编撰思路，把握年鉴质量的方向。

一、正确了解年鉴体例是编好年鉴的前提

“大凡工具书的编纂，都要遵循既定的体例，以保证其整体性和高品质。年鉴作为工具书的一种，其编纂也离不开体例规范。否则，无法众手成书，更无法达到较高的质量和具有鲜明的风格。”什么是体例？^②体例是书或文章的组织形式和编写方法。顾名思义，体就是体裁，体裁是书或文章的种类和样式；

例就是凡例，凡例是书或文章的编写规则。文艺创作有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故事等不同体裁，公文写作有报告、总结、计划、会议纪要、讲话稿等不同体裁，史有史体，志有志体，鉴有鉴体。地方志主要分志书和年鉴两种体例，两者有共同之处，也有明显的区别。

长期来，中国年鉴编纂出现“千鉴一面”和“五花八门”的现象，是导致中国年鉴整体质量不高的两个主因。年鉴编纂“千鉴一面”和“五花八门”现象就是年鉴体例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不了解年鉴体例，其编纂的年鉴明显不合鉴体。或张冠李戴，年鉴“志书化”；或拿来主义，年鉴“总结化”“报告化”“新闻化”“通讯化”“简讯化”等；或杂乱无章，不少年鉴体例很乱，有“志书化”“总结化”“新闻化”等多种体例；或简单化记述，年鉴成为“流水账式”“大事记式”；或资料汇编，大量采用一次性文献，有的只是稍作加工处理就编进书中。凡此种体例问题，在各地年鉴中普遍存在，严重影响年鉴的编纂质量。

年鉴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正在构建“年鉴学”，年鉴有其鲜明的体例特点。那么，年鉴的体例特点有哪些？概而言之，年鉴体例即年鉴体，年鉴体

①肖东发：《年鉴学》附录1张丽丽《浅析新中国年鉴出版发行特点》，方志出版社，2014年，第416页。

②许家康：《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线装书局，2006年，第36页

即条目体，年鉴全书正文部分都是以条目的形式编纂而成的，因此，条目体就是条目的总和。显然，这样的解释是很简单的，是很难让人理解的。过去，很多年鉴理论文章包括一些年鉴专业书籍并没有把年鉴体例阐述清楚，仅仅停留在一些概念上，以至于众多的年鉴编撰者云里雾里，对年鉴体例摸不着头脑。下面，具体分析“年鉴体”的一些主要特点。

1. 条目化，分栏编排。就结构和编排而言，年鉴与志书截然不同，年鉴是条目体结构，一般分栏目、分目、条目三个层次，分栏编排；志书是文章体结构，分编章节目，通栏编排。在综合年鉴中，除特载、专文、大事记、法规文件、统计资料等非条目形式外，其他内容都应条目化。因此，条目是表现年鉴内容的基本手段，这是年鉴对内容表达形式的最佳选择，是年鉴自身属性的基本要求，也是地方年鉴编纂中应当遵循的规律之一。条目化是对“文章化”的否定。如果年鉴中都是长篇大论侃侃而谈的文章，就失去了工具书的特点。有的年鉴采用文章体结构，有的通栏编排，这些都不符合年鉴条目体的要求。

2. 条目分类，资料全新。年鉴条目分综合性条目、常规性条目和单一性条目三类，综合性条目、常规性条目反映宏观、中观内容，单一性条目反映微观内容。三类条目做到宏观、中观资料全面，单一性条目标题精准，微观信息具体，具有新颖性和可读性。年鉴条目体明显不同于“志书化”“总结化”“报告化”“流水账式”等写法。当前，“志书化”“总结化”“报告化”“流水账式”等年鉴泛滥；同时，年鉴界在不断批评年鉴“千鉴一面”的情况下，“假条目”年鉴又应运而生，迷惑读者。所谓“假条目”年鉴，就是看上去像条目化，但因其选材不到位，导致标题空泛，内容空虚，不具备立条资格，其根源也是年鉴“总结化”“报告化”或“新闻化”“通讯化”“简讯化”等。

3. 语言简朴，客观记述。年鉴语言与志书基本一致，要求简洁、平实、准确、真实、客观、不溢美、

不隐恶、秉笔直书，其中，“准确”“真实”是年鉴的生命，是必须遵循的原则；单就“简洁”“平实”“客观”这些一般要求，很多年鉴都做不到，书中大量存在套话、大话、空话，废话很多，水分很大，主观性词语和句子更是随处可见。这些严重影响了年鉴的资料价值，是年鉴编纂质量差的主要表现。

总之，年鉴有其固有的编纂体例，年鉴不同于志书，年鉴不能“志书化”编撰；年鉴不同于总结、报告、通讯、简讯等，不能采用拿来主义；年鉴不是流水账，不能简单化记述；年鉴更不是资料汇编，不能编成大杂烩式年鉴。要编好年鉴，提升年鉴质量，必须了解并遵循年鉴的体例。

二、树立正确的年鉴编撰思路才能确保年鉴的方向

年鉴体例的作用是确立符合年鉴特点和发展方向的总体结构及编纂方法，它是年鉴编纂的纲领或大法，遵守年鉴体例，才能规范年鉴编纂，年鉴才能编得像年鉴。但是，年鉴体例只是一个高屋建瓴的方向性纲领，是对年鉴编纂宏观上的规定，其内涵是比较粗线条的。很多人领会不到年鉴体例的具体内涵，不能真正把握年鉴的体例，往往只停留在“年鉴体例就是条目体”“条目体就是条目化编撰年鉴”这种结构形式的粗浅认识上，认为只要按条目体编撰年鉴就万事大吉了；有的还不按条目体编撰年鉴，认为年鉴只要记述上一年度的事就行了。所以，很多年鉴工作者不了解年鉴，不懂年鉴，写不好年鉴，编不好年鉴。

要编好年鉴，提高年鉴的编纂质量，不但要了解年鉴体例组织结构上的特点，更应了解年鉴编纂方法上的特点。年鉴的编纂方法就是年鉴的编纂思路，年鉴编纂思路是年鉴体例内涵和特点的具体内容，是年鉴编纂实践的理论指导和行为准则，是提高年鉴编纂质量的武器和法宝。可见，树立正确年鉴编纂思路，才能确保年鉴质量的方向，这是有效提高年鉴编纂质量的关键。

年鉴编纂思路涉及框架设计、条目编撰、图表运

用、图片专版组织、版式设计、封面设计、校对审核、出版印刷等每一个质量环节，这是年鉴质量的体系范畴，是年鉴质量的系统工程。年鉴编纂的质量核心应该是年鉴条目的编撰质量，影响年鉴条目质量的主要是条目编撰思路。因此，树立正确的年鉴编撰思路，才能有效提高年鉴的编撰质量，这是年鉴质量的核心，是确保年鉴整书编纂出版质量的前提。长期以来，对于年鉴编撰思路，年鉴界重视不够，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年鉴编撰思路来规范年鉴编撰工作，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未能有效指导广大年鉴工作者，推动年鉴整体质量的提高。即便是年鉴评奖，由于种种原因，明显存在忽视年鉴编撰质量的情况，重表象，轻内质，导致年鉴评奖出现偏差，误导年鉴质量的方向。

年鉴编撰思路是一个集合概念，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当前，中国年鉴出现“千鉴一面”“五花八门”的现象，主要原因是年鉴的编撰思路不正确；要提高中国年鉴的整体质量，首先应纠正年鉴编撰思路。除年鉴体例的结构特点外，正确的年鉴编撰思路主要体现在以下这些方面：

1. 采用第三人称表述，不能用第一人称。第一人称表达方式有很多，比如，我、我们、我局、我市、我省；本人、本单位、本局、本市；局领导、局党委；还有“来”“赴”“往”等。不用第一人称是年鉴编纂的最基本要求，是必须遵守的规范。可是，发现不少出版的年鉴大量使用第一人称表述，包括国家一级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的年鉴，高校年鉴多数使用第一人称表述。

2. 条目分类要科学合理。条目一般分三类，即综合性条目、常规性条目、单一性条目。

综合性条目是年鉴中最重要的条目，其表现形式是以【概况】作为统一的条目标题，记述宏观或中观内容。综合性条目反映一个单位过去一年的主要年度工作情况，每个部门单位必须写【概况】条目。在条目排序上，综合性条目排在第一位，这是其特殊内容

和地位所决定的。大的单位设分目，每个分目下也必须写【概况】条目。有的分目还设次分目，每个次分目的第一个条目也应是【概况】条目。

常规条目属于综合性条目范畴，它记述的是一个重要的工作面，是一个重要的块状工作，或连续数年才能完成的一个较大的项目工程，内容相对独立。其主要特征有两个：一是标题年年相同，内容年年新，所谓“旧瓶装新酒”；二是连续记载，确保资料的完整性。当然，项目工程类条目根据发展情况，标题每年可以有所变化，动态记述，但主题词必须相同。常规性条目视实际情况而设，有的单位没有重要的块状工作，也没有跨年度的重大工程，可以不设。

单一性条目是年鉴条目中最新鲜、最富有个性、最活跃、最有可读性的内容，也是年鉴条目的主体。单一性条目的特征是一事一条，动态性内容，一般一个主题，少数两个主题。单一性条目缺少的年鉴，必然缺乏新颖性和可读性，索然无味，资料性和信息性不强，社会利用价值和存史价值不大。这样的年鉴明显具有“志书化”的特征，属于“千鉴一面”的问题年鉴。

关于条目分类，年鉴理论界的认识基本一致，但是各地年鉴编撰者在认识上和编撰实践中却是大相径庭，很多年鉴没有遵循这一规范，诚然，在具体操作中也存在一定的难度。

3. 条目比例应适当。这是衡量年鉴质量的一个重要尺度，不少年鉴的条目比例明显失调，有的综合性条目时有缺失，有的常规性条目过多，有的单一性条目过多，且其单一性条目不够立条资格，假条目居多，滥竽充数。综合性条目、常规性条目和单一性条目的正常比例应为：25：15：60，符合立条资格的单一性条目应占60%以上，动态条目多了，年鉴内容就鲜活了。

4. 条目标题要精准。这是条目编撰质量的直观表现，所谓精准是指单一性条目标题，当然，常规性条目标题同样要精准，做到标题与内容相一致，帽大帽

小都不适宜。标题是条目的眼睛，反映条目内容的主题。标题要求主题鲜明，语言极简，没有废字，不用虚词。年鉴质量高不高，看看标题就知道。单一性条目标题必须遵循以下三个原则：1) 一句话标题原则，切忌长标题。2) 主题词尽量前置。3) 形容词、表程度的副词、抽象性词语不能用。

5. 条目要素要齐全。综合性条目、常规性条目、单一性条目有两个必备要素，一是时间，二是主体或主语。不少年鉴的综合性条目、常规性条目往往缺失这两个要素，有的时间要素运用比较乱，全书不统一，比如，有年份、全年、年初、是年、月份、无时间等不同表述。时间要素缺失，时间表述不严谨，主体或主语缺失，是年鉴质量不高的重要表现。单一性条目标题直接关系到年鉴的编撰质量，通常有六个要素，即“时间”“地点”“事件”“人物”“原因”“结果”，有的条目还有“背景资料”，并非所有的单一性条目都要具备这些要素，应根据条目实际内容而定，有的没有“原因”，有的没有“结果”，有的不需要“背景资料”，但时间、主语或主题词必须有。

6. 条目选材要做到“全”“新”“深”。条目选材是写好条目的基础，收集的资料越多越全，选材就能实现全面、新颖和深入，资料越全面，年鉴就越有价值。

综合性条目选材力求做到：1) 全面。全面要求做到“横不缺项、纵不断线”；基本资料与发展情况相得益彰，主次分明，详略得当，排列有序，讲究章法。2) 新颖。采用的资料不但要新鲜，而且要重点记述具体的发展变化情况，体现年度特色和单位特色，不能简单地罗列数据，作填充式的记述。3) 深度。资料有深度，年鉴的价值就大，这是对综合性条目的更高要求，但操作起来有难度，应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只要确保资料的全面性和新颖性，就能保证综合性条目的基本质量。

单一性条目是衡量年鉴资料全面性一个重要指标，年鉴如果光有综合性条目，没有单一性条目，或

单一性条目偏少，其信息资料就很粗，新颖性和可读性就很差，“志书化”年鉴、“总结化”年鉴（总结拆分条目）等就属于这种情况。单一性条目应围绕“大事”“要事”“新事”“特事”“亮点”进行选材，重要的单一性条目应反映社会“热点”和“难点”。如果领会单一性条目的这些选材思路，撰写起来就不会太难。但是，很多年鉴单一性条目选材上出了问题，资料深入挖掘不够，蜻蜓点水，大量的单一性条目选题隐没在综合性条目中，缺乏单一性条目；即使有所谓的单一性条目，多数也是综合性内容的拆分，不具备立条资格，又造成【概况】条目缺少内容，有的【概况】条目成为一段或一句空话。这是典型的年鉴编撰思路不对，这样的年鉴是没有质量可言的。

7. 条目语言要符合年鉴体。条目语言是年鉴编撰质量的重要指标，年鉴编撰质量高不高，看条目语言得不得体，水分大不大，废话多不多，表述是否客观、准确。条目语言应符合以下要求：1) 简洁。直来直去，开门见山，直陈其事，不用关联词语。2) 准确。数字、人名、地名、时间、用词等必须准确无误，准确是年鉴的生命。3) 平实。语言朴实无华，用事实说话，只要说明情况，不需要描述经过。4) 客观。杜绝任何主观色彩和感情色彩的字、词、句，纯客观记述。5) 不溢美。年鉴不是“功劳簿”，不用溢美词，不用赞美之语，跳出单位，站在历史的高度进行记述。6) 不隐恶，年鉴要实事求是，既报喜，又报忧，善于记载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各个部门发生的重大事故、案件及其他负面事件等。7) 不议论。述而不作，寓观点于记述之中，画蛇添足的议论对年鉴质量是有害无益的。

很多年鉴不能把好语言关，或枯燥乏味，或拖沓冗长，或用词不准，或逻辑不强，或语言不顺，等等，语言问题很多。年鉴是以记述资料、提供信息为本，年鉴语言是年鉴体的重要内涵，是年鉴编撰思路的重要体现。恪守年鉴体语言，年鉴编撰质量就能明显提升。

编好二轮市县志书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 的几点认识和体会

陈 谦

志书编纂作为一项系统的文字工程，涉及的知识面非常广泛，尤其如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等读者较为关注的内容，编纂过程中的不足之处常常有一定的普遍性。下面，就如何编好二轮志书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谈几点认识和体会。

一、关于序言

序言是地方志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表述修志意图，介绍修志经过和志书内容的文章。书之有序。从古到今，无论是著书、编书或校书等，一般均在书的正文之前设序，已经成为了一种定式。

序可分为自序、他序、代序三种类型。自序，由编者自写，大多阐述编写目的、内容和经过等。他序、代序由编者请托友人或当代名人、地方官员所作，多系称赞性的推荐文辞，或对该书的评价等等。

历来志书的序言，多为自序，他序或代序较少。

8、遵循“点面结合”原则。“点面结合”是条目编撰的总原则，所谓“面”就是综合性条目，主要指【概况】条目；所谓“点”就是单一性条目。年鉴资料的全面性首先体现在综合性条目中，其次体现在综合性条目与单一性条目有机结合上。“点面结合”是年鉴资料全面性的高度概括，是年鉴编撰的总体思路。

年鉴编纂质量的核心是条目编撰质量。以上年鉴编纂方法的八个方面是年鉴条目编撰思路的主要内容，认真领会并把握这些编撰思路，既能有效提升年鉴的编撰质量，又能正确评判一部年鉴编撰质量的高低。可见，确立正确的年鉴编撰思路对于确保年鉴质

不同类型的序所叙述的内容各有侧重，有的以内容为提要，有的谈出版缘由，有的介绍编修经过，有的作简要书评，有的论述方志源流和研究成果等。不论何种类型的序，都是向读者介绍、推荐或评价一部志书。序虽然文字不多，但却是志书的眼睛，读者通过阅读序言就可对志书有一个概括的印象，起引导读志和用志的作用。

要撰写出一篇精粹典雅、言之有物、反映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的志书序言，就要深入分析志书的时代特色、地方特点和资料价值，认真地研究志书的内容。二轮志书序言的撰写没有固定模式与要求，但其内容一般会包含提挈志书纲领的四项内容：

1. 说明编修志书的宗旨，即编修志书的主要目的、作用、原则、方法和要求等。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根本目的就是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为人

量是多么重要。

“体例严谨，栏目设置得当，内容安排得体，文稿编写符合规范，说明年鉴的编纂出版质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体例不严谨，栏目和内容安排杂乱无章，文稿编写有失规范，说明编纂水平较低。体例在年鉴编纂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作用十分突出。”推动中国年鉴整体质量的提高，必须正确了解年鉴的编纂体例，确立一套正确的年鉴编撰思路，加强对年鉴主编、骨干和撰稿人的培训与指导；切实改变当前年鉴“千鉴一面”“五花八门”的不良局面，变被动编辑为主动编辑，加强年鉴编纂规范化（标准化）建设。

（作者：浙江临安市地方志办公室研究员）

民群众服务。序言中要阐述编修志书的指导思想、原则、方法和要求，反映修志目的和作用，使读者通过序言分析比较出不同时期志书的特色和作用。

2. 介绍当地旧志编修的情况并评价其内容。主要就是通过对历史上当地有代表性旧志的介绍，使读者对当地的历史文化有一个简要了解，同时也与本部志书相呼应。

3. 简要介绍志书的主要内容和史料价值。主要有两种形式：①按照志书的篇章结构介绍，使读者能大致了解全志的框架结构。②内容提要式介绍，基本上使读者知道志书内容梗概。

4. 概要介绍当地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对这方面内容的介绍，要高度概括、言简意赅，主要内容包括：建置沿革、地理位置、交通、通讯、矿产资源、特色产业、名优土特产品、文物古迹、风景名胜、旅游资源、人文资源等。

以上是志书序言的主要内容，但不一定都是必写的内容，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的内容和特点，灵活增加一些必要的内容或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内容。但都应针对志书的目的、作用和内容而写，真正使序言具有介绍志书、帮助读者理解正文、引导读者阅读内容的功能。

当前二轮志书序言存在的共性问题主要有：一是部分志稿的序言偏离主题。二轮志书的序言一般由当地党政领导作序，但部分志稿的序言，或是写成了记述时段内当地党委政府领导的工作报告，或是写成了记述志书编修历程的编后记，偏离了志书序言应表达的主题。二是部分志稿的序言写成了单纯的宣传材料或纯学术性的学术论文，与志书或当地实际结合的不紧。三是部分志稿的序言所占的高度不高，概括能力不强，文采不是很好。

二、关于凡例

所谓“凡例”，就是发凡起例，是志书的总纂者对设志立目、资料取舍、记述方法、书写要求等编纂体例作出统一说明的条例。凡例对志书编纂起着纲领性规范作用，主要功能是使编纂人员取材有依据、编

排有准则、行文有规范，以保证志书质量，使读者知全书之大要，得阅读之要领。

凡例的制订一般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通例”，即全志的纲领和各个分志编写必须遵守的条例，如指导思想、断限、体裁、结构、纵横关系、图表处理及其他全书必须整体划一的重要问题。

第二部分是“分例”，即分门别类地说明各种体裁和各个分志的设立依据，辑录重点，记述方法等编纂体例问题，以统一认识，统一规范。

第三部分是“特例”，即处理一些特殊问题的原则和方法。三个部分一般依次排列，可以不标例名，只标序号。

综合其内容，大体有十二项：

1. 阐明指导思想和修志目的；
2. 交代记述的地域范围；
3. 标明时间断限；
4. 概述各种体裁，揭示全志结构；
5. 确定大事记的记述原则；
6. 交代各专志横分纵述的原则和特点；
7. 说明人物立传列表的原则和排列方法；
8. 选用图、表的原则要求；
9. 设置特辑、附录的说明；
10. 对语言文字、标点符号、数字用法与行文的要求；
11. 版本、印刷等方面的规定；
12. 对一些特殊问题的说明。

凡例的制订和修改，要贯穿到志书编写的全过程中，使凡例既是“编纂法规”又是读者“阅读指南”。

当前二轮志书凡例存在的共性问题主要有：一是收录的内容不完整。部分志稿的凡例仅四五条，部分志稿的凡例甚至连基本的断限、体例结构等都未交待清楚。二是通例多特例少，模式化倾向较明显。这种情况在我省已出版的大部分市县志中都存在。制订凡例，应抓住重点，突出特色，有所创新，凡历代相因、且至今没有疑义的传统体例，一般情况下点到即

可。凡全国的统一规定，各地约定俗成的基本原则，可以尽量简化叙述。但对于编者认识有分歧，读者理解有异义的取材原则和编纂方法以及志书需要突出的重点和特色等内容，则需要重点说明。三是部分条目标述不准确。如《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标点符号用法》使用的均不是国家最新颁布的标准。此外，部分志稿的凡例中还存在凡例与内文互相矛盾、不合志体或违反有关规定、语言表述不精练、不准确等问题。

三、关于概述

述，作为志书的一种重要体裁（述、记、志、传、图、表、录），通常有两种，冠于全志之首者，一般称为概述，冠于编、章、节之首者，一般称为无题序。因为无题序一般内容短小，且可由可无，这里只对概述的撰写作一探讨。

（一）概述的作用

述为全志或篇、章之纲，宜用极简洁的语言，对一地、一业的历史与现状、规律、特点及其优劣之势作概括记述。方志界对概述的内容、形式乃至章法，进行过广泛的讨论。其中对概述在新编志书中所起的作用，提出了许多不同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

1. 统摄全志。按体例要求，志重横剖，横排竖写，以时纵述各事、各业兴衰起伏情况。而分类横排后的篇、章、节、目，在同一个层次之间，均系并列关系，各自成为互无关系的独立个体，如同各个不相连的、七巧板式的、平面相交的一个个画面，难以构成有机的、相互作用的立体结构。换言之，因各个独立的个体，各守其界，无法反映一地、一业发展变化的全貌。有了概述，就可站在全地区（或一县、一市、一省）的高度，取各业之精华，用简洁的语言，述其大要，从整体上展示其兴衰起伏。

2. 沟通各业。志书要按“事以类从，类为一志”原则，设置若干编（分志或专志），分别记述各业的历史与现状，往往以邻为壑，不可能充分反映各业间的联系，使读者很难得要领。有了概述，就可弥补“偏于横剖”之不足，达到沟通各业间内在联系之效果。

3. 彰明因果，揭示规律。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处于矛盾运动之中。方志所记之事也概莫能外。志内所记各业之事，既受同行业内诸多因素发展变化的影响，更要受到外部条件的制约。以工业为例，它的发展速度，与当时的政治形势、能源、交通、原材料供应等外部条件息息相关。如果我们视这些情况而不顾，就事论事地记述工业的发展变化，就很难说明该业成败得失。这正是造成旧志因果不彰的关键所在。旧志篇目及其内容各居一隅，有静无动，无相互作用和制约，以致言果无因，故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不彰。如果有了能统摄全局的概述，就可以把志书内相对独立而又相互作用的各个部分，组成一个有机整体，把相互联系的发展运动、趋势及其规律展示出来，则各业发展变化之因果自彰。

4. 为读者短时间了解志书提供方便。举凡各地志书，少则几十万字，多则百万、数百万，如无概述引导，人们要想知晓全书内容，势必尽读全文，这对读者来说，既费时，更不易在短时间内了解本地、本业的大势大略、特点及其发展规律。有了概述，读者就可用极少的时间，知其全书之梗概，获取本地、本业之优势。

（二）概述的内容

志书的述，不同于志的主体部分，它是叙议结合的策论之作。因此，它所遴选的内容与志书其他部分相比有自己的特殊要求，一般应具备以下四方面内容：

1. 总叙全貌。任何一部志书的述，都应该有本地、本业现实状况的全面陈述。当然，我们讲的全面情况，不是全书各部分内容的浓缩，或各部分内容的简单拼凑，而是要立足全地区、全行业，选择宏观或直观资料。那种写地理必言经纬度，谈气候则气温、雨量、日照天数等，叙经济又按工业、农业、财政、金融、商业等项目，分列一大堆与正文重复的数字，甚至何时办了什么厂，也写进了概述，如此等等遴选资料的方法不足取。

2. 纵述史迹。作为一部志书的述，除反映全貌情况外，还必须有本地、本业史迹陈述，帮助读者了解

其历史发展脉络。在选择史迹材料时,撰写人员应重视对本地或本业发展规律及其主、客观条件的研究,善于把各种平列、各自孤立的、分散的资料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分析,然后从整体上动态地、有重点地记述兴衰起伏情况。这样的概述,既不是大事记式的提要,又不是历史发展情况的一般铺陈,或一地、一业的历史发展概况,其中包含对事物在运动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评述。

3. 反映特点。一篇好的述,是由一定深度的内容所决定的。这里讲的深度不在于理论如何精辟、深刻,而在于能真正揭示一地、一业的发展规律。由于各地、各业情况不同,历史背景不同,发展条件及规律不同,决定了各自的不同特点。在选择编写内容时,一定要对本地、本业的发展历史和现状,进行认真分析,反复比较,从纷繁的事件中找出特点。举凡在全省、全国占有位置的突出事件,有重大影响的新旧人物,本地、本业的优劣、长短之势,以及影响本地、本业发展的经验教训等,均可列入述之中,浓墨重写。这样才能从宏观上突出地方特色和行业特色,使其真正成为最有实用价值的鉴戒和决策之参考。

4. 抓住典型。选好典型的人和事,这是写好述的关键。作为市志、县志,乃至专业志。要涉及到本地或本业各方面情况,而这些情况在志的有关部分又均有详细记述。据此,作为起统帅作用的概述,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重复“志”的内容。这就要求作者应站在比“志”更高的角度,从“志”的有关部分精选本地、本业发展关系密切的重大典型事件,使其与志内各章、节或条目组成经纬交织的立体结构。

(三) 概述的写法

概述撰写应该内容精确凝炼,文字清晰简要。其写法主要有以下三种:

1. 分期叙述法,即将一个地方按发展过程分为几个阶段,一段一段地叙述。如我们去年复审、终审过的《卫生志》,就是以五年计划为期,一段一段叙述。当然,由于概况总结不够、特点反映不足,导致志稿概述虽然写作的思路是对的,但却不是很成功,

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

2. 提炼概括法,将全志内容提炼概括分项叙述。

3. 特点串连法,将本地、本行业比较大的优势或特点找出来,连续概括予以叙述,使读者能有深刻印象。

此外,述的撰写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 要分清概述与概况的不同。从目前已经出版的二轮市县志的概述看,能称为精品的不太多,部分志稿将“概述”写成了“概况”,或概况的变体形式。例如有的概述,采用了分类陈述的写作形式,按自然环境、建置沿革、行政区划、人口、工农业、文教卫生、著名人物,乃至名优特产、风景名胜等门类分别叙述,这同许多省、市出版的《市县概况》、《省情》、《市情》、《概览》等书的体例模式别无二样。有的虽没有明确标出门类标题,但从内容到形式,仍为一地、一业各方面的陈述。因此,要写好概述,就必须区别与概况的不同之处。两者虽有一致的地方,如都以反映一地的宏观或一业的中观情况为主,但它们之间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从总的方面看,概况属二次性文献,而概述则为三次性文献。具体区别有四:一是内容上,概况侧重于反映现状,凡与一地、一业有关情况 & 基本数据必须具备,表现一个时点的横截面;概述则重于反映兴衰起伏的变化过程,对资料数据有较大的选择性,表现时间区间(上下限之间)的空间概念。二是在表述形式上,概况以横向静态反映为主;概述以纵向动态反映为主。三是在写作方法上,概况多采用“述而不作,叙而不议”的记述体,概述则用夹叙夹议,叙议结合的论述体。四是在结构上,概况一般按门类编写成自然段落,要求一气呵成。

2. 要论之有据。概述是以“首以通论见长”和策论之作。在写法上,不受“述而不作”,“寓理于记述之中”的限制,应站在较高的层次上,俯瞰全局,溯古瞻今,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叙事是为了说明理论,促进理论的升华,不是仅从宏观角度看内容的篇章,而是检取志内各部分的精华、要素和特点;论述又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并以事实为依据,进行横

剖纵析、提炼，以求向战略决策靠拢，而不是抽象的议论、说教，更不是无根据地妄论。尽管在写作时可采用先叙后议、以叙带议、叙议结合等不同方法，但都应以叙事为主，不可叙议并重，更不可以议代叙。要多用判断性语言，运用“画龙点睛”之功力，使叙事升华。

3. 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志书是求实之书，信史之作，因此实事求是地编写志稿，这是修志工作者应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从我们看到的部分新志“概述”，之所以令人满意者不多，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对本地、本业的优势和成就反映得比较充分，而存在的弱点、劣势和不足之处却极少涉及。有的虽也提到了不足，但也是点而不明，未作具体剖析，有的似是而非，使人难以捉摸。如前所述，志书的主体部分，因受横排门类的限制，只能在记事中体现经验教训，反映客观规律，难以承担论证长短优劣之势，以示人们扬长避短，开发优势，克服劣势之重任。那么作为“求训致用的救弊之作，彰往昭来的存史之章”的“概述”就应承担起这个历史责任。真正做到成就和优势说透，问题和劣势说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概述质量，以成一代佳作。

4. 篇幅要适度。概述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要有高度的概括性。因此，在构思的时候，从内容选择到结构安排，就应考虑到篇幅的限制。有些概述，虽洋洋万字，不但达不到催人奋进之效，反有倒胃口之感。可是有些概述尽管篇幅不长，却颇有生色。志书的概述一般可控制在3000~8000字，不要超过万字。当然，评价一篇概述的好坏，也不能单纯地用篇幅的长短来衡量，一切应从本地、本业实际出发，做到既不冗繁累赘，又不失之偏颇。如何达到这个要求？一是在内容上要抓住志书能起作用的主要问题，做到抓大不抓小，抓主不抓次，切实防止面面俱到，或与各章、节部分的简单重复；二是在写法上要用概括类系的方式，既不搞全书内容的“浓缩”，也不搞“拼盘”；三是在写作上要字斟句酌，精心锤炼，做到言简意赅，文辞朴实，不搞浮文虚美雕饰。

5. 要掌握写作时机。概述何时落笔，是志内各篇、章成稿之前，还是成稿之后，这是影响其写作质量的关键。一篇高质量的概述，不是作者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作者掌握丰富的资料，并进行认真分析、概括提炼的结果。方志前辈董一博曾提出：概述的撰写，一般要在志书完稿之后才着手。“只有把全志写完，并统观全志囊括一切问题之后，断其是非，衡其利弊，再以雄才之胆略，展其识见之雄笔。”因此，概述必须在各篇、章志稿完成之后，方可筹划研究落笔。那种落笔时机选择不当，或先写概述，后编志稿，或概述与志稿编写同步进行的做法均不足取。

概述与各编、章之间，不是重梁架屋，而是择各部分之要而自铸新词。这只有在志稿完成的基础上，吸取各篇之长，剪裁各章之短，权衡兴衰利弊，剖析优劣得失，方可达此目的。也许有同志认为，自己深知本地或本业情况，写一篇概述还不容易，何必讲究写作时机？其实不然，如上所述，概述既不同于各编、章志稿，也不同于概况，它不仅要求主编（主笔）有较高的写作技巧，而且要熟悉史料，消化史料，更要善于网罗全书之精华，综要横断一地或一业大势大要，举要述事，钩玄妙理，才能写出既有高度又有深度的志书概述。

当前二轮志书序言存在的共性问题主要有：一是内容不合体例要求。二是内容不全面。三是缺乏高度、深度；缺乏必要内容，无特点；不见全貌。四是结构混乱，层次不清五是与篇章相关内容有矛盾。

四、关于大事记

大事记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纵向记述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自然等方面的重要事件，按时间顺序勾勒出一个地区历史发展的轮廓和事物发展的线索，描划出一个地区的概貌。志书的总体特征是以类系事，以横剖为主，而大事记正好弥补了全志缺乏纵贯的不足，从而使志书成为一个既有纵观又有横观，经纬交织的整体。

（一）大事记的体例形式

大体有以下三种形式：

1. 编年体。即以时系事，以事设系，一事一条的记述方法。编年体完全按照事件发生的绝对时间、逐年、逐月、逐日记载，即在前面系以月、日，然后把事件、人物、地点简明扼要地予以记述。

2. 纪事本末体。本，即事物的源。末，即事物的末尾。就是把一件事情从头到尾的写清楚，记述全过程。如对某些时间跨度较长的重大事件的记载，用编年体写很难把它写得完整，也很难写出整个事件的全貌，纪事本末体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再如编年体的大事记，很少去写某件大事的背景材料，及与其他因素的因果联系。它只能比较直接的写清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结果。纪事本末就能克服以上的毛病。讲事情的起因、过程、结果交待清楚。

3. 编年和纪事本末相结合体。即以编年体为主，以纪事本末体为辅的记述方法。对某些事件，它不是按发生的时间分别记入大事记的适当位置，而是集中于一处完整地记其始末。它在大事记的位置，可按事件的开始时间记，也可按事件结束的时间排。举一个例子，如对一些重点工程的记述，何年开工，投资多少、哪年竣工，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类问题。

编年体是编写大事记的基本形式，其特点是叙述事件发生的次序分明，在时间上给人以清晰、完整的地方历史概念。但编年体因其完全按事件发生的绝对时间来记述，存在同一件事首尾不能连贯等问题。而纪事本末体，就某种意义来说是弥补了编年体之不足，但却又冲淡了时间的概念，影响对一定时期内总的情况的观察与分析。“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则集中了前两种体例的优点，有利于记清楚一地大事。首轮志书基本采用此法，特别是对一些首尾相距较近的事件，需简要交待其影响和后果的事情，如会议研讨、人员任免、工程开竣工等，都将其汇于一条之内记其始末。而对于一些过程复杂、跨年跨月时间长的事件，有时不得不采取分阶段确定时序，按阶段加以记述的办法。如跨年大的运动，应分阶段记述，把事件顺序和事物状态很好地结合起来。

(二) 大事记内容的编选

一般来说，大事是指本地发生的、对当地（乃至对外地区甚至全国）的国计民生和社会历史的发展有重大意义、有较大影响和具有历史价值的事件。

对市、县二轮修志而言，大事记收录的应是市、县政府及各部门、行业在发展过程中有关事业、行业的重大事件，并力求做到“大事不漏，要事不丢，新事不放，小事不录”。

所谓大事，就事物的社会影响范围来说，要在当时影响较大，事后影响较久，具有一定持续性的事。包括下列若干方面，诸如机构设置类，如重要社会团体、事业机构的建立，行政区划及隶属关系变化；重要会议的召开，重要规章制度的颁发，重大事件的发生，主要活动的开展；重点建设工程、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企业的开工投产，重大项目的实施；重大发明创造和科研成果，对当地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活动及变动；主要行业、物产的盛衰变化，重大生态环境变化，重、特大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的发生；文物珍品的发掘和名胜古迹的兴废，经济、文化、教育建设成就等。

所谓要事，指虽不具备全局性和持续性，但有一定的重要性，如不记录将感到若有所失的事。如重要领导人到访、活动，当地重要报刊、图书的出刊、出版等。

所谓新事，就是本地开创性的事物。即某项事物的第一次出现。如广播电视电话网络第一次在当地出现等等。记入此种新事物、新现象，有利于读者全面了解一地某项事业的起点及发展。

所谓特事，指当地独有发生、为外地所罕见的事件，比如某些地方病的出现与消灭等。

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2010年出版的《当代志书编纂教程》对大事记收录标准列出了具体23项标准，分别是：

- 1) 建置和政区的重大变动。
- 2) 主要组织机构的建立或撤并。
- 3) 重要会议的召开。
- 4) 重要制度、方针、政策、法令的颁布和贯彻

落实。

- 5) 重要人事上的更迭。
- 6) 新鲜事物、新生事物的涌现。
- 7) 著名人物在境内的活动、著作或科技成果。
- 8) 先进模范人物及突出事迹。
- 9) 重大技术革新或技术改造。
- 10) 重大科技成果获创造发明。
- 11) 重要工程项目的兴建及建成投入使用。
- 12) 农林牧副渔业获得的巨大丰收。
- 13) 省、部级以上领导人视察检查工作。
- 14) 重要外事活动或涉外事件
- 15) 人口、民族的重大变化、迁徙等。
- 16) 严重的自然或人为灾害的发生抗灾情况。
- 17) 重大案件的发生侦破情况。
- 18) 重大事故发生机其善后处理情况。
- 19) 历史古迹、古物的发现、保护、破坏等。
- 20) 重大体育运动比赛举行及夺标活动。
- 21) 奇异的自然现象或奇人奇事。
- 22) 地方志书及其他重要著述的编纂、评审及出版发行情况。
- 23) 全国性或发生于紧邻地域但对本地带来直接影响的重大事件。

以上23条标准仅是大事记收录的一个普遍标准，也是一个基本原则或标尺，在我们编写或审读志稿时，都可作为一个参考。

同时，在选取大事时，还应注意以下四个问题：

1. 关于例行事件的记载。如征兵、高考、全国性的节假日、部门会、行业会等等，几乎每年都有，应选取哪一些收入大事记呢？可参考三条原则：一是记最早的；二是记有新内容的；三是记举办了重大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的。

2. 关于奇异自然现象和自然灾害的记载。有的志书的大事记，几乎将本地发生的所有奇异自然现象和自然灾害都收录在内，造成怪事和灾害记载过多，又与分志中的有关部分重复。正确的做法是：只记影响重大或有重要科研价值的奇异自然现象和重大灾害，

或是有重大意义的抗灾活动等；其他自然灾害及不明飞行物、特异功能、星雨、陨石、奇热、奇冷等，记入有关专业分志中。

3. 统一大事的收入标准。选取大事时，同类的事，什么样的事可以收入，必须执行同一标准。选取大事前必须拟订凡例，规定具体标准，并且要对大事记初稿进行反复审查。

4. 对那些对本地区具有负面影响，但因为传媒的广泛关注，导致其具有全国性影响，并已有明确处理结果的事件，在二轮修志中也应实事求是地记入本地志书的大事记。但对一些对党和国家有负面影响、影响民族团结统一、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都不能收录。

(三) 撰写大事记应坚持的几条原则

1. 大事记条目应该用简明扼要的提纲式写法，严守“记其纲要，不述过程”的编写原则，说明何时何地什么事即可，在事件要素（背景、时间、地点、人物、活动、结果）齐全的前提下，文字力求简朴、准确、通俗、易懂，不用空泛的修饰语，把要素交代清楚即可。尽量不详写前因后果和发展过程。所记时间、地点、事件一定要核实无误。对人对事一般不作评论，不加注释。有的事件或人物过去的记载不明确，动笔前要作认真的考证，大事记只记考证的正确结果，不记考证过程。要认真处理好大事记与志书其他篇章内容的重复与交叉，注意各自从不同角度撰写。

2. 撰写大事记，要坚持一事一条的写法，不能数事混杂在一个条中。如我们在过去的评审中就发现，有些评审稿在大事记的编写中，就存在同一天的事情集中在一起记述的现象。

3. 对政治活动的记述。因为政治活动涉及面广，牵涉人物多，不好掌握记述范围的问题，要按照“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进行记述。一是详事略人，只记基本事实，不记人物活动；二是只记其大略，不详其过程；三是妥善处理正面事件与反面事件的关系；四是对有争议的问题暂时存疑或提纲挈领地予以点述。

4. 关于人物活动的记述。大事记对重要人物在本地区进行的重要活动，包括参观、访问、视察、调查

早期秦文化源流研究略述

崔珍康 袁兴荣

一

翻检史籍，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共生互补的发展进程中，秦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秦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等，最终创立了延续至今、影响深远的制度和他文化……

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秦的祖先，最初居住在“西犬丘”，因牧马有功，且在与西戎的长期战争中，不怕牺牲，最终胜利，被西周王朝封地授侯，得以建立秦国。秦襄公是建立秦国的开国国君，他和之后的几代国君，最终都葬在秦国的发祥地西垂。因此确定，秦祖先最初居住的“西犬丘”的准确位置，破解千古之谜，显得尤为重要。

对秦文化的研究从汉代就开始了，但由于秦的文献资料甚少，对其研究的深度受到一定的影响。

1919年，甘肃省礼县红河乡出土了一件后来被称作“秦公簋”的青铜器。这件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国宝上有铭文105字。这件簋几经周折传至北京，著名学者王国维、郭沫若等人考证后撰文认定，该簋是“秦公簋”，是肇事文明最重要的实物证据之一。王国维先生参照《水经·漾水注》的说法，认为秦的

早起都邑西垂，就是“汉陇西郡西县”。西县，是汉代的县治，就是今天的甘肃省礼县。当然，学者亦有不同的看法。

二

礼县地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人类早期的文明活动，在这里留下了清晰的痕迹。早在7000年前，这里诞生了灿烂的仰韶文化；4000年前，寺洼文化和仰韶文化在这里交融，高寺头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红陶少女头像，是《中国美术史》选用的经典。

在大堡子山的山脚，嘉陵江的支流西汉水缓缓流过。西汉水的源头，在今天的甘肃礼县北部和天水市秦州区南部接壤处的黄土丘陵中。这里属黄土高原深处，沟壑纵横，梁茆起伏。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堡子山遗址地表一直为农田。由于主要遗迹分布在山坡之上，加之埋藏较深，过去并不知道该地点为一处重要古代遗址。

1992年的一天，在礼县大堡子山一拨挖龙骨的农民，意外的挖到了一座古墓，而且挖出来的沾满铁锈的青铜器。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引来了大批嗅觉灵敏的盗墓贼，同时也让海外市场上的文物贩子兴奋不已……

研究等，都尽量减少以个人活动为主的记述，如对政治领导人活动的记述，一般市县级志书应只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本省主要领导在本地的活动予以记载；对其他各级领导在本地的活动，可以在志稿的其他部分用以事系人的方式加以记述，一般不要在大事记中单列条目。

5. 关于例事、例会的记述。从一地、一县、一个单位来看，例事、例会是很多的，特别是定期召开的

各种代表会议和不定期召开的各种工作会议以及所发布的文告等等，如果一一都记入大事记，则录不胜数，会造成大事记内容的臃肿拖沓，反而使更重要的史实被这些一般性事务所淹没。因此，大事记一般只记市县召开的大型会议和市（县）部门、行业召开的首届会议及有较重大影响的会议情况。

（作者：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市县志指导处副处长）

疯狂盗墓导致的严重后果，使盗墓者为了挣钱不择手段，盗墓之风很快蔓延到西汉水100余公里及其主要支流，把礼县的古墓推向了毁灭性的灾难之中。

大堡子山遗址文物重见天日即惨遭浩劫，令国人扼腕痛心。

经过国家文物局、甘肃省人民政府和各级职能部门的联合打击，猖獗一时的盗墓活动得到了遏制。

1996年，大堡子山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堡子山遗址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两次调查和发掘。

文物是一个时代留给后人的最直接的见证。每一件文物的细节中，都隐藏着那个时代的秘密，更是人们了解遥远历史的窗口。

1994年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甘肃省文物考古所对这一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此次发掘在遗址中部勘探了21万平方米，发掘大型墓葬2座、车马坑1座、中小型墓葬9座。共计出土各类随葬品2000余件，其余各类玉、石器300余件，金饰片3件。铜容器残片可辨别的器形有鼎、簋和盘等。车马坑内从残存迹象看，原有东西排列的车辆4排，每排3乘，共计12乘，但发掘时仅见铜矛一件和少量铜泡、盖弓帽及残片。9座中小型墓葬随葬品有铜器、陶器、玉

器、石器等。

200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等五家单位组成的“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启动早期秦文化考古研究项目，对礼县西汉水流域进行文物普查。经过连续10年的田野考古调查、钻探与发掘，不仅发现了西山坪——石沟坪、大堡子山——圆顶山、六八图——费家庄3个早期秦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和西山、山坪和大堡子山3座城址，还在大堡子山遗址发现夯土城墙4段、夯土建筑基址26处、中小型墓葬730余座、祭祀坑1座以及其他遗迹和较丰富的文化层堆积等，基本厘清了大堡子山遗址的布局 and 结构。对秦族、秦文化的来源，早期秦文化的面貌，秦人在甘肃东部及东南部的活动轨迹，秦与西戎的关系等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取得一系列突破性的学术成果。其中，2006年大堡子山遗址及张家川马家塬战国西戎贵族墓地的发掘，双双被评为当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三

1974年，秦始皇兵马俑在陕西出土，这座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地下军团”，一面世就轰动了世界。到1987年，秦人四大陵园中的第二、第三、第四陵园即雍城陵园、芷阳陵园和临潼秦始皇陵园，都在陕西省先后发现，唯有秦人的第一陵园，却一直难觅踪影。

“大堡子山遗址发现，意味着秦朝虽然定都陕西咸阳，但甘肃礼县才是秦文化的真正发祥地。”甘肃省博物馆历史考古部主任祝中熹说，中国考古界已就此形成共识。

至今，两大谜团终于大白于世。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称“这一发现填补了先秦文化的研究空白”。



礼县大堡子山

(图片提供：孔令奇)

此次发现的秦始皇祖墓共有中字形大墓四座，瓦刀形车马坑三座。此外，附近山上还有规律地分布着200余座中小型墓葬。陵园中已发掘出300多件惊世文物，包括大量的青铜器和金、玉器，其中一组9件套的秦编钟，是中国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套9件一体的秦青铜编钟。

这个名为秦西垂陵园的秦始皇祖陵，已被历史尘封约2700多年，是1993年被意外发现的。通过对秦公、秦子铭文铜器的研究，并结合大堡子山城址的年代判定和文献梳理，遗址两座大墓墓主应为文公和静公。

秦文公乃秦襄公之子，他即位后仍居住在西垂宫。公元前763年，秦文公开始东征，讨伐西戎，经过10多年的征战，收复周王室旧有的土地和人民，疆域扩大到岐山，实力越来越大。在位50年，发展成为西方的大国，在秦国东进的过程中，西犬丘之地一直是秦人稳固的后方基地。公元前716年秦文公死后，也归葬于西山。

由于秦人四大陵园中三座都在陕西被发现，此次秦始皇第一祖陵却在甘肃被发现，因而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礼县大堡子山遗址的发现，掀起了甘肃及周边地区早期秦文化研究的热潮。

从1982到1983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和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甘肃省甘谷县盘安镇毛家坪发掘出了属于西周到春秋时期的秦文化遗存，对于研究秦的早期文化具有指标性意义。赵化成先生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寻找秦文化渊源的新线索》一文，在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此后，甘肃天水附近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又陆续发现了一些早期秦文化的遗迹。2006年在大堡子山上又有了极为重要的发现，在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附近，又发现了大型的秦公编钟和大型建筑遗址，更加证明这里应是西犬丘的政治中心都邑所在。

近些年，由于秦早期考古数据的不断涌现，大大带动了早期秦文化的研究。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如：其中有两本就是以早期秦文化命名的，徐日辉先生的《秦早期发展史》（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3年），该书解决了秦早期历史研究中的诸多悬疑。祝中熹先生

的《早期秦史》（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该书是一部历数自嬴秦族西迁到都雍以前，即春秋中期以前的那段嬴秦历史的著作。这两本书的先后出版，充分说明早期秦文化的研究已经得到学者们的重视，并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礼县人民政府组织人力编辑出版的《秦西垂陵区》和《秦西垂文化论集》两本书，其中一本是图录，图文并茂；另一本是将过去人们研究西垂文化的文章收集起来，是对早期秦文化研究的贡献。

《早期秦文化研究》，是由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与天水师范学院联合召开的“早期秦文化研究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共收录了25篇论文，涉及早期秦文化研究的方方面面。

陈平先生的《关陇文化与嬴秦文明——早期中国文明》一书，以陕西、甘肃（即所谓关、陇）地区为主，旁及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比较系统、全面地叙述了嬴秦文明即秦文化自古史传说时期的今山东地区、经夏、商、周、春秋、战国至秦代，叙述了有关秦文化诸考古发现的分布、类型、分期、演化和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及各种不同意见。

对于秦人来源的研究，二十世纪形成了嬴秦由东方到西方，再由西方发展壮大的“东来说”和嬴秦产生于西方而发展壮大的“西来说”以及“北来说”。但秦人源于东方的观点即秦人族源“根”植于东而“枝”繁于西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支持和认同。关于秦早期都邑的研究。这是早期秦文化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王国维先生最早提出秦有九个都城，即西垂、犬丘、秦、汧渭之会、平阳、雍、泾阳、栎阳、咸阳。西犬丘和西垂究竟为一地还是两地，过去争论较大，随着大堡子山秦公墓地的发现，这一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大部分学者认为是一地两名。

关于大堡子山墓葬墓主的归属。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人祖先发祥地于甘肃东南部，即今甘肃陇南、天水一带。20世纪20年代，在甘肃礼县盐关一罗家堡一带发现了著名的青铜器“秦公簋”。无论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都证明襄公和文公都葬于西山陵区，即大堡子山地区，这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关

于早期秦文化的物质水平。以前人们大多认为，秦早期文化物质水平是低下和落后的，以至于被东方各国“夷狄遇之”，从司马迁开始便有了这个认识，影响深远。但从近些年的考古发现来看，“秦早期文化中的物质文明一点不比同时代的中原落后，有些甚至要先进一些”（《秦早期发展史》）。祝中熹先生也认为：“史学界曾长期流行一种‘秦国落后论’，对嬴秦早期文化遗存作认真剖析，可以端正我们的认识，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秦文化的高度，从而走出秦文化落后的误区”。

2009年12月和2011年11月，随着两部上、下集人文纪录片《甘肃古事：千古遗恨秦公大墓》《寻秦》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的播出，再次将早期秦文化研究热潮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作为早期秦文化发祥地的礼县及陇南市，享有天时地利之便，对早期秦文化的研究、对秦人更深入的历史追溯不遗余力，苦苦探索。

2010年4月，陇南秦文化研究会成立暨市直会员大会在陇南市召开。会议通过了《陇南秦文化研究会章程》《陇南秦文化研究方案》和《陇南秦文化之民俗文化调查提纲》，决定了会徽，选举了会长、副会长。陇南秦文化研究会的成立，标志陇南市对陇南秦文化的研究进入深层次的有组织的研究和探讨阶段。

为了更好地保护、利用独具特色的礼县秦早期文物，促进秦文化的系统研究和全面发展，使秦文化走向世界，促进地方旅游业的发展，在征求国内文物部门和有关专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礼县从2007年起动工修建了甘肃秦文化博物馆。

甘肃秦文化博物馆坐落于礼县城关镇东新南路开发区秦人广场，总占地面积约43864.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0533平方米。其中博物馆主体建筑面积8350平方米，建筑特色体现了古朴、雄浑的先秦建筑风格。2011年博物馆建成并开馆。

甘肃秦文化博物馆是集陈列展示、文物收藏、学术研究为一体的大型博物馆，现存馆藏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文物3096件，涉及其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秦人的文物约1000余件，其中等级以上文物400余件，国家一级文物72件。该馆的镇馆之宝——国家一级文

物“无轶四轮方輿车型器”，就是出土于大堡子山对面永兴镇赵坪村圆顶山春秋时期秦人贵族墓葬区内。独具特色的建筑、先进的内部功能设施，全方位地展示陇南、甘肃省的先秦文化，成为国内一流的秦早期文化考古科研基地。2011年，该馆被甘肃省委宣传部命名为甘肃省第五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12年9月12日，甘肃秦文化研究会在甘肃省陇南市礼县成立。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大、四川秦文化研究会、陇南师专等国内考古和高校的专家、学者共150多人参会。研究会将组织全国热爱秦文化和从事先秦、秦汉历史研究与考古的专家学者共同对甘肃秦文化，特别是礼县西汉水流域的先秦文化进行挖掘、归纳和整理，不断充实甘肃秦文化的学术与应用价值。

《史记·秦本纪》开篇云：“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为嬴姓第一位男性祖先。女修以“织”而闻名于后世，是秦人的始祖，她就是织女的原型。这就为西和、礼县一带延续千年隆重的乞巧风俗寻找到了历史依据，由此，2006年，七夕节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次年，西和县被中国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乞巧文化之乡”。

由雍际春、田佐、南玄子主编的《嬴秦西垂文化》——甘肃秦文化研究会首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于2013年12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甘肃省博物馆研究员、早秦史研究专家祝中熹为该书作序。《嬴秦西垂文化》出版发行，不仅是第一次秦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具体成果，同时对秦史、秦文化的进一步发掘和研究具有深远意义，也在礼县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2014年9月25日，中国陇南（礼县）苹果产销对接会暨甘肃秦文化研究会第二次学术研讨会在甘肃省陇南市礼县秦人广场召开，甘肃省副省长郝远宣布会议开幕。

甘肃秦文化研究会的成立，对促进甘肃秦文化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学术界出于秦史研究的需

要，地方政府出于改革开放后，对旅游产业的开发，都在积极借助秦都西垂或西犬丘的所在地和秦先公陵园都在大堡子山西汉水流域的契机，推动早期秦文化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将学术研究（考古、文献）与普及讲座两线并行，相互补充。在考古、文献和民俗文化研究方面，提交了近80篇很有见地的论文，汇编成《秦文化谈研》专著；编写了一套10卷本的连环画，第一本《走向大秦帝国》正式出版发行；广泛发掘培养地方文化人才，对全县广大乡镇进行早期秦文化巡回培训，参与人数达3000多人。2015年在研究会的组织下，开展了从礼县出发，沿着秦人东迁路线进行了综合考察。倡议提出建立早期秦文化研究圈，资源共享，相互联动。同时，研究会还对礼县境内的盐官镇盐井祠、西汉水流域民俗民情、风貌特征、古迹遗存等进行了细致考察，积极探寻把早期秦文化优质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的新路径。

2015年9月中旬，兰州交通大学文学院、西北师范大学等高校邀请甘肃礼县政协主席王作斌，为师生进行了题为《秦人在甘肃礼县建国》的学术讲座，对秦公西垂陵区的发现是秦人在礼县建国的最有力证据；秦人在甘肃礼县建国的艰辛经历及秦人的精神遗产等方面进行了深度探讨，在省城高校引起强烈反响；同年11月，《陇南日报》对其讲稿分期连载，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20多年前礼县大堡子山遗址疯狂的盗墓活动中，一些目不识丁的中老年农民，在盗墓过程中很快掌握了基本的文物知识，他们对文物的识别、断代、辩为能力和职业文物工作者毫不逊色的农民，如今已成为垂垂老者。当时，能拿起铲刀的小孩都上山了，那些八、九岁可以认识墓土的小孩，已进入而立之年。他们青少年时期的那些历练，老辈人的耳提面命，使他们成长为早起秦文化研究不可多得的地方人才，在实现



甘肃秦文化博物馆（图片提供：孔令奇）

脱贫致富奔小康文化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的新生力量。

一座千年古墓的意外发现，终于揭开了秦国早起历史的神秘面纱。

大堡子山遗址文物重见天日即惨遭浩劫，令国人扼腕痛心。如何让流失文物回归故土，从此成了国人心中的一个梦想。

四

2015年7月21晚，中央电视台直播《新闻1+1》，今日关注：“秦人”归来！

主持人：我们首先来看张图片，这张图片所展示的是32件，2700多年前，春秋时期秦人的精美的金箔饰片。这批文物是在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人早期墓葬遗址出土的。就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这个墓葬遗址遭到了疯狂的盗挖，这批精美的文物是流失海外。20多年过去了，这批文物终于回到了家里，今天上午甘肃省博物馆展出了这批文物……

先秦文化史学家祝中熹：我们流散的器物太精美了，太多了，现在已经散布到世界各地，伦敦、巴黎、纽约、日本。

这种金饰片在全世界，全中国，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发现过，只在大堡子山被盗秦公大墓出土过，因而它是具有唯一性的。

大家对于秦始皇兵马俑都家喻户晓，但是对秦国的早期历史可能知道的人并不多。据史书记载，在西周和春秋早期主要活动于，现在甘肃省的渭河上游和

西汉水流一带，但是由于史书记载很简单，只有通过考古和文物来证明。那么大堡子山春秋早期的秦国都城，秦公大墓以及出土文物，对于研究秦国的历史和文化具有大量的价值。

1994年的春天，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韩伟，第一次在法国的一家私人博物馆里，发现了出自甘肃省大堡子山的金箔饰片。但想要追回这些文物，并不容易。

从大堡子山被盗掘的秦公大墓流失的文物，现在据我们统计，至少有百多件，就是一些重要的文物，除了前面所说的金饰片，还有带秦公、秦史铭文的鼎、簋、壶，这些大型青铜礼器，还有中国等大型的青铜乐器，这些文物除了前面所说的法国金饰片之外，在美国、日本、当然还有香港、台湾一些私人收藏家或者博物馆里面都可以见到一些。当然国内后来，礼县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收藏了一部分，另外上海博物馆从香港也回购了一部分。美国华裔收藏家范季融夫妇，曾经将他收藏的几件大堡子山的被盗大墓的秦公鼎和秦公簋捐赠回国了。这次法国的金饰片，应该说官方性质，具有更示范的意义。这批文物因为它非常珍贵，所以我们也非常期盼着大堡子山其它流失的文物早日回归故里，对秦文化，秦国历史，

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都是非常重要，具有重大价值的文物。

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据史料记载：嬴秦源于东夷而兴于西垂。大量考古资料和学术研究成果证明：秦国第一座都邑“西垂宫”、第一个祭天祀祖之“西畴”、第一座秦公陵园和宗族墓葬群都在甘肃礼县境内……

秦人从襄公始国至始皇统一，历33代550余年，由弱渐强、由强渐盛，终成一统，其创业道路艰辛而辉煌。秦人发展和统一华夏民族的过程，实际上是华夏各民族大融合的过程，秦人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巨大，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铁血图强、创新进取、敬天尊祖、改革开放、公正司法、仁德教化、统一中国等等丰硕而又宝贵。西垂嬴秦文化是秦文化的“根脉”……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就是一座早期秦文化研究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宝库。徜徉其间，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恍入桃花源，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天荒地老，焉知今夕何夕，乐而忘返也！

（作者：①陇南市政府办公室主任、②陇南市直机关工委调研员）

《甘肃史志》征稿启事

《甘肃史志》是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办的全省史志类学术内部刊物，主要栏目有特载、工作论坛、文件选编、续志研究、篇目选登、史地考证、历史回眸、陇原人物、旧志整理、乡情民俗、志鉴动态、成果展示、史志随笔等。

投稿作者请提供真实姓名、署名单位全称、详细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

来稿注释请采用脚注，序号用阿拉伯数字加圆圈。参考文献条目编排在文尾，注明文献题目、刊名或出单位、编著者、起止页码等。

所有来稿请寄送纸质文本的同时以word格式发送电子邮件，邮箱：3498763120@qq.com。稿件一经采用，按国家有关规定支付稿酬。

投稿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51号省统办一号楼9楼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信息教育处

邮 编：730000

联系人：汪举红 孔令奇 李佳潞

联系电话：0931—7821931 78219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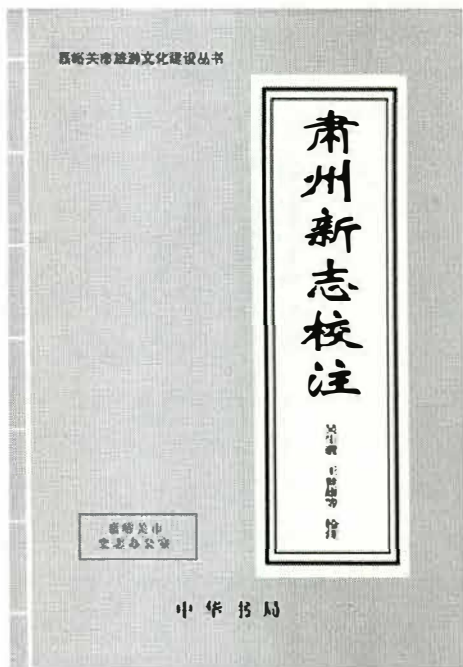
校注本《光绪肃州新志》的文献价值和校注成就

吴浩军

一、《光绪肃州新志》的纂修者和纂修年代

这部志书仅存抄本，“中多条注删窜”（张维《光绪肃州新志校读记》，民国抄本，酒泉市档案馆藏，第2页）；其中《职官》“本朝奉使委用大小诸臣宦迹”条下也有“以上系各处抄集，随到随记，无有伦次，履历、年分不能详悉。存此以俟后来续修考订”的说明；还有多处仅列有目、正文阙如的情况。如此，应是未定之稿。因是未定之稿，所以没有留下编撰时间和纂修者姓氏，但志中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寻。志中所载事迹最后为光绪五年。《人物》“郭维城”条说郭曾撰《肃州备采录》，可见此志在郭维城《肃州备采录》之后。而郭维城卒年正为光绪四年（1878）。据此可以推测，此志纂修当在光绪初年，是在《肃州备采录》的基础上完成的。或者正如民国时期敦煌吕钟原作有《敦煌外史》，后修志议起，众议难违，于是“独肩众撑，笔则笔，削则削，剪裁旧作，翻成新志”（吕钟《重修敦煌县志序》，《重修敦煌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撰成《重修敦煌县志》，《肃州新志》即是郭维城在《肃州备采录》的基础上着力纂修的一部新志。但该志“拔贡”后有按语：“拔贡一科，十二年一次。至辛酉科郭相焘之后，则同治癸酉，继则光绪十一年乙酉，再继则今二十三年之丁酉，仅三科耳。”（《肃州新志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75页）“丁酉”为光绪二十三年（1897），据此，民国时期西北著名方志目录学家张维推测“似为光绪二十三年所作”。而据《甘肃通志》，光绪二十三年肃州知州为江西吴人寿、湖南何衍庆二人，不知由谁主修。“然别目从无一字

及五年以后事，又若可疑”（张维《光绪肃州新志校读记》，民国抄本，酒泉市档案馆藏，第2页）。这样，这部志书的编纂者和编



（图片提供：孔令奇）

纂时间就成了一个悬案。但综上所述讨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这部志书的编纂是在郭维城《肃志备采录》的基础上完成的；（2）初稿完成于光绪五年，至光绪二十三年，又有人进行了增补，但仍未最后完成；（3）编纂者先为郭维城，其后至光绪二十三年，吴人寿、何衍庆两人先后任肃州知州，其中一人曾主持编修，拟完成此项工程，但开始不久即因故搁置，至今仅以抄本传世。

二、《光绪肃州新志》的文献价值

酒泉地区现存最早的体例完备定型的旧地方志是《肃镇华夷志》，大约纂修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7），清顺治十四年（1657）重刊。该志主要记载和保存明洪武五年（1372）进军河西以迄万历后期200多年来肃州及其周边地区的民族关系、长城兵防

及丝绸之路贸易等政治、经济、地理等方面的资料。

120年后，大清王朝刚刚平定了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之乱，开始着力经营嘉峪关以西的广大地区。这时，黄文炜、沈青崖驻节肃州，他们既是经营边疆事务的能臣干吏，又是学识渊博的史地名家和颇具审美情怀的诗人，深知兵戎之后广施教德化对于安定国家、巩固边防、达长治久安之效的意义，于是以极大的热情、干练的才具修学宫、兴书院、建义冢、办养济院，还疏浚泉湖、构筑亭台楼阁、吟诗作赋于其间，营造出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在抚慰了久被战乱惊扰的百姓之后，从容地开始了另一项浩大的工程，终于在乾隆二年（1737）修成《重修肃州新志》（为与光绪年间《肃州新志》相区别，笔者文中通称前者为《乾隆重修肃州新志》，后者为《光绪肃州新志》；根据行文需要，有时分别简称“乾隆志”、“光绪志”）。这是一部煌煌巨著，规模宏整，体例完备，内容丰富，保存了已佚肃州旧志的许多资料，全面记载了古肃州及其以西至哈密的一些历史、地理、人文，尤以河西地区屯田、兵防等项极尽详备。东起柳林湖、昌宁湖，西至敦煌、安西，募民给田，开渠筑路，发农器、牛畜，借籽种，以及耕种分余之制，无不详载，保留了清初驻军屯垦、移民实边、经营西域的一手资料，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宝贵的施政经验。

此后又过了大约160年，才有有识之士再修肃州志，这就是本篇要论及的《光绪肃州新志》。与《肃镇华夷志》和《乾隆重修肃州新志》相比，《光绪肃州新志》的文献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建置沿革》搜罗汇集了大量有关肃州及河西地区的历史文献资料。

一般成熟定型的方志都设有“建置沿革”目，而建置沿革因变动较频繁，往往呈现出纷繁复杂、难以董理的面貌。酒泉地处僻远，历史上多民族杂居，或遥立郡县，孤悬一线，或割据僭窃，分庭抗礼，这一情况尤为突出。《肃镇华夷志》于“图说”后首置

“沿革”，并附疆里、郡名、番夷。其直叙沿革者仅550余字，其中尚有130余字是讨论酒泉得名之泉的。驭繁就简，条清理贯，读来一目了然。到《乾隆重修肃州新志》，篇幅陡然增大，首列《河西总叙》，从“唐虞疆域”说起，旁征博引，直至“本朝建置”，意犹未尽，还缀“河西道里”，之后《肃州》等各分册首目才简明扼要地记其建置沿革。如此处理，使全志规模宏整，格局非凡，在有清一代西北方志中独树一帜。然亦有其道理在，乃“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者。其《凡例》开宗明义：“历代建置沿革，河西最多。然四郡相连，不可止以一郡论。所以，《甘镇旧志》亦列总叙于前，惜其太略。兹则更为增订，列之卷首，庶数千载地方情形，了然在目。但书籍鲜少，粗具大纲，不能详悉，挂漏之讹，知所不免。”

（《重修肃州新志》，1984年刘兴义等校点本，第6页）这是实事求是之论。

《光绪肃州新志》试图有所超越，不列“河西总叙”，直叙肃州沿革，且以小序统之：“五帝不相袭，三王不相沿。因革损益，各随时宜。同一河西也，在汉为五郡，在唐为七郡，在明为卫所。大约户口有繁简，地运有旺衰，而版图幅员则犹是耳。即以肃论，或名郡，或名县，或名酒泉，或名肃州，或以敦煌隶属，或归甘凉统辖。昔则领县以九，今则分县以一；昔则卫部以五，今则州隶以二。前后异变，纷如弈棋，要皆因时制宜耳。”（《肃州新志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页）以下按朝代叙述肃州沿革，又不限于肃州，大多篇幅仍以河西地区为重，甚至扩展到了西汉所设凉州刺史部，详叙其所统辖之郡国，并且将政权更替的缘由经过也作了交代。其行文绝少整理归纳，而是直接引用，大量汇集五经和正史中的相关资料来呈现沿革情况。不仅如此，各部分还加了大量的按语，对郡治等一些历史地理概念、名物典章和历史人物加以考证说明。有些地方作者还作了评论分析。如“西夏窃据略”，在详叙西夏君主谱系及兴衰

之后又举例讨论西夏政治之优劣凡三条。其第一条：

西夏风气不如五凉远甚：一则承汉代之隆，声明文物；一则经吐蕃之乱，磨灭凋零。然而赵元昊亦止边鄙酋豪，初无远志。观其对父之言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锦绮何为！”此等语，五凉所不屑道者。无论张氏之忠贞，西凉公之文学，不敢仰望下风。即较之蒙逊、僭檀之流，尚有愧焉。是以窃据多年而地方不振，职此之由。（《肃州新志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6页）

其后意犹未尽，又全文征引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夷夏之变的那一段著名论述。

诸如此类，不仅难免繁冗芜杂之讥，有矜奇炫博之嫌，而且也于志例不合，但放在今天方志编纂和研究者普遍不曾通读经史、国学根基比较薄弱的背景下看，这些资料的罗列汇集又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显得弥足珍贵；其征实考信、扎实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我们也不无启迪。

2、记载了同治回乱发生的一些细节。

清同治年间，西北发生了大规模的回民起义，其中尤以河西地区为最。肃州自同治四年（1865）马文禄盘踞，至同治十二年（1873）左宗棠荡平收复，遭受残害前后长达八年之久。这场变乱原因十分复杂，既有当时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官贪吏虐、民不聊生，满清王朝摇摇欲坠的大背景，也有乡勇团练的欺压剥夺激起变乱的直接诱因，既有历史上积怨甚深的民族仇恨，也当时少数回族上层分子伊斯兰化中国西北，妄图建立伊斯兰政权的阴谋等等，虽然具有某些正义的性质，但大规模血腥屠杀、变乱发生地人口锐减、城池毁坏、社会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是无庸讳言的。由于民族关系等原因，多年来官方刻意淡化，这一领域几乎是一个无形的禁区，很少有人涉足，所以不仅理性的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极少，就是史料的发掘整理也严重不足。而《肃州新志》在一些人物如“名宦”目中恒龄、王斌、黄祖淦、李元嘉等传中保留了

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忠义”目中记载尤详，“同治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回叛据城。谨将城内外倡义复城、战没殉节与著有功绩可称述者录识于左”（《肃州新志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23页），共计33人。其中“殉节”一目则专为回变中殉难者所设。透过这些人物事迹，即可清晰地看出当时肃州、金塔、玉门乃至哈密一带回变发生及官民士绅组织抵抗的具体情形。

3、《街市》记载了清代肃州街市的规模和分布情况，共19条，大体反映出当时商业贸易的状况。

其中“城内街市”条，详记肃州城四大街及其巷道的布局和名称，是有关肃州老城极其鲜见的资料。近五十多年来，城市改建，变化巨大，原貌已鲜为人知，因而这些记载显得十分珍贵；“临水街市”、“嘉峪关街市”早已不存，今日读之，往昔商贸繁盛的状况依稀可见。《村堡》一目共88条，记录今肃州区及金塔县一带村堡的分布状况、居民户数及耕牧、住防情况，这些村堡今日大多已难觅遗迹，有的并名称也已湮没无闻，而志中这些资料又是别处难以寻觅到的，其价值自不言而喻。

4、《文艺》目收录历代诏、书、表、奏、疏、序、议、赋、碑记等共76篇，为研究考察肃州历史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情况的重要资料。

清代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认为：“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通古人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章学诚《方志立三书议》，张树棻纂辑、朱士嘉校订《章实斋方志论文集》，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1983印行，第11页）《乾隆重修肃州新志》也立有《文》目，各分册收录传、疏、议、记、碑文等共53篇，数量适中，但多为当时纂修者本人的作品。《光绪肃州新志》录文较多，与《乾隆重修肃州新志》重出者37篇，所未载者39篇，数量大

增，内容也更为广泛。虽然有滥收之嫌，如西夏主李仁孝《黑河建桥敕》、明甘肃巡抚赵锦《行都司题名记》等，但大多数篇章仍是研究本地历史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

三、《光绪肃州新志》校注取得的学术成就

(一) 校勘精审。

《光绪肃州新志》在文字方面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由于是未定草稿，未经校对、订正和刊刻，因此讹、脱、衍、倒现象较为严重；二是撰稿者引用、转录史料往往凭自己的记忆，并不核对原文，有时还依据行文的需要随意删改——这也是古代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通行的习惯做法；三是对收录的诗文，依照编撰者的审美观念、情趣好尚大加窜改。如晋傅玄《秦女休行》，原作本是一首乐府杂言诗，《光绪肃州新志》将其窜改为句式整齐的五言诗。这些问题，对于一般浏览者而言，也许算不得什么，但若是研究利用，则关系甚大。因此，作为古籍整理的一项基本内容，也为使这部尘封一个多世纪的志稿重见天日，获得新生，更加有效地得到利用，必须进行深入研究和精审校勘。对此，校注者有十分明确的认识，也花费了很大的气力，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全书共出校记1216条，计68500余字，专列“校勘”一项，置于各部分正文之后，以与注释（脚注）相区别，十分醒目，便于核对查阅。

我国古典文献的研究和整理，历史十分悠久，从孔子整理和编定六经开始，绵延不绝，已长达2500多年，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关于校勘方法，各家多有论述，清末学者叶德辉分为死校和活校两种：“死校者，据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几字，钩乙如其书；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必存原本。活校者，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阙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别为丛书，版画归一式。”（《藏书十约·校勘七》，《书林

清话（外二种）》，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339页）两种方法各有其优劣。死校法始于冯武、陆贻典等。冯武校《文选》跋：“有明知宋版之误而不必从者，亦依样改之。盖校书之难，不可以一知半解而斟酌去取，姑俟之博物者裁定云。”（转引自《王欣夫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页）校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鉴于自身的学术背景和学力，《光绪肃州新志》的校注者不避抱残守缺之讥，扬长避短，完全采用了死校法，甚至其中一些按体例规定可以径改者也并未真改，只是按《校注凡例》规定的符号标明，并出校记予以说明，从而较好地保留了志稿原貌，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文本，也为研究者留下了进一步考订的空间。

1931年，历史学家陈垣撰成《校勘学释例》一书。其中的《校法四例》将校勘的基本方法概括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种，本志的校勘即综合运用了这四种校法。《光绪肃州新志》据目前调查所知，有两种抄本：一是甘肃省博物馆所藏抄本。此抄本系张维《陇右方志录·肃州新志稿》本，卷端及书口均题为《肃州新志》。原为15册，后由甘肃省图书馆转抄并改装合订为8册。校注本《肃州新志》即以此本复印件为底本整理。一是甘肃省图书馆藏本。此本仅存1册，为地理部分，共8目。前6目与博物馆藏本“记载事实略有先后，详略亦不尽一致，后两目则两志互异”。“本志稿最迟年限有同治四年肃州回乱事，因属残缺不全，不能窥其全貌，亦不敢断定抄写年代。但抄工精细，有眉批、飞签和修改多处”。（《肃州新志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72页）校注者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仅存一册的异本为参校本进行了认真的校勘，如该校注本第194页第31~34条校记即是。除此之外，校注者还将这个抄本作为附录收在了书后，以便于研究者比较对照。这也是对校法之变通一例。又，此志大量采录了《乾隆重修肃州新志》原文，包括一些诗文，而乾隆志纂修者文化素养很高

(如沈青崖即为当时著名史地学家,以《陕西通志》名世),书稿完成后即刊印行世,是一部成就较高、颇得好评的成熟方志,所以成为校勘者的首选。全书1216条校记中大部分是以乾隆志原刻本为校本写出的,其校勘结果也是比较可靠的。这两部志书虽非同书之别本,但因光绪志抄撮采录乾隆志者较多,后者可视为前者之祖本,以彼校此,也可视为对校。

他校法也是校勘这部志稿时运用较多的方法。清代是我国方志发展的极盛时期,编修了大量志书。根据有关统计,“由宋至今,千年之间,保存的将近八千种,共十余万卷,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清人编的。”(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页)河西地处僻远,但有清一代所修方志也在三四十种。其中还有一些成就较高、影响较大的,如《五凉全志》、《甘州府志》、《重修肃州新志》等鸿篇巨制。顺治十四年(1657)还曾重刊了一批明万历年间陕西行都司各镇纂修的方志,如《西镇志》、《凉镇志》、《甘镇志》和《肃镇志》等。这些志书中的大部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被整理出版,如张克复等《五凉全志校注》,张志纯等《重刊甘镇志》、《甘州府志》校点本。这些河西旧志的整理出版及其成果为《光绪肃州新志》的校勘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肃州旧志中还有一部修于万历四十四年的《肃镇华夷志》,仅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存有善本,在上海、甘肃、南京图书馆存重刻本缩微胶卷,以致许多古籍丛书都没有收录,长期以来不为人知,一般学者很难见到。恰在《光绪肃州新志》的校注工作进行到收尾阶段时,这部由兰州商学院高启安先生和敦煌研究院邵惠莉女史共同整理的古肃州最重要的旧志之一,在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2006年6月),于是校注者又以此本为重要参校本进行了补充校勘,写出新的校记若干条,总算没有留下太多遗憾。当然,与所有古籍整理一样,这个校注本使用他校法也大量参阅了《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以及《中国历代

年号考》、《中国历代职官辞典》等新近出版的工具书。

对于那些无本可校,但以本地历史地理以及生活常识衡量,属于明显错误的,则在不改动原文的前提下,出校记加以讨论——这是理校法。如《山川》“亦集乃海”条:“距城东北二千一百里。”校记:“疑‘二’为‘一’之误。”并据下文“昆都仑湖”条和肃州至金塔及居延海的实际里至进行讨论。还如《物产·毛族》“羊”条:“山羊……牡为羯羊,牝为羝羊。”校者据本地养殖山羊,对其牝牡的习惯名称,出校记予以纠正:应改“羯”为“羝”,改“羝”为“牝”,因为羝是公羊,羯是阉割过、食肉用的公羊,母羊为牝。诸如此类,无他本可据,原文又有明显错误的情况下,以事理常情推断,参以己意,所出校记若干,但前提是不擅改原文,只依《校注凡例》所规定的方式标明。

此外,也有运用本校法的例子,如《村堡》后第35条校记:“根据上下文,改‘三上小村庄’为‘上三小村庄’。”

(二) 注释详尽并多所发明。

嘉峪关市志办公室启动《光绪肃州新志》和《乾隆重修肃州新志》两部旧志的校注工程,其初衷是为修《嘉峪关志》和续修《嘉峪关市志》做好充分的资料工作,也为给更广大的读者群提供一个浅易的阅读文本,所以将注释定位为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能够阅读使用这样一个水准上,这样就需要进行详细的注解。在实际操作中,这一预定目的基本得以实现。校注者不避繁剧,详注细解,共出注释条目5635条,总计34万字,付出了艰巨的劳动。

但在此前提下,仍有所侧重。基本原则有三条:一是凡涉及西北地区,尤其是酒泉、嘉峪关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地理、人文、风俗、物产等,要详注;二是凡涉及嘉峪关、明长城及其军事防御体系的制度、设施要详注;三是生僻的语词和典故要详注。力争将此校注本做成一本有关西北地区历史、地理、人

文等方面的通俗易读的百科全书。

注释吸收了高启安《肃镇华夷志校注》和近年来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敦煌研究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们关于西北史地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有些辞条利用常用工具书难以做出解释，也从未有学者进行过专门的研究考证，没有现成的成果可资利用，校注者即不畏艰难，大量翻阅资料，实地踏查，悉心推演探求，终有会心之处和独到的发明。如“带征”一词，在现代为税收专用术语，有其特定的含义。校注者翻阅了一些专业论文，结合原文中出现的语境及其历史背景，做出了简明而准确的解释：“带征：一并征收。后为税收术语，意指在征税过程中，为征税方便或节约成本，征收一种税的同时，附加征收相关的一种或几种税。”还如沈青崖《创凿肃州坝庄口东渠记》一文中“东、西二洞子坝”，注为：

为两处水利工程，在今酒泉市肃州区东洞镇和西洞镇。早先那一带土地肥沃，红水河从中流过，但崖高水低，无法引水灌溉。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千户曹赞率众从红水河东西两崖下的河床处，分别向东西两个方向穿凿两条各十里长的地下隧道，终于把低凹河床上的水引上了高岸，浇灌了两岸的良田，这就是相沿至今的东洞子坝和西洞子坝。这项造福于民的工程，以其工程艰巨浩大，且富于创造性，被冠以“红水穿碛”的美名，列为“肃州后八景”之一。

这项水利工程意义深远重大，但现在已很少有人提及，且无完整叙述。这里依据零星历史资料做出这样的归纳整理，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志中出现的一些历来歧义纷呈、甲乙互缠、难以董理的历史地理名词如“崆峒”、“金山”、“金河”、“松山”等等，校注者也没有刻意回避，而是迎难而上，往往在汇集诸说，详加讨论之后出以己见，虽然限于篇幅和体例没有展开，论证逻辑不见得严密，观点也还有可商榷之处，但这些探索的价值和意

义是无庸置疑的。这些注释条目如果单提出来，加以扩展深入，即可独立成篇，为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论文。此外，还如对敦煌乐、凉州伎相关史料的排比梳理，大唐左屯卫将军姜行本勒石纪功碑与侯君集平高昌纪功碑的辨疑，黄瓜、王瓜和丝瓜的区别等等，引证资料丰赡，考证精详，也都各自具备了单篇论文的雏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如前所述，受时代观念局限，古人征引史料，并不遵循现代学术规范，而是凭借记忆，或根据行文需要随意删改。为使资料完整，校注者查阅史料，将擅改者或在校记中一一正之，或在注释中录出原文以供比照，或在正文中补足。如录自《三国志·庞涓传》裴松之注引晋皇甫谧《烈女传》中的《庞娥传》，志作者不仅作了大幅度删改，而且在篇首公开宣称：“原文讹谬繁冗处甚多，兹特删而正之，以存其真，非敢妄议古人也。”令人啼笑皆非。对于删改之处，校注者除在校记中一一校出外，还在正文中补上了原文末尾的交代和议论，并在校记中予以说明。还如录自《汉书·甘延寿陈汤传》的《汉元帝封甘延寿陈汤诏》，也作了同样处理。

因志稿还处在资料征集、事迹采访阶段，没有最后修订完善，某些地方还有事实错误、舛讹的现象。为使此校注本成为便于读者充分利用的西北史地研究的百科全书，校注者还做了大量的资料补充工作。如《沿革》目之唐代部分，涉及吐蕃陷肃、甘、瓜、伊事实，多次提及论恐热、尚婢婢之事。校注者发现，舛误过多，时序前后错乱，校补不易，于是在相关注释条目中将《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有关论恐热与尚婢婢相攻史事按时间顺序排列出来，共13条，供读者参阅，在史料的整理方面做了扎实周密的工作。

3、和而不同：探索出了众手同注一书的成功经验。

《光绪肃州新志》原稿为15册，1979年甘肃省图书馆改装合订为8册，总字数在40万以上，可谓卷帙

浩繁。而如众所周知，耗时费力是校注工作的一大特点，因而仅靠一二人之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是不可能的。对此，主持者在亲自操刀校注了其中的一册之后，深有感触。于是，转而寻访合作者，并将自己的精力重点放在了筹划全盘、整合资源方面。几经周折之后，得遇嘉峪关市委党校退休教师王世雄副教授，请他担纲其事，再后来，我和几位同事也先后加盟其中。这样，酒、嘉两地年龄、经历、学术背景、知识结构、认识水平乃至性格特点都各不相同的七八个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了一起。而稍有经验的人都知道，“众手成书”往往很难保证质量。因而，这一工程对每一位参与者的学术水平、协作意识甚至思想道德都是一种考验。其工作性质和任务要求主持者要具有识人的慧眼、容人的雅量和高远的理想追求，主校注必须具备通贯宏博的学识和严谨求实的态度，其他参与者必须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具备扎实的学识功底、树立起服从大局的意识、具有吃苦耐劳、默默奉献的精神。

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波折，产生分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关于全书的体例和版式，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要做到图文并茂，并已经有目的的征集和拍摄了部分长城、烽燧、关隘、村落遗迹等方面的图片；一种认为应尽可能保持志稿原貌，体例要合理得当，版式要朴素大方、简洁美观，已经准备好的图片可另出专书予以使用。

2、关于校注本的序言，主持者出于出版经费来源和政治影响的考虑，计划作序三篇，分别请在本地享有一定威望且关注乡邦文献的高级领导人和酒、嘉两市的党政领导署名。参与者则力主请相关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作序，一则全面阐述该志的史料价值、体例特点和现实意义，引领和帮助读者阅读利用；一则借此提高校注本的学术身价，并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3、关于内容的增删，有人主张增补一些新发现

的当时的诗文，以增加份量和可读性；有人坚决反对，力主保持志稿原貌。

4、关于注释的难易繁简定位，有两个看似差别不大的标准：一是初中文化程度的读者也能读懂，一是可供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利用。

5、关于《辞海》等工具书的利用，主持者出于内容可靠和文字规范的考虑，要求凡是工具书中能查到的条目，必须原样照录，不得更改；有的参与者则认为，这种做法恰是前人讥讽的“辞典搬家”，实际情况是复杂的，校注者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根据前后文意，吸收最新研究成果，编写出符合特定语境、正确、简洁、通畅的注文。

由于参与者能本着对历史和社会负责的态度，本着出精品的意识对待其事，所以遇到有分歧的地方，不盲从，不苟且，能以诚相待，坦陈己见，以资参酌，而主持者从保证志书的质量这一大局出发，也往往能虚心纳谏，认真思考，反复讨论，使不同意见发挥积极效用，使分歧得以消弭，各类问题得以妥善处理。这样同心同德，形成合力，共同演奏出了一曲和谐壮美的交响乐章——《肃州新志校注》如期出版发行，并保证了它应有的学术质量和文化品位。在校注实践中，每一位参与者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锻炼，受到了教育，提高了思想境界，自觉或不自觉地理解领会了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断的精神实质，探索出了众手同注一书的成功经验。而这，才是《光绪肃州新志》校注所取得的最大成就。

四、《光绪肃州新志》校注留下的遗憾

古人云，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刻一书或抄一书，欲一字不误、一文不脱，可谓万难之事。而初创难工，后出转精又是文献整理的一条规律。无论校注者态度多么严肃认真，工作怎样扎实细致，一字一句，如鸡啄米，到书正式出版之后再细读，会发现问题仍然不少。而人的认识又是无止境的：在校注完成最后一次审定和校对，交付印刷，至拿到散发着油墨

芳香的新书摩娑不舍的这段时间内，校注者的注意力并未从这本书中解脱出来，仍禁不住去想一些问题。于是，遗憾也如影随形，不期而至。概而言之，有以下几方面：

1、与美观高雅的封面装帧相比，内页正文排版不够讲究。如版式不够美观、灵动，校记字体字号与正文相同，下一篇文章标题与上篇文章间距不合理，等等。

2、繁简过录不当，用字不够规范统一。正文中还残存着为数不少的按体例可以径改而仍保留的原抄本繁体字和异体字，用字没有完全做到规范和统一。

3、原文辨识有误。如《物产·草类》“子麻”条：“收其子，可为曲皮，可作绳。”抄本“曲”为繁体“麴”，手写体左偏旁最后一捺笔略长，校注者将其过录为“面”字，并以此错字为据出校记：“‘可为面皮’语不通。子麻除收子榨油外，麻杆经过沤晒干，剥其皮，可制绳，织布。今删‘可为面皮’，改作‘沤麻杆，剥其皮’。”用的是理校法，真是南辕北辙。

4、断句标点存在着不应有的疏失。如《人物》“于显龙”条“科第蝉联，人颂公忠义，世昌云”，应作“科第蝉联，人颂公‘忠义世昌’云”。该条取自《乾隆重肃州新志·烽墩》所附于显龙事迹，原作“今书箱奕叶，科第蝉联，肃人颂以‘忠义世昌’云”。1984年酒泉博物馆校点本《重修肃州新志》断句标点是正确的，这里却没能吸收其成果。其他如《文艺》诸篇的断句标点也有可商榷之处。

5、《校注凡例》拟定考虑不周。明孝宗年号“弘治”在有关明代史事的文字中屡屡提及，清人为避乾隆皇帝弘历讳，改为“宏治”，对此，一一出校回改，不胜其烦。若为此类问题专拟一条善例，则可大大减少似乎必须出校但又很少学术意义的校记的数量。

6、校勘记多议论抒情类冗词赘句，于校例不合，也不够严谨得体。如《名胜》后第13条，比较乾

隆志和光绪志“戍楼晓角”描述文字：“二者比较，本志雕琢更细，文学味更浓”，即属多余。第12条品评“玉关来远”描述文字：“此条用语本志和《重修肃州新志》都存在不妥，清朝西域绝大多数地区为中国领土，不应言诸国，而应说诸族。二志著者以异国番夷看待西域（新疆）是错误的。”这里有误解。“国”在古代有多重含义，这里应是“地域”之义，也包括“部族”；在此意义上常与“方”同义复用，组成一个常用词“方国”，也是地方志及其理论著作中常见的词语，与领土主权无涉。

7、注释内容繁简详略不当。对一些著名历史人物，如韩愈、柳宗元等，凡读过初、高中的无不详知其生平；关羽在中国民间则可谓妇孺皆知，大可不必浪费笔墨。同为有作为的皇帝，如汉武帝刘彻和光武帝刘秀，前者仅一句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后者则长达250余字，详述其夺取政权全过程，并解释了“光武中兴”。其他如晋文帝、武则天等都嫌繁冗。

8、注释文字文白不一，其中部分条目的相关内容照录史书原文，往往艰深晦涩，一般读者难以卒读，从语言文字的角度衡量，没有完全实现供中等以上文化程度读者阅读利用的初衷。

9、有生词僻典当注而未注者，也有常见语词不当注而注者。

10、注释方法多有不一：有的先译整句，再分解其中生字生词；有的则仅释生词，整句意思仍不甚了了。

明月之珠，不能无颣。凡此种种，均有可切磋琢磨的余地。而学无止境是我们的共识，精益求精也是我们的共同追求。《光绪肃州新志》的校注甫一结束，《乾隆重肃州新志》的校注即随之启动，这是一项更为重要、也更为艰巨的任务，及时检讨已往，反省自身，总结成败得失的经验，将不无裨益。

（作者：河西学院教授）

《甘肃省志·财政志（1986—2010）》《甘肃省志·商务志（1986—2010）》《甘肃省志·地震志（1990—2010）》《甘肃省志·农垦志（1989—2010）》 通过终审

2016年12月29日，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副省长夏红民主持召开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会议，终审《甘肃省志·财政志（1986—2010）》《甘肃省志·商务志（1986—2010）》《甘肃省志·地震志（1990—2010）》《甘肃省志·农垦志（1989—2010）》。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省政府副秘书长张正铎，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委员、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车安宁、李振宇出席会议。

会议评审认为，《甘肃省志·财政志（1986—2010）》《甘肃省志·商务志（1986—2010）》《甘肃省志·地震志（1990—2010）》《甘肃省志·农垦志（1989—2010）》四部志书观点正确、内容丰富、体例完备、结构严谨，符合新编志书的要求和质量规定，决定通过终审。

夏红民副省长在评审会上指出，地方史志工作是甘肃文化大省建设和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志书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的重要载体，全省二轮修志工作要进一步突出“进度”和“质量”两个重点，全面准确、客观真实记述全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做到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统一。全省地方史志工作者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强化措施，细化落实，加快进度，确保按期全面完成二轮修志任务；要树立精品意识，做好更加精细的校核和更加严肃的史实考证工作，查缺补漏，精雕细琢，切实提高志书质量，真正编纂出经得起历史检验、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甘肃特色的精品佳作。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省志编纂处余德艳供稿）

G
A
N
S
U
S
H
I
Z
H
I

甘
肃
史
志

2017年第1期（季刊）（总第29期）

编辑出版：《甘肃史志》编辑部

联系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51号
省统办一号楼九楼

邮 编：730000

电 话：0931-7821931 7821927

电子邮箱：3498763120@qq.com

甘新出连续性内部资料
准印证（甘）LK000080号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